



# 中国不高兴

↑ 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 / 著  
The Great Times, Grand Vision and Our Challenges  
UNHAPPY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14-05606-1

I.中…II.宋…III.时事评论-中国 -  
2008IV.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23367号

书名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  
内忧外患

著者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

责任编辑 陈中南

文字编辑 陈尔西 杜牧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  
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40千字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6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06-1

定价 29.8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状
  - 四、2008，神鬼莫测
  -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 附文1 一个国家的欲望与恐惧
  - 附文2 疑虑重重的中国准备迎接世界
  - 附文3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未来
-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

## 具有的心理指标

-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 九、打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 [十六、萨科齐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
- [附文1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
- [附文2 中国对美国的三个真正挑战](#)
- [附文3 受害者还是获胜者？——中国的奥运历程](#)
- [附文4 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不应惧怕的国家](#)
- [附文5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 [附文6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看自己](#)
- [附文7 由“挑战者”走向“协调”合作的多元化中国外交视角](#)
-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 塑伟大之目标](#)
  -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 [三、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四、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五、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 六、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 附文1 中国前途之辩
- 附文2 中国的崛起

##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2008年给人的感觉是鬼神莫测，太戏剧性了，让各种预报名誉扫地。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是容易预料的。当变量太多，以往经验所提供的套路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就说明又到了未定之天。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



#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宋强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2007年冬天，我在北京电视台参加一次研讨会，这时北京市正在酝酿一个大工程，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制作一个大型专题片《北京记忆》。我接了这个活儿，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咋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

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

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

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

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追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

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

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还是少一些万金油式的“明白人”为好

我个人的感觉，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体不是太高调的，是比较克制的。这就证明现在的领导人沉稳，心中有数。举办奥运会就是一个盛典，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现场总结，没有必要一轮一轮“火树银花不夜天”。从宣传策略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张弛有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你强化了这30年，那么60年大庆，你又要整出一个什么调子？在60年和30年的调子里，又要体现什么不同的侧重？并非我不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是担心带着各种特定情绪的人借势上架，形成对撞，大家又来一次吵架。而且现在形势确实有点紊乱，我们近年来感到的困惑是，不论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性危机，给人的感觉都是坐等而来的。处理起来急急惶惶，有点捉襟见肘。早些年，北京下雨，水排不出去，哎哟，你看那个乱劲儿哟，城市系统差点瘫了。这一两年问题更多，发生了群体事件，领导批示说“……是第一位的”，三鹿奶粉祸国殃民，又表态“……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成了“重中之重”，一句老话：多中心就等于没中心。不是乱了张致吗？

银行先是提高利率，不到两个月马上要刺激，哗哗往下降，这不是看天吃饭吗？听一个老同志说，中央开会的时候，开始的议题和会议结束的决议完全不一样，大呼隆、大拐弯。这些智囊是干什么吃的？连我这种“领导学”“管理学”的外行都看得着急。这不像我做电视那样被牵着鼻子走吗？这是怎么了啊？

说到“中国不高兴”，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普遍能感到的内政的愤懑，说出这一点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要对一切高歌猛进的表演表示低调？是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睿智”表演体现出的情绪和无意中露出的那种狞笑，看不到那种出于真正挚爱我们这个国家，挚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能的质朴情怀，没有因为挚爱而体现出的忧伤。如果说稍微优秀一点的中国人都靠着抖机灵打发日子，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我是明白人”，而做明白人的动机，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都能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上。大家都去这么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

在一个小范围聚会里，我听到宋晓军讲述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



工作的人，他的描绘，令人想起了一部正在消失的民族传奇——“哈军工”的昨日故事，想到《神火》，想到《暗算》里701单位的画面。那些寂寞的英雄，并不拒斥布尔乔亚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肩负的，就是让中国走出“不高兴”的阴霾，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但是相信没有一种代价会比起现今当下，范跑跑和《色·戒》所引起的欢呼，会让他们更加痛心。

由此想到的是另一番图景：借民众对内政状况的正当的愤懑，让那些自我作践的民族观、价值观重新抬头的颓废的舞蹈？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离地飞升的时代了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风流人物”，像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玩“超越”，“超越”得一切底线都可以不要，一切可能的认同与共识都可以消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智识人士，敢于以霸权大国的“第五纵队”的姿态来猜猜于大庭广众（而且根本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起码甘愿做第五纵队不以为耻，是一个心理现实）？所以，讲到“中国不高兴”的林林总总，必须要道破这一可悲的心理现实。

最近的某一天，听到作家萨苏讲他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正在被癌症折磨的现状（他父亲所在的那个专家组，所有的人因高危工作

环境而患上肝癌并先后辞世)。在这里，我引用萨苏献给父亲的一段话：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走向天涯，无法再做一个好的儿子或者女儿；……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悟性，来完成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一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的同龄人在做的一样；不过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平实地做人，我们维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荣誉。

“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在善变者的眼里，这是多么迂腐的感情啊！但是，说出这一点关于“国家认同”的话，就真的那么令人难堪吗？

我有一个70后的朋友，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我大不一样，但他的话充满“一损俱损”的忧虑，和流行的卖弄高超的冷峭形成对比，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可贵而孤独的，但未必孤立：

为“反”而“反”一定是不对的，但情况确实是，民众的被剥夺感并非没有来由。官员的傲慢和不敬岗，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也许已经错过了从政府到民间建立基本共识的

时机。改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而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这里，至少把“建立共识”作为了一种希望，这里没有幸灾乐祸的看热闹，没有“食肉寝皮”的切齿咬啮。我理解他的愤懑，愤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感情。我更看重的是，他这话透出我们时代稀缺的品质，就是虔诚敦厚，“位卑未敢忘忧国”。

很不幸，忧国忧民现在大概成为所有“明白人”拿来恣意嘲弄的古旧价值了。

也许我的感受又忍不住显出迂阔，不符合现在的趣味。但是偏要迂阔下去，想找到一种丧失已久的崇高感。这就是我经历了2008年的悲喜之后说出来的话——

除了叨叨“变化”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恒久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拷问，把2008年4月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青年学生对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的反弹）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待，我觉得并不高估。这种情绪反应是自发自动的，在这个淡漠政治的时代，表达强大的抗议信息（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充满魅力的行动政治，完全应该得

到正当的评置（而不应是白岩松们自以为是的抖机灵），完全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这就让我想起曾经做出的某个判断：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

“内修人权，外争族权”这句话真的是非常中的。所以老话重提，还是要建立共识。

需要关心的是：这种共识和认同，是否正被不加克制的“本土愤懑”吞噬？我在电视节目研讨会上问过：咱们过去兴盛了多年的“审丑”时髦，是不是该到谷底了？本土愤懑与“审丑”浪潮联结，就像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制造的是廉价的恐惧和绝望。我们能不能起码从个人励志的角度，去警惕这种心理的瘟疫？

需要追问的是：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的情感，探寻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宋晓军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

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

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



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

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

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

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

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

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

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

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原来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

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



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纱，打通“不高兴”之脉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

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題，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

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

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

“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

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听到了，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这样的歌：

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

没有退休金

没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

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2008年，我们的领导人也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这说明我们的高层也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关系。

###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状

王小东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

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我想这也只是个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贪污了，那这工程还能干吗？印度人回答：我们有辙儿，不是有民主吗？用民主程序把这个工程给搅黄了，不修了，95%拿走，5%搅黄这个工程。我讲这个插曲可决不是反对民主，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确实也得看是谁用。

实事求是地说，跟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比的话，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还行。但是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13亿人在这个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坦率地说，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

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了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这本书讲，现在很多人在扯淡，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等，纯粹是胡扯，连他17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胡扯，真正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现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够把世界变暖多少了，也就再用个二三十年吧，这还得以人类对石油的消费不是特别快速的增加为前提。那么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呢？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说：有一些人很乐观，只要石油价格上去，我们就会把油给找出来。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发现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却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这恰恰就证明石油在地壳里越来越难找了，真的是没有了。科技那么高，花那么多钱去找，你怎么还找不到呢？过去可不是花这么多钱去找的，过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说，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



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一，这没有什么可行性。说这样的话的人自己都住着大房子，开着车呢。他们自己不身体力行，减少石油的消费，要我们减少，非常的虚伪。最虚伪的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的房子一个月用一万多度电，竟然因为环保拿了诺贝尔奖。环保主义者这德行还真不少，所以宣传环保，不管是西方的宣传还是中国的宣传，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

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准备依靠风能，需要现在就拼命造风能发电机了。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

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能源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办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现在的复杂文明维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简单文明去。这也是《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一书中的观点。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

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复活节岛文明怎么灭绝的？复活节岛上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比谁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显首领的崇高地位。问题来了，要把石像立起来需要用绳子拉，而绳子是用树皮做的。结果300年中，为了拉石像把树砍光了。砍光了树木，他们就失去了众多的食物来源，也没法造独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鱼了。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岛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灭绝了。

总之，文明是可以灭绝或倒退的，比如欧洲，还有楼兰、北印度文明等，没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中国人不习惯而已。欧洲人比中国人习惯多了。

“现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老责备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那一套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就很好，现在挺爽”。问题是不但现在很多人没爽，而且还越来越不爽。

我们能明显看到，把经济放开一点，中国的人

才在经济领域就能驰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经商，比如说，有一些人适合从政，有一些人适合搞学术，有一些人适合搞文化、搞娱乐或者搞传媒，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民主，不准竞争，安分止争，谁也不会服气。大家明着看一群笨蛋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却不能跟他们竞争。有那么多明人明明比他们强一万倍，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心里能好受吗？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神七”上天，欢呼的非常多，中国人的爱国心算是扳回一点，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击已经大到“神七”无法冲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再说批评外国人，包括批评日本人，年轻人马上不接受了，说“你先看自个儿吧，做得那么糟糕”。对日本人也不批评了，甚至不容许别人表达

可能是对日本人的批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到一个日本街头现象。不少游客喜欢在日本街头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结伙打扮得特别妖艳，在街头摆出姿势让大家照。这是人类的一种表现欲望，说这个事的人并没有批评日本，只是说日本的一个逸闻。标题用了“震惊”的字眼，也无非是当今“标题党”的风习（但还算不上是标题党），可马上就有人上来骂，他们说日本人这有什么错呀，你凭什么骂日本呀！逆向种族主义情绪马上就来了。我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年轻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们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样高尚一把。年轻人说：我们爱国了，政府是否也该做得好一点？

但无论如何，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这个规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适用。因为20后是受过外国人伤害的，经历过抗日战争。

80后由于没有历史负担，他们的成长过程比较好，没有遭受过父辈、祖辈的苦难。但是他们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问题的根由在哪里？且让我把话题谈开一些，说一下为什么中国非得出现“高尚集团”、建立“高尚社会”不可了。

其实用社会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现象和历史现象非常有效。爱德华·威尔逊所著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有一段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是等待融入现代综合论的最后的生物学分支。”口气大了点，但我认为事实很有可能真的是这样。

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对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是瞎的。它们的祖先原先在地面上生活时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为什么眼睛会瞎掉呢？很简单的道理，到了地底下以后，眼睛用不着了，也就是说，地底下的环境对它的视力是没有选择压的。在地面上的时候，它视力如果不好，就可能抓不到吃的东西，就可能被别人吃掉，到了地下用不到眼睛了，

视力好不好没有关系。而管视力的基因在遗传复制中会产生复制错误，没有选择压了，就淘汰不掉错误，管眼睛的基因就变成随机乱码了，所以眼睛就瞎掉了。

这个道理对应到人类社会对不对呢？其实也对。现在的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几乎没有选择压，其他动物威胁不到人类。那么人类群体互相之间有没有选择压呢？现在最起码对于核大国也没有。要论述人类群体相互之间的选择压问题，就用得上社会生物学里面的一个分层选择理论了。这个理论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人好，没有一个人有诚信的，没有一个人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人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



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我认为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也有类似想法。比如说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论，甚至更早的孟子讲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社会生物学表达的逻辑线条更明晰。

盛极必衰，强大到没有选择压的时候，衰退、腐朽就开始了。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德行那个德行，有些德行确实不怎么样，其病根就是在这里：古代中国非常强大，在很长历史当中，外部选择压很弱，于是越混越衰朽，这是很自然的。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混了两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国混了两千多年才达到的地步，比中国还快。

这个世界的强国自从打过两次大战以后，没有了选择压。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间不敢打，选择压弱了。冷战之后，更是几乎没有选择压了，美国人福山高兴得忘乎所以，说“历史终结”了。

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

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一定会衰退。

宋晓军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全世界人类都一样，美国绝对不像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精英们讲的那样有道德，比如说华尔街，按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那几只“肥猫”把全美国老百姓抢光了。很多美国退休老人衣食无着，不知道怎么办，存的钱全都没了。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

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 四、2008，神鬼莫测

黄纪苏

猛回头：能否走出浑浑噩噩

2008年给人的感觉是鬼神莫测，太戏剧性了，让各种预报名誉扫地。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是容易预料的。当变量太多，以往经验所提供的套路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就说明又到了未定之天。从国内说，毛泽东时代30年，改革开放又30年，解决了老问题，积累了新问题，完成了轮回，该翻篇了。国际上，火烧了，楼垮了，资本主义体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相对稳定发展似乎要结束了。真够有趣的，樊纲他们刚刚举杯庆祝中国“并轨”，世界就又“出轨”了。在一个剧变时期，理性要挺身而出，但理论要适可而止。那么多似是而非、似有还无的东西在动、在变，一切都没固定，没水落石出。这不是你条分缕析所能摆布清楚的——说得太头头是道的事儿往往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讲出来，能上升到理性最好，一时半会上不去，也没关系，就说说感觉也无妨——“空气在颤抖，好像天空在燃烧”，关键要真诚。我的感觉是，新世纪没准从2008年开始。

这两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中华民族需要有股

力量出来高尚一把，使因循苟且的恶性循环转变为奋发蹈厉的良性循环。这让我想起曾看过的一段水牛跟狮子的视频，很有意思。一大群牛发现了狮子，掉头逃命，狮子追上去扑住了一头小水牛。牛群兵溃如山倒已经跑出一段距离，听见小水牛哀鸣不已就放慢了脚步，但一个个都是欲救不敢，欲逃又不忍。这时候一只水牛奋蹄冲了出去，虽说是草食动物，但那么大的体量再加那犄角，还有后面黑压压的开始跟进的牛群，狮子也怵了，扔下小牛溜了。人类社会也是一样，关键时刻要有某种力量出来打破平衡，启动新机。30年来人人为己的文化和体制，其能量差不多快耗尽了。精英阶层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本来这两样东西也构成了社会的动力，想图财想当官不能说不算抱负，但他们缺少更宏远的抱负。精英阶层的抱负应当比老百姓的大，应能把老百姓的个人小抱负组织起来汇聚成一个民族奔向宏伟未来的大抱负，不然要你们干嘛？但你看那些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脚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搂钱，嘴里喋喋不休，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太没气象了！他

们如今有名有利有官有位有房有车，要什么有什么，人生目标全实现了，只想在安乐窝里维持现状、醉生梦死，谁也没心气儿为整个民族打算，整顿内部，把一身的毛病好好治治，强健了肌体，去迎接世界历史更新、更大的挑战。中国几千年，读书人经常扮演启动基金的角色，但这些年的读书人快被各种科研基金和红包压垮了，谁还愿意当启动基金呢？而到了2008年，忽然蹿出来一帮80后，二话不说当了启动基金，这的确让人对前途感到一点乐观，原来还以为这帮孩子就知道乱花父母钱呢。

反正时代走到了这么一个关口，需要思前想后了。未来看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头打量历史。中国的历史说简单也简单，分两段就行。1840年以前中国属于自己的历史，自居一隅，自成一格，自行其是；1840年开始，中国史并入世界史，中国解散了自己的东亚宗藩体系，加入了以西欧北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前一半历史里的中国跟后一半历史里的中国，内外形势和基本任务全然不同。

前一半的外部压力基本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从文明形态来说，打猎的跟种地的不在一个层次上，北方的马上民族虽然攻入中原好几次，但最终都被

汉族文化同化得几乎无影无踪。后一半的外部压力来自工业文明的西方，面对比你发达得多的科学技术工业，“用夏变夷”的老路走不通了。这一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要比西天佛教那次全面、深刻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毕竟是站立了五千年、有韧性有后劲的大文明，彻底“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方面，你能把女真化成华夏，但你没法把西方化成华夏；另一方面，新加坡能把自己化成西方，中国没法把自己化成西方，因为你不够小也不够弱。这是基本形势，这个基本形势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学习人家，强健自己，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我的理解就是：属于五千年，承认170年，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扔了。至于170年，你爱也好恨也好，它也没白过。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是新生，我们由皇帝的臣民变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啊！

既然是进入了世界历史，既然是在世界丛林里跟工业文明的西方周旋，您缺的就得补，差的就得改。科学、技术这些真不用多讨论了，别听西方的“杨朱”也就是福柯他们碎嘴唠叨，您就督着儿子闺女玩命学吧。至于人文社会方面，先秦诸子说

到了的，您抄下来贴墙上；没说到的，您也不妨参考参考五洲四海的明白人。

中国还要往前走，恐怕基本任务要有所扩大。因为我们今天跟100年前不在一个楼层上，扩大成什么呢？王小东用了一个词叫“天命所归”，这词儿好，毛泽东原来说的“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应该也是这意思吧。中国就是要有世界眼光，有人类抱负。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我原先用过一个比方，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终极目标当然不在我们眼前，但应该在我们心里。不妨把未来的理想社会当个存钱罐，平时有点社会实验、人生探索什么的，就当毛票钢镚塞进去慢慢积累吧。这些我多年前在《高高低低话平



等》里都谈过。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照目前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一路走下去，把经济继续做大，做得超过美国，可能性有没有呢？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也不好说肯定就有，因为各种内、外、心、境的变量太多了，总之这的确是个问题。咱们经过30年发展，有了不小的成就，但要理性看待，不能自我膨胀。张五常说：可不是嘛，你们的制度可不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嘛！但也应该看到，河北矿就炸了，三鹿事就发了，深圳那个“怪叔叔”把官僚的脸都丢尽了！这些事哪件也不偶然，都有着极高的代表性和极强的标志性，一拽一长串，一揭一大片。目前这个机制不是没问题，而是有问题，有大问题。精英层能否带领我们民族再上一个台阶，确实堪忧。

民主何能 民主何为 民主何德 民主何苦

2008年先闹火炬，再闹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谴”，在群众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改口说“普世”。有人力挺，有人痛批，还挺热闹的。自由派玩概念游戏，说你们看啊，汶川大地震咱们中国人表现得好不好？好吧。为啥好？因为尊重了生命，落实了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从哪儿来知道不？从西

边。——马列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也从西边来的没错吧！西边好东西多啦，民主也是好东西，咱再来一个要不要？其实自由派你就直接说我们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没华盛顿、杰弗逊中国人还不会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确实实普世，但国会山它还真没那么普世。没那么普世只要你觉得值得也不妨引进、推广，牛仔裤不也从无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条了么。反对的那方又是老套子：马克思一八三几年怎么说的，四几年怎么说的，五几年怎么说的。更年期似的拿出“阶级性”来碎嘴唠叨——中国都“阶级”成这样了，他们的“阶级”理论却一直在犄角旮旯闲着，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够无趣的。

我们对民主既没必要红着眼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不妨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角度来说说民主。先说功用吧。“民主”当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当家。当家做主有开心的一面，也有麻烦的一面。但有一条民主可以绝对地保证：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选的，出了事赖不着别人。还有一条可以相对地保证：既然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讨好人民、给人民办事的动力一般会大于不由人民选出来的。当然

了，像耶稣、佛陀那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另有出处，人民打他他也要给人民办事的，可能会因此机会少些。社会现状与民主功用之间的关系，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少。人类社会各种变量乱作一团，政治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无数社会历史因素错综纠缠、复杂互动的结果，塞翁失马、淮橘过江，同样的东西，换个时候那个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种民主理论和反民主理论都要在人类社会的变局面前尽量谦虚一点。

民主由于其开放的参与空间尤其是舆论空间，会呈现动荡不安的特点。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要看摆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中国近代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较差的选择。即便是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选择，因为经“文革”十年折腾，人心思定——现在有人埋怨当时宪法取消了“四大”，可老百姓当时真的无所谓，我们不妨平下心回忆一下。今天30年过去了，距离80年代末的风波也已经20年了，国家承平日久，您还是年年岁岁“稳定压倒一切”，还用过多的限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一味抑制民主的监督功能，这就不对了。民主社会一般小震不断，大震不见，泄洪道天天细水长流。而我们的特点是平时捂着盖着，因为体积大，容易将就，东边

不行靠西边，南边缺点儿北边补，但结果矛盾会越积越多。大家伙比潜水员还能憋气，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土崩鱼烂。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前30年的问题和情绪一直捂到1976年，1976年这一反弹把中国弹哪儿去了？30年还没弹完啊！后30年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问题也够个儿的，矛盾和不满也积累了不少。幸亏这些年由于互联网，有了真正来自民间的监督和表达。要说民主，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会自我反思、自我纠正。民间参政议政，没有这个互联网根本无法想象。要没有这样的参政议政帮着行洪，憋成溃坝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思想文化管理群体，比例越来越大的是所谓“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的特点是理性、事务主义，自己没意识形态，没立场，没激情。还别说私下，就是在最基层的会上，提起路线政策，他们全是一脸的不屑，心里没一点认同——当然也说不上多反对。这样一种“消极行政”，你能指望他有多大效率呢？这批“技术官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含量太低。你看有些人，《色·戒》火爆那会儿，愣看不出那是部什么片子，争论从民间爆发，闹得不可收拾，这才启动“反应机制”。后来宋祖德说了某位著名导演，他们又猴急

麻花跳出来“清理”门户，口口声声说人家“诽谤”。人家万一说的要是属实怎么办，你的脸找好地方放了没有？这么笨手笨脚，这么低下的行政能力，却来管理文化艺术这些精密仪器。其实也真不能过多责怪那些具体的官员，根本的问题是，应该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管不了的您别管，用有限的精力去干能干的事情。

今天因为缺少当年的危机，普遍现象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完全没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气神儿。看历史，“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规律。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你看从八旗到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到八路军解放军，生生死死的多快呀。中国革命80多年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晖埋伏在胡宗南身边当间谍，不是没人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说这小子这么廉洁清正有作为，太像共产党了，赶紧抓起来吧！——就冲着一条，你说这共产党能不得天下么？当年秋收起义一路丢盔卸甲，三湾改编完了，一二百人由毛泽东一瘸一拐领着奔了井冈山，靠着这股精气神儿也就20来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国。你再看今天这一个个跑官买官卖官，腐朽成那样，如

果没有一套振奋他们的办法，整个社会是会快马加鞭老朽下去的。咱不说远的，就说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反应迟钝；“3·14”关键的头两天都不会动了；火炬若不是国内外“四月青年”冲冠一怒，变坏事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场呢。接着就是后面的溃坝、瞒报、毒牛奶、毒鸡蛋。大家会问，“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样没毒？毒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都管什么去了？还让广大消费者“提高鉴别能力”，我们家里有化验室么？这样僵化的体制应付中小型危机还凑合，碰到大型危机就令人担忧了，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造。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要危了，精英们就精神抖擞，有模有样。日子刚好一点，就成群结队地醉生梦死。可悲的是，这类松懈和堕落的现象，严重压制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精英应该是干嘛的？应该不但带领人民从死地里爬出来，还要去攀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对于社会和社会的管理者，言论和媒体的继续发展可能起到一种作用：平添日常的内部（国内）压力。说白了，天天有人骂你数落你揭发你，你行为做事就会像点样，就能够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着外国入侵或地震山摇才能振奋一回精神。这日常的压力从哪儿来？来源当然不

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个。我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上也是满场的官员一个个听得也直抹泪。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整垮了好几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树立起来，可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别陷于文化决定论，如果你药方开的尽是唱歌背诗开讲用会，那就是误国误民了。不能光靠这些，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当然，也别以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过犹不及，一年到头罢工游行，社会也搞不好。另外，在体制内部做些制度改良，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年日益强化的“问责制”就属于这种思路。问责制本身，我挺怀疑它的效果。效果好点的其实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压力，说到底是这样因果链：出问题——媒体曝光——公众义愤——高层震怒——勒令解决。问题是，靠媒体曝光、公众义愤、惊动高层这还具有普遍意义么？——绝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机会上媒体成热点的。不借助外部压力，仅靠内部举报，这个制度就很难启动，启动也都是为些不疼不痒的事。面对事故灾难，基层普遍的瞒报封口说明问责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多设一些相对独立、彼此外在的机构，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对外来的压力。其实老说的“部门利益”，其中便

包含了这样的压力,这有点像《南方周末》兔子不吃窝边草,专找广东省外的时弊针砭一样。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泽东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今天的吏治跟前几十年有霄壤之隔,少数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体制内部想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应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稳妥而坚定地加强民主的监督机制,对整个管理体制造成外在压力——只要有利于我们,别说从西方人那儿了,就是从飞禽走兽那儿该引进也得引进。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总之,对于中国的未来,民主是能有所贡献的。民主的内容很多,对于现在的中国,信息的批露如果能够更公开透明一点,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量,我觉得肯定是一件好事。除了



少数几个人，大家眼下未必对照搬西方的制度有多大兴趣。但你要保证——还要有实在的办法保证你的保证——民主的监督。光来一句“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早没用了，因为历史证明，这些空话套话是常常不算数的。

说到效用，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负效的。议会讨论提案，本来是君子动嘴不动手，但台湾的“立法院”不但动嘴说，还动嘴咬，这还不够，还要动脚踢，高跟鞋都踢飞了。当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搞斡旋时就感慨：以色列办事怎么那么难啊，政府议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个结果；还是埃及好，总统一声令下，谁不听毙谁！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首长意志”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也是啊，用不着民主，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什么的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

傻。但您如果非但不放开，反而一步一步收紧——觉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没人敢管——那么积累若干年下来，矛盾的双方就都没机会了。

以上说的都是功用和效率。其实民主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会说我们古时候就靠明君贤相，不习惯民主这玩意。但问题是，这170年没白过啊，这么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这都跟古时候不一样啦，老百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了，大家越来越认为这是我的权利，生来就该有的权利。凭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当官的给我做主？古代老百姓的确不这么想，村口贴的告示骈四骊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会想我算啥玩意呀？现代的老百姓一个一个读书上网、真假学位证书一擦一擦的什么都懂，他会想你算啥玩意呀？这是现代化造就的基本社会现实，你必须要面对，早晚要面对。

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说了，是现代化培养了这种能力。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家说“民智未开”，这东西搞不成。如今100年过去了，民智还没开么？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时代就那么几个

人认字，民主的欲望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火力发电厂。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来没准够一火山了。你看现在有点事互联网上就狂风暴雨似的，显然是膨胀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寻找释放的出口。那种“从前试过这玩意，没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袁世凯、曹锟那会儿没戏不证明今天也没戏，您的日历忘翻篇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有些官员本来不学无术，但胡作非为，不受法制规范，巨大的公权力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些单位里，老实巴交的群众想“一刀一刀切了领导”的狠话，我都亲耳听到过一些。老百姓需要“民主”“自由”来限制一些官员过分的权力。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就关心猪肉几块钱一斤的观点，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很多人坚信，一搞民主，肯定是有钱人的天下了，前门放狼，后门进虎。这样说当然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尼泊尔“穷党”、查韦斯、内贾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没那么绝对。另外，你可以说美国民主是假的——其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们就不能来点真的么？现在有些学者可以一人同时仨观点：一说中国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说天下压根就没民主这回事；三说其实我们

现在已经挺民主的了。三个说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蚰蚰放一罐儿里只能掐得一个不剩。你不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么？平等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可是平等的题中之义呀。

### 社会主体的崛起与未来的希望

说到民主，我们还应该看看中国现今几种基本力量的相互关系。这几种力量就是政府、资本和百姓。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应该说政府目前是比较吃香的。左右都跟它拉关系，争取它的支持，这也可以理解。从博弈的角度说，社会中是应该多些主体，彼此牵制。小国在两极世界就比单极世界活得好些。现在一些房地产商动不动就雇帮黑社会打手来实现超额利润，那被打的只好拨打110找警察找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之外多了个市场或资本，这的确不光为有钱人，也为许多底层普通民众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牵制是双向的，我们在看到资本牵制国家的同时，不要忽视政府对资本的平衡作用。

政府可能有很大问题，需要规范、改造甚至削弱，但它在理论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各方而代表全体的力量，可以起到抑强扶弱、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别小看这“理论”，有它跟没它是很不一样的。政府或官僚当然也追求自身的利益，对此不是

不能限制（德国、香港都限制得不错）。应该强化政府的超然地位，约束它的自身利益，切断它跟资本的强强联合——本来就是强势，你再助一臂之力，别人还活不活了？至于资本这一块，资本家的利益当然也是利益，当然要有发言权，但国家社会不能由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理论”上都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天然就是自私自利。我曾经读过一篇被称为“资产阶级宣言”的文章，印象非常深。不能照顾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能让大家高兴吗？理论上超然的力量，或许还有可能改造成实际上也超然的力量；理论上压根就自顾自的集团，你根据什么让他学雷锋呢？所以对资本或“工商集团”的指望也别太大了。

其实老百姓一没权，二没钱，手里什么牌都没有，想从资本和国家的对立中收渔翁之利，道理上并非不可能，但现实中的空间不是很大，要是人家光勾结不斗争——乡政府和开发商手拉手欺负你呢？弱小的民众在两个大块头的对峙中讨生活，代价也不小，依草附木的日子终非长久之计。他需要增强体力，获得更大发言权。老百姓必须成长为一支让人家也来送礼、也来拉拢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他非得有点本钱不可。这本钱的来源无外乎选票、工会、网络之类，而这些都需要一个更开放的

政治平台为前提。这一点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是承认的，他们原来主张民主比谁都欢，这几年看看南美、中东有点犯怵，又给民主设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一不能“民粹主义”了，二不能“极端民族主义”了。我头两年说他们的民主是“裤腰民主”，要不小于二尺四，这样他们进得去，还不能大于二尺五，那样“暴民”也混进去了。作为社会舆论力量，知识分子应该为培育和扶植民众的民主能力有所贡献，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多元的民间社会及其价值（现在那帮人嚷嚷的“民间”，走近了一看全是民营企业，也太装蒜了），在资本-国家格局之外培育新的力量。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值得参考。麦当劳顾客吃汉堡吃出半个耗子，结果法院罚了上千万，这说明资本不能一手遮天。这方面，应该说民主体制提供了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一人一票的实质是政治权力上的反集中反垄断，否则天下则全由有钱有势的拍板说了算。反的方法和效果尽可以讨论，但反了就好比不反好，大方向是正确的。“虚伪”二字概括不了民主体制的全部实际，那么高的遗产税难道不近乎社会革命么？

再回到一开头说的“高尚”，说的“伟大社会”，就年轻人的状态而言，应该说是不保准儿但

也还有希望。为什么说不保准儿呢？因为年轻人所受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基本上就没高尚这东西，电视里就差办二奶大讲堂了。听友人徐浩渊女士说，前年冬天，中、美两国组织了一次电视优秀中学生对决，双方各自出席60名代表，在了一项选择中，每人需要从权力、财富、真理、智慧、美丽中五选二。结果是：美国孩子60人统统选择“真理与智慧”；中国孩子除一女选择“财富与美丽”外，其余59名统统选了“权力与财富”。这个调查虽然存在方法上的问题，但大致结果是差不多的。这是一方面。但物极必反，“下半身”了这么多年，也该变变了，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四月青年”就说明了这种变化。搞摇滚的侯牧人是我好朋友，中国摇滚人这二三十年给人总的印象就是一“绿林”，老侯也不例外，你听他那会儿唱红色摇滚，真差不离把嗓子唱嘴外边去了。汶川地震时，一天晚上到他们家聊天，老侯跟我说，他现在有种感觉，那些不三不四小情小调的东西是不是该唱完了。他说起他的女儿——他女儿是四中的高材生，那会儿看不上北大清华，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原准备做世界公民。汶川地震后，女儿跟他说：有些“大词儿”原来听着苍白无力，今天听了令人心动。这句话让我们做父辈的听了一震，有种强烈的

预感：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大的历史转折可能已经开始了。



##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刘仰

2008年似乎很平常地就过去了。这一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似乎过得非常快。但也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令人难忘而迷惑。用一句话来形容2008年有点难，因为2008年，中国和世界都呈现了非常复杂的面孔，所有人都面临没有先例的选择。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确实有一些高兴的事情，比方说奥运会。中国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奥运会，办得很成功，拿到了金牌数的第一。然而，这一份高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要真正把这份高兴变成长久的喜悦和自信，中国还需要更加实际的态度和成果。但是，即便中国人这次如此难得的高兴，有人也不愿让我们太平。从西藏的骚乱，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时的捣乱；从某些欧洲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挑衅中国，到东突分子在新疆制造的流血暴力事件……很显然，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见不得中国人高兴，不管出于怎样的心理，让中国人难受，是他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他们的希望落空。比如说“神七”宇航员的出舱，比如说中国海军史无前例地远航亚丁湾，中国人更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事

情，让我们未来的高兴有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

然而，2008年还是有很多事情令人不快。例如周老虎事件，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笑柄，依然不知羞耻地上演着闹剧；例如三聚氰胺事件，金钱与道德的较量，以这种方式显示出结局，无论怎样破产或赔偿，都是令人不高兴的。而且，在接连发生的多起矿难事件中，人们看到，金钱藐视生命的现象并没有因为三鹿的破产而终结；发生于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昆明的公交车爆炸案，一个北京青年杀害数名警察的残忍，一些地方城管的所作所为遭人抨击等等，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都显示出某些积压的社会矛盾没有完全得到缓解；股市的低迷，房价的斗法，某个首富因操纵股市被逮捕，某个与房地产有关的官员因天价烟、天价手表而被解职等，既揭示了利益集团玩弄公众利益的公开秘密，也让人看到贫富差距的加大，在当前已经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学生杀害教师，大学教师的学术腐败，专家被质疑当汉奸，一方面让人们看到知识分子令人堪忧的素质和良心，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关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生存方式；新疆、西藏、台湾的一系列事件，让中国人看到，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主权依然在遭受挑战；.....这样一份2008年各种事件的

名单，还可以罗列得更长，这些都是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的事实。

跳开中国，看看世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从格鲁吉亚到美俄较量，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从以色列到中东，2008年发生的这一切，人们已经看到了此起彼伏的硝烟和止不住的鲜血，这会是200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预告吗？在这些冲突的背后，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形成汹涌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全球各国政府联手救市也没有多大的起色，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小国冰岛破产了，这样的命运会落到大国美利坚头上吗？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其历史性、标志性的意义，也被金融危机所冲淡；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而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我们全力以赴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发达社会终于暴露出严重而深刻的内在危机，我们怎么办？是继续照样学，还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自我创造？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失语，不知道是醒悟中的沉思还是等待美国榜样复苏后卷土重来。然而，“百年一遇”这样的词汇，已经提醒人们，即便渡过危机，世界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那些曾经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东西，真的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在这种担忧和疑问中，谁还能高

兴起来？

2008年的中国，确实还有值得真正高兴的闪耀。从年初南方的冰灾，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大自然在2008年给了中国一连串巨大考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人没有丢脸。全体中国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人们的善良和关爱由衷地迸发，人性的光辉不仅令世界惊叹，也感天动地。这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消失的美好的精神。只要这种精神在，我们还会害怕困难吗？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人的美好，也看到了范跑跑之类的存在。回顾中国近代历史，30年来中国的变迁虽然令人赞叹，却还有无数的事情等着我们中国人。我们需要一件件地做起来，需要从每一个人一点点地做起来。与成绩和美丽相比，无能和腐败还在侵蚀着社会，每一个中国人多么希望腐败的消失，哪怕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们需要无忧无虑、长期持久的高兴，而不是短暂的亮光。

##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王小东

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

2008年与西藏“3·14”有密切关系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中国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是在很长时间的积累之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年轻的一代跟西方人的关系变化了。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澳大利亚一个认识我已十几年的外交官来找我。她也很担忧：事情怎么弄成这样，中国人跟西方人翻脸了？她问我：这件事的最重要意义在哪儿？我说：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件事的最重要意义就是西方人跟中国年轻一代搞坏了关系。对于我们中国可能不利，但是对于西方更不利。她说：你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出来做调解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必须是双方做，我一个人做不了，你们也要做才行。

在这件事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种变化，而且意识到了变化的不可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还以为他们能居高临下来指挥中国——当然这也

是中国精英们给惯的。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群情激愤，有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给中国人提出了很详细的18条建议。他在开头还说：我特别怕我说出来有教训人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说出来的确实都是教训人的。比如说第一条，如果你们看到西方媒体的报道歪曲事实，你应该给栏目的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支撑你的观点，要文明、体面地表达你的观点，写信是个好方法，而且你的信可以免费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其他几条大致都是这个意思：不要跟西方人争吵，而是要努力争取西方人的好感，让他们能够接受中国人。我说：这个美国人首先就搞错了现实的力量对比。我承认我们还需要争取你们的接受，但是你们要不要争取我们的接受？现在的事情不是汉人跟西藏人打了架，到你西方人那里去请你们当裁判当法官的。我们用不着什么事都要争取你们的接受。你那些东西我接受不接受还是一回事呢！我说：你们这么理解问题，就全错了。

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尤其感觉良好，比在美国工作的美国人感觉好得多，因为国内有一群围着他拍马屁的中国人。所以他才觉得：我可以教训你们，你看你们这帮傻冒，你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取得我们的好感吧！我说：去你的，我们凭什么非要

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取得我们的好感吧！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是我们需要单方面取得你们好感的时代了，你懂不懂？将来我们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

坦率地说，这个美国人是 个有代表性的傻冒，是一个因为在中国工作被中国精英捧坏的傻冒。其他一些西方人比他聪明，我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外交官，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她就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有人说中国人都是面瓜。其实，中国人面瓜是在国内怕警察；现在的年轻人在国外都敢揍外国人了，凭什么说是面瓜？

在中国，如果不是警察护着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耍横，不打死他们才怪。后来我跟好几个西方外交官、记者说过：你们好好跟你们的公民说，奥运会期间你们的公民千万别闹事，万一中国警察罩不住，你就死在这儿了，不值。那个澳大利亚外交官就说了，我们特担心这个事，我们在外交部网站上都说了，警告我们的国民了，千万不能弄事，到时候被打死了我们没辙。到头来还是死了一个美国人，但不是为这事，是冤死的，没干啥事就被杀了。

实际上，中国的精英和官员没有认识到这股力

量。那些被中国人惯坏了的外国人也没有认识到这股力量，但有些外国人看到了这股力量，所以那个以色列残疾运动员骂了中国之后，以色列总统赶紧出来道歉。

中国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很多方面赶不上中国或者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赶上他们，在物质层面、在生产层面、在现代化技术层面上很多的东西，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法再跟中国较量。因为几百年来，西方文明一直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包括“文明终结论”也一样，到头来再没别的东西，只剩最后一点道德优势，说你们中国欺负西藏人吧，欺负少数民族吧。拿最后一点道德优势想挽回面子，给中国找点麻烦。这是某些挑头人士的内在心理，其实却干了很自相矛盾的事，你这么干，等于承认文化多元化，不一样的文化都应该有权利存在，那凭什么非要说整个中国文化都不好，非得搞跟美国欧洲一模一样的普世价值？这两个东西是自相矛盾的。在西藏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看明白了他的双重标准是怎么用的，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关于西藏：甭跟他们玩考据！1959年拿下的又怎样？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就西藏问题答西方记者的谈话里说：要说事实，至少清朝应该没有争议的，但是，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如果他们自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对他们有好处。中国政府，还有学者，跟他们争到底是哪年是对的，一定要争。但是中国民间要告诉外国人，1989年、1999年占的又怎么样？有本事你来抢。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退一万步讲，就算藏独和西方一些人能够证明在1959年之前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又怎么样呢？中国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西藏的独立吗？还是不能。我可以告诉西方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那段由留学加拿大的21岁中国青年所做的视频《西藏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一部分》里面的那样：如果西方人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等所有地方都卷铺盖撤回欧洲，我们也从西藏撤出来，否则，就不要跟我们谈这个问题。从道义上讲，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如此。从实力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肢解了南斯拉夫，那么今天，美

国做好了肢解中国的准备吗？藏独和疆独，还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指望着美国人来肢解中国。但美国人做好这个准备了吗？美国人愿意为了西藏而与中国这个核大国一战吗？至少从美国人的言论来看，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西方人对于西藏主权问题的质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引起的只能是厌恶和不屑。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比如王力雄，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要是你们从澳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全卷了铺盖，我们就从西藏卷铺盖。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

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独立问题上就是这么回答的。你说什么国际法，去你的吧，我就打压，我就承认南奥塞梯独立了，你有脾气没脾气？

是到了西方也来考虑一下中国人的情绪的时候了，现在欠缺的，不是我们“主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不少了，而是西方端正态度的问题。在那次访谈中，我这样说过：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

的世界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不认为西方人有资格来充当裁判官，中国人在2008年4月所做的，本来就不是乞求西方人接受中国人的观点或接受中国人，而是向西方人表达中国人对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表示中国人不接受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和行为。至于西方人对此是否会像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所担心的那样，认为中国“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人不得不十分在意西方人怎么想，他们是否接受中国，而西方人则不必考虑中国人的感受，不必了解中国人怎么想。西方人和不少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那位好心的美国人才一开口就要求中国人要让西方人感觉舒服，而忘记了被激怒了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并不想让西方人感觉舒服——他甚至都忘记了，美国的国父们当时也没有给英王写一封礼貌的信，用礼貌来博取英国人的好感，而是拿起了武器）。然而，这样一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也是不道德、非正义的。即使我们不谈道德和正义，仅仅是从实力的角度说，这样一种关系也早已不符合中国与西方的实力对比。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必须处在一个更平等的关系之上，如果说中国人应该努力争取西方人的接受，那么，

西方人也需要争取中国人的接受。如果今天仍占据实力最强地位的西方人和拥有13亿人口、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人不能互相接受对方的存在——即使这种存在并不能让另一方十分满意，那么，高兴的只能是蟑螂，而人类的前景则会非常可悲。这一点，很多西方人似乎并没有明白和适应，有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明白和适应。然而，为了人类能有一个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未来，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必须明白和适应这一点。

要让对方接受，就有必要了解一点对方的想法。从中国这方面来说，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除了少数年份，中国人都在努力学习西方，努力了解西方人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西方人的首肯，什么事情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即使这样，也许中国人对西方还是不够了解，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努力去做。我认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至少不像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那么离谱。我们从旅美电影女演员陈冲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得知，某些美国政客居然声称：对火炬接力的抗议会“为旧金山民众提供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来帮助13亿中国人获得自由和权利”。陈冲写道：“再没有比这样的说法离事实更远的了。”我的印象是西方人当中这类离谱的说法很多，很流

行。我确实感到，西方人，包括他们之中的汉学家、新闻记者，乃至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人，也许被那些因为有求于他们而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惯坏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太不了解了。这种不了解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傲慢，还是出于包围着他们、向他们献媚的中国人的欺骗，都是危险的，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不幸的。现在，确实轮到了西方人做出一点主动的努力，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人的想法的时候了。

我就是想帮助西方人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的一般人——当然主要就是汉人了——对于西藏问题的一些看法，以及由西藏问题而导致的对西方人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会质疑我凭什么说这些看法就是中国一般人的看法——我没有做民意调查，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是学术性的。但即使我做了严格的随机抽样的民意调查，写成学术形式的文章，同样的质疑还会存在。但我想，2008年三四月份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是我在下面将介绍的那些观点是中国一般人的观点的最好证据。据说，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的事情使得不少西方人很“震惊”。其实，如果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想法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就不会感到“震惊”了。

其实中国的小资们挺喜欢西藏文化，当然包括

我这个不算小资的，我也喜欢。外国电视台到我家来录像，我就让他们看我的佛像，我告诉他们，我的佛像中只有一尊是汉传佛像，其余都是藏传佛像。我给他们讲汉传佛像和藏传佛像的区别。汉族人喜欢西藏文化的很多了。汉族人是把西藏人作为兄弟对待的，是很爱护他们的，绝没有敌视他们、迫害他们的心思。我说：你们西方人最好懂得这一点，也别听西藏人当中的少数人误导你们。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讲道德！就像网上那个年轻人所说的：你从世界各大洲除了欧洲都卷了铺盖，你就有道德了。

##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 精神品质

宋强

回到常态：道德上没有谁比谁更优越

2006年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图书选题，名叫“驻京办”，不是后来出来的那个特别火的《驻京办主任》，为什么这个选题我们准备得非常早，却失败了呢？因为我们这位作者朋友的写法和思维是非常不对的，写法不对，会造成一个非常好的选题白糟蹋了，东北话说：瞎了。那个小说有很多令我们困惑的地方，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小说一上来就出来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表面挺廉洁，却有十个大小老婆。我们跟作者沟通，说现实中有妻妾成群的案例，但是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这也不是一个常态人物，按照术语的讲法，“这一个”没操持好。小说好比一道菜，你上来这么加佐料，读者肯定会对你的功力不信任。总之，小说靠这个来呼隆，不是一个好的走法（地摊文学这么表现倒可以）。在常态中揭示非常，揭示非常之所以然，这才是社会小说写人状物的合理路径，也体现令人信服的功效。

我引这个头的意思是，我们的思维品质，不应该被猎奇文学的套路所左右，虽然生活时时在模仿

艺术，虽然我们在当下看到的荒诞，不比荒诞剧更逊色。我们也可以因为失望尽可能嘲讽，尽可能展现我们“消解”的功夫，我们可以以辛辣的口吻评置八方神圣，然而“消解”了以后怎么办？就如李泽厚所追问的：“解构之后总得有所建构吧？不能仅仅剩下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当下’吧？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可以走极端，往解构方面走，但是在伦理学以及整个社会建设方面，就不能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如果把一切意义都解构了，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原则都解构了，那社会还怎么生存发展？”

我经常和朋友们交流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西方人差得远，中国的人生困顿严重得多，现代化进程还有待普济，有待完成。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一些中国人，最爱显露出一副超级嬉皮士和后工业弃儿的样子？为什么偏偏轮到某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在乎，把缺乏敬畏当作潇洒、当作人格强大？我所知道的美国人，那么单纯地爱慕着自己的战斗英雄和国家的图符，那么傻里傻气地爱戴自己的体育英雄，按照我们的标准看，他们哪是洋人啊？个个土鳖，整个一个幼儿园嘛！我所看到的日本人，交际语言不像中国人那样富有文学潜力，更缺乏我们所说的“职场智



慧”。他们确实“小”啊，一望就看到底啊，愣头愣脑，个个都像“新来的”。且不说韩国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排队贡献金银首饰的表现，韩国人会这样由衷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我们国家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比起那些连水都喝不上的国家来，我们生活在多么好的国土上啊！”——这类语言，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前面，多么“老帽”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显得那么不纯朴，应景催情的修辞手段这样发达，在很多很容易解决的基本概念上，却永远是反向思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在这里作态撒娇？

我们时代的流行口号是“让生活更精彩”，谁也不会去拒斥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规律和稳定心理掌控的情绪节奏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具有的品质。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我个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单指人群，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选票民主中暂时未显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如：个人内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许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为落点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个人变得愤慨而无理的时候，他距离他个人的真相是很远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依

托正常的感情来判断事物，说白了，就是理性——虽然现在，“理性”这个词儿被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们糟践得不成样子。

越是在信息的迷雾中，越发显示出达到真相的常态路径的可贵。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首要的意思，就是十多年前在“说不”一书里讲过的话：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一切负面的因素，其实在丰富着我们的感情，激励我们趋善避恶，而不是导向失败主义。其次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此时，此刻，现今，现地，让飞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们以常态心看社会，以常态心看人，甚至以常态心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就不容易了。当年分析李登辉，我们就尽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道理很简单，假如上来就公告李登辉心理扭曲，这也未必公允，他走过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他和司马辽太郎描述“二二八”血腥之夜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所幸这段话出版社没有给删掉。台湾人告诉我，这样的表述，至少比“把李登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样的时评容易让人认真对待。当然，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单说宣传的可信度的问题，极端并非常态，人不能老靠激越的感情活着。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一个哥们儿化了点缘，到都江堰一所学校去捐。殊不知人家学校不太领情，他愤怒，开始“吁天”，骂人家利用爱心牟利。我赶快告诉他你别再发短信散帖子了，别再搞兴奋点唤起网民兴奋至死了好不好！你不能指望人家老是在凄惨的心情里任由摆弄，今天我们为死者哭泣，明天一切还是要继续，人家还不是要为自己的单位经营，要算计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你不能因为人家遭灾了可怜了，就剥夺人家从长计议的权利。况且还不说你也有图谋在里面，你就更没有必要这么理直气壮，认定了自己道德上比人优越。这事儿后来我问了当地一个副县长，说很多单位拿钱，指名道姓就是捐那一两家学校，当地民政部门只好搞个排名，谁捐得多，谁拿这个冠名。虽说变了味儿，但也可恕。要以常态心来看这个事，你要拿这个制造兴奋点，就未免太不通人情了。这个就是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

查遍百度，找不到“愤懑主义”这个词。但这个词大概也不是我生造的，忘了出处，但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现实。何谓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就是为找兴奋点而“义愤”，如今，兴奋点带出的言论盛筵花团锦簇，时时刻刻触摸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愤懑主义”，是一种时髦。但是不断堆砌群体感情的兴奋点，引导愤怒的撕掳和咆哮，制造廉价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情感又和娱乐消费有什么区别？

愤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孪生兄弟

也许在庸庸碌碌的生活现状中，愤懑作为一种个性，自有它正义的依托，自有它的特殊的感染力，网络文化、酒局文化和无厘头文化，造就出了非常多的可爱的事物和可爱的人物，可是任其泛滥，也造就了为“反”而“反”的文化标签，造就了萨哈夫式的民间语言大师，造就了娴熟的批评和围绕这种言论的狂欢，供我们消费，供我们打发时间；但如果永远不打算把愤怒号列车驶向另一个轨道的话，我们就离失败主义不远了！

到了2009年，施虐性的语言、暴力语言也许会进入“审丑疲劳”阶段，因为表演得太过余了，抖机灵抖过头了，不给人希望的指向，为“反”而“反”，必将会遭到厌弃，因为它不符

合人们正常的感情。我已经从日常细节中看到对愤懑的逆反，一位女士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入理。她说：常听某些人谈某些事，听了一整天我心情都不好，因为觉得他们特别猎奇，总爱把一系列的黑的、假的、丑的、无望的缀在一起讲，愤恨切齿，“撕着乌贼下酒”，做革命党状。其实不能解决问题的丝毫，徒增郁闷。他们也会讲得很精彩，讽刺的才华很高，我承认一开始听了后情绪挺激越，但时间一长，觉得自己的负面情感也多了起来。很迷茫……这位女士表示不再参加这种“话局”了。

愤懑主义，普遍的实际效果，就是仅仅教谕人怎么去绝望，去助长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愤懑主义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样子，其实细分析一下，这一点也是大成问题的，甚至从一般社交意义上说，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为愤懑的劲头儿上来，人的状态是赖了吧唧的，认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认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应态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会去省察究竟为什么。

也难怪，愤懑主义的表征就是以对立态度活着，永远显得清醒而对立，清醒而偏执，我2003年在《新周刊》上说的一种精神现状，“清醒到了

偏执的程度”，把形而上的孤愤演变成丰富多彩的现场秀，对一个个现实问题，总会有些奇谈怪论。

奥运会期间，传说有外国人要在某些场合预谋打藏独旗帜，我们议论这件事。

一位朋友说：要被我撞见，我肯定抽他。

愤懑派朋友打断他：你凭什么抽人家？啊？

两个人吵起来了。

我跟愤懑派朋友讲道理：你动不动玩“棒喝”的心态是成问题的（愤懑派总爱棒喝，就是自以为随时承载着催别人猛醒的使命，别人都是奴化教育下的侏儒，唯有他见识高过众人）。我倒问问你：凭什么不能抽？有意识地冒犯别人，一准儿就是找抽的。肆无忌惮羞辱我们，就该抽！

愤懑派朋友回答：羞辱了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

“这个国家是谁的”“但是这个国家爱我吗”这一类乍看有力的反诘，永远是愤懑派的法宝。它的有害性已经不需要从逻辑上辨析，这么些年，“逢中必反”在思考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它存在的理由，引起喝彩的可能性，都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体制的不争，怪现象的层出，丢人现眼表演不断，都会给“逢中必反”的老货色“青春勃发”提供新依据、新理由。但是愤懑派想没想

过，自己有可能陷入悖论，在鞭答丑恶的同时，有可能把自己也变得丑恶无比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余世存的文字凸显中国部分知识精英的自虐心态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在余世存那里，在以“布道”之壳施行对种族、对社会的自我咬啮——

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笔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余世存《成人之美》）

不明就里的人，会为这样泪水盈盈的抒情触动，多么杰出的悲情表演啊，多么崇高的情怀啊！最有煽情效果的画面这么一剪贴，知识精英的圣洁

伟岸高大和这个国家的污秽卑劣渺小昭然如此了！  
尽管为戏剧化效果而喝彩吧！

可是这种招数，和另外一种“底层智慧”有什么区别呢？生命的原动力，驱使我们欣欣然于这样的“童话”，而对自己通体的肮脏不能觉察。这个广泛流传的“童话”就是：蛔虫在肛门口对它的后代实行“爱国教育”。“本土愤懑”愤懑到了这个程度，居然有人喝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余世存对虫豸的想象，倒是符合他那个圈子的中国子民的真实状态。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



群。（余世存《成人之美》）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愤懑主义爱好者如果嫌自己的辱骂修辞欠火势的话，尽可以从这样的“天厌中国”的决裂中找到共鸣，并获得醍醐灌顶的快感。看到这样的文字，想着他那异常的亢奋，忽然联想到朱苏进早期小说《第三只眼》中那个在广播里搞“心战”的窥视爱好者，他如此洋洋得意，把脏的、丑的、恶的——展列，意图让一个阵营崩溃，殊不知在兴奋之中袒露了自己的恶、险、秽，让人把他看低。孔子说的，少正卯“行僻而坚”“记丑而博”，大概就是中国文献最早关于变态的揭露。让恶念挤对着自己迸发出这些文字，不去抑制自己啃指甲的冲动，把歪曲和侮辱当成诗性（或许他认为还有“神性”，不过走偏了，神叨叨的，看着像人民圣殿教的语言），早些年火旺的书《中国“左”祸》，引用了一个外国评论家的话，大意是，有缺陷的文字会潜伏着不祥的命运，这话很妙。我借来这个说法，我认为文字的生态会流露出某种秘密，特别是一个人有一半可能非人的秘密，比起非人之畜类更不如的是，他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变态心理。至少我从余世存先生的文字中领教到了此言非虚——

作为世界知识下的地方知识，中国知识也是最为错乱，充满罪性，人类知识含量最为低下。经过了当代中国生存的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罪错，但他们不经修省、懊悔，反而主动被动地做了专制大家长怀抱里的类人孩，求取或暂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红利，变本加厉地加入了中国繁荣或崛起一类的合唱。……导致大陆中国上千天和，下遭人谴，生态、世态、心态污染而匮乏，使得真正的孩子们，那些有机会蒙面的网民或实名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为狼狗们的声音。（余世存《成人之美》）

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种群，在近代以来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沦为流氓无赖，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它无力正当地分享文明，无意服务于国际社会，而以自身内部的整肃、杀戮、剥削、压榨、污染为生存手段，如此酿成的中国劫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劫难逃。今天，在自然环境的崩溃性灾难中，中国人又在收获更大更长远的劫数报复。这一中国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同上）

这是知识界颁给“汉语贡献奖”的杰出人物对中国面貌的描绘。罗森堡对波兰人的诅咒都不曾切

齿如此之极，所不同的是法西斯理论家所攻击的是别的民族，余世存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民族。

愤懑不合作主义者历代有之，甚至说了：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伟大的愤懑象征。然而鲁迅会写信给一位怀才不遇的书生，劝告他：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对于滑向“别处”的当代愤懑不合作主义，则可以这样评判：有悖于人的道德。

而这里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一般的当代愤懑主义，基本上只是拿我们的传统、历史、体制施虐。而像这样的怨恨的剑锋直指80后，可谓是把失败主义推向极致。他都不要青年了，没心思去争取青年了，不是失败主义的极致还是什么？

“贱民的时髦”

咬啮，仇恨，卑劣的冲动，可耻的抽搐，这种阴冷的景观，负面的情绪，难道应该支配我们的情感吗？你别以为跳跟着咒骂的，一定就是悲情使然、可贵的文人孤独感使然，我看到的，是押宝，是押仇恨势力的宝，是借助仇恨的能量抖搂自己的私货。因为仇恨，是有天然的“场能”的。

然而陈永苗说得好：“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内战，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让自己长

满胡子。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是要唤起全体普遍认可的诉求背后的爱，而不是扩大仇恨。”

若干年前，我也写过这样的话：问题就在这儿——某些在国内、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代表书生，披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包装，在这种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抛出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估计：不讲道理，不修仁爱，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一句话，百年惨无人道的中国历史罪孽深重，叫别人灭了去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并没有把愤懑主义一棒子打死，我想还是得重复这样的观点：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为了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懑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然而求索的目的是什么，是渲染仇恨吗？是让我们看不到希望么？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吗？为了显示一种学理上的新颖，把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美感抹杀得一文不值，把我们民

族刻画得卑鄙而渺小。我们的民族现实被描绘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为出发点判断我们的国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部分中国人永久性记忆和常识的一部分，一种比较普遍的深蕴于我们心理中的几乎约定俗成的心理现实，几乎成为我们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晦气重重的历史，几代人都像傻逼似的活着，我们多冤哪，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爱这个国，我们有选择离弃她的自由。

我们的历史悲情，就这么延续下来。至少证明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庞大的知识集团，在精神构建方面，在自觉不自觉地涣散着某种热情。而让人最为失望的是，在观念交锋方面，我们只看到“非此即彼”的两端，而很少那种沉稳的中间值。大家的思维没有明显的进步，因为知识精英们的兴趣，总是把一个国家划分成对立着的两方面。这还不是竞选政治里的常态的对峙，也并非人们标榜的“多元”，往狠里说，是武侠小说的杀伐。我们时代的普遍的、蕴含在日常经验里的悲剧，我在后面还会讲到。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30年，在一个时间走廊里，尽管遭受了挫折，国家的存量是一顺儿码下来的，就是央视播的《复兴之路》呗。

2006年张小波和我接受《南华早报》采访，关于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感想，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家独立、社会革命（包括妇女解放）、工业革命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首先最大的功劳是实现独立，有点遗憾的是，“独立”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感的名词了，古旧得大家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独立？独立还需要说吗？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需要特别说道吗？”血迹已经淡漠，时代多么太平，这是心理悲剧还是历史悲剧？再举一个不大妥当的例子，改革开放初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突然变现出那么多财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把它一刀切得那么齐整，也太不厚道了点吧？我们不想否定毛泽东，也不会假装不理解“伤痕派”的情感。我们也明白，心中有不同立意的派别，会有意无意拿这两个时间段来对打，来“对冲”。到了2009年，两种情绪对撞可能又会热闹一阵。毫无疑问，我们是拥护改革开放的，而从历史逻辑来看，改革开放是前30年流变的自然结果，我们应该为中国人的整合修复能力而自豪，为我们比某些邻国幸运得多的运道而合掌。这不是和稀泥，各种各样的“记忆”描述，应该体现一种温暖的友善的态度。退一步说，不友善也行，对撞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也挺好的，但我基本持悲观态

度。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什么焦点之争，有好些个，都是一帮文科知识分子自己幻觉出来的，场能有多大，经得起几分的历史检验，还得看。还是1996年的话，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还是认同韩毓海那句话：能不能把中国的问题当成现代性的问题？这个话的意思是怎样看毛泽东时代，且不说“开创”“奠基”，仅从经济建设上看，那至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代，而某些“伤痕学术”的做法是，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一种色彩，这种手法也是极其粗暴的。基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把60年的国家历史一顺儿码下来，严肃郑重地审视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我在一个三线的山区工厂里长大，那是一个造军舰的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中央领导还去了这个厂，站在一个船坞上，拿着扩音喇叭对工人们说：这个厂一定要保。工人们那个欣慰啊，可是没多长时间，这个厂就保不住了，破产了，把老工人给异地安置了。那些参加早年创业的老工程师、老技术人员，早就回了北京、上海、大连，退休了以后，作为旅游者回到老厂，凄惶得不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奉献，就投在这段江湾里了，他们有资格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聪明人会嘲笑这种感情，而我笑不起来。上下嘴皮子一翻，把

几代人的努力贬为乌有，那是很容易的事。普京说了一句话很好：想回到过去那是没有头脑，而不怀念过去，那是没有良心。引发开来，这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色彩的问题。关于三线建设，我有我的看法。我也知道，喜欢对着历史卖俏的知识分子经常说“劳民伤财”，说“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是个错误的推断，我们穷兵黩武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讨好听众的说法，而我知道李新中先生到北京某个大学演讲，讲到三线建设问题，刚刚开个头，就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说了一个比喻，一家人生活挺困难，但是还是安装了一个防盗门，防盗门装上了，家里没有闹过贼。时间长了，儿子抱怨：这门安个啥劲儿？你看根本就没有贼，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以这种逻辑评价三线建设，公正吗？——鄙薄我们的历史而对着现世卖乖的说法，就有点像这个轻浮的儿子。防盗门的比喻当然简单了一点，把这个历史一顺儿码下来看，我们的核弹，我们的北方公司，现在看来，对国家的底牌，对国家命脉的延伸多么重要！这还不仅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军工遗产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公正地对待前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我希望在60周年纪念的时候，趁着整合一部大历史的机会，尽量怀着一种“不能忘怀”的敦厚，



本着一种岁月和解的胸怀，给我们的上辈人多一些致敬，给尽量大多数的人一些致敬。60年间，人民的勤劳、军队的忠勇，造就了这个国家的不凡。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国观察家这样的话，中国是“有一等抱负的三等国家”，幼小的我竟然有些气短的反应。事实上，这些年来，抱负、崛起、雄心，还有张小波、宋晓军等人说的“英雄国家”，这一类自我表征，在主流叙述里，已经非常温柔敦厚，几乎归于零了。我在想，假如时光倒转，我们的上一辈能够从他们的年代放眼看过来，看着我们的舒坦（据说还挺富裕——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富翁了吗？），又看着我们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看着我们睿智的处世，看着我们无休止的自我责难，看着我们机会主义的“事大”身段儿，他们将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义。

失败主义的调值，撒娇式的玩愤懑，相辅相成，不知不觉成为“贱民的时髦”，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心理性悲剧。归到底，就是煽动大家都不负责。这种精神现实，对中国的复兴和民族利益是有损的。说出这个，也不怕谁起哄，我就高调了，怎么着？愤懑孪生的失败主义对待正面的价值，口头禅是：装逼。我觉得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谁都不

装逼了，这世界就乱套了。这话说得不好听，可话糙理不糙。

##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宋晓军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

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

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286”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

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

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

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



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王小东

关于“文艺腔”，有两个方面：一是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二是把“文化”“软力量”等放到了过高的位置上。

缺乏逻辑的“文艺腔”思维，首先我们来谈谈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讲逻辑，缺乏对于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讲辞藻的华丽、感情的激动，只诉诸人们的感官、人们的表层认识。为什么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文艺腔”？坦率地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个人所接受的基础训练有关。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理工科训练的人犯这种思维毛病的比较少；但绝不是说，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没有这个毛病，更不是说理工科的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犯这个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问题上往往由于缺乏自信而特别容易受“文艺腔”误导。一直接受文科训练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逻辑思维一样很强。按说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维上的差别不应这么大，这里反映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艺腔”对等于文科生，理工科思维对等于理科生。

我在这里可以举某些“文艺腔”们的一些毛病。比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是讽刺“小

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击中了“小右”们的“文艺腔”思维，我在这里引用几条：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因此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的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要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他说：“我咒骂古代人？我这叫勇而知耻！”你问他：“勇而知耻是反省自己，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为什么把诽谤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说：“祖宗对不起我们，祖宗害了我们啊。”你问他：“中国古代领先，现代落后，你为什么不自向祖先请罪？”他说他没错。

他说：“唐玄宗纳儿媳，那叫乱伦。”你问他：“查里二世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乱伦？”他哑巴！

他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还留着干吗？”你问他：“外国人保护古代建筑。”他说那叫爱心！

他说：“项羽破坏文化，野蛮！”你问他：“阿拉里克（更正式的译法是亚拉里克）焚烧罗马，野蛮吗？”他不晓得阿拉里克是哪国人！

他说：“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细菌。”你问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么讲？”他说那叫保留营养。

他一会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不知道羞耻！”一会又大骂中国的文化：“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虚伪！”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别以为这样思考问题的只是一些“小右”网民

而已，当代中国无数的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出多少。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嘲笑传统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懦弱无能，但是，你只要一说“尚武精神”“加强国防建设”，他们就会立即跳出来破口大骂你是“法西斯”。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们骂痛快了就好。还有，你一讲“强国”，他就说“长江都快变成第二条黄河了，还要什么国！”他们就不想一想，要解决“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就更需要强国。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文艺腔”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艺腔”思维，认识问题缺乏逻辑，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得十分完美时，他就忘了，如果那时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么解释我们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极为激烈的批评，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制衡等等主张。

这里面有无知的因素，也有装傻的因素，但无论是制造这些自扇耳光“启蒙思想”的人，还是相信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装

傻，是真相信，同时也不完全是因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所以晓军将“文艺腔”比喻为“286”，其实是很贴切的。“286”的中央处理器，你给它配上再好的内存和硬盘都不行，它就是处理不了这些信息。

“文艺腔”们一方面气壮如牛，对于理工科思维不屑一顾。比如20多年前，我与“河殇”派辩论时，他们就说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没有资格参加辩论。我曾碰到过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说：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终极关怀”。我当时笑答：请你告诉我，“终极关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门专业的？我也曾碰到过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业家，声称：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艺腔”们内心却又往往相当自卑。我这里可以举王小波的神话这个例子。王小波的神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谓的“理科思维”“欧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说：他是一个学理工的改行写作，并且他的理科思维特点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逻辑色彩。另有无数的文章吹嘘他的“欧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计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学文科的，至少是没有真正养成理工科思维，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历史。因为他们

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科生，他从来就没有修习过任何真正的理科课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几门计算机课程吧，还没有拿到学位），坦率地说，他的思维特点在真正受过严格的理科训练的人看来，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逻辑，非常“文艺腔”的。这一点不单是我自己这么看，有一个喜欢、同情王小波的网友说得也非常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我看来，小波文章的逻辑，的确如你所说，比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识大概全是自学的，支离破碎，对写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仅仅凭着自己摆出的一副所谓“理科思维”的架势，就蒙住了无数的“文艺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较嫩、还没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维的理工科学生。这充分说明了“文艺腔”们自己在内心是认为自己的“文艺腔”思维远逊于理工科思维的。

“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艺”广义一点），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

开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当然这不仅仅是“文艺腔”的问题，还有中国的“软力量”的其他软肋，如民主等问题，因偏离了这里的主题，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中的有关论述），投上去的资源除了解决了负责这一块的个人腰包，没有给中国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这里决不是说“文化”“软力量”没有重要性。“软力量”确实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原来是学“硬力量”的，现在干的却是“软力量”的工作，这就已经说明了“软力量”的重要性。回顾当年，我在本科学的东西是与高端技术、国防工业相关的，我的那些没改行的同学，不少至今仍在这些领域工作。我为什么要改行呢？因为我当年已经认识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学的那几年里掉头了，我们的前途将大打折扣了。要把这个方向搬过来，需要的是披上“文艺腔”外衣的“软力量”（虽然当年还没有这个词汇），所以我弃理从文，颇有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那种想法。记得有一次在乌有之乡开会，晓军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思想领域的争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防工业。当时，杨帆不同意，他说：如果思想领域打



不赢，国防工业就不可能拿到钱去发展。这时站起来一位听众，自称是属于国防工业的，说杨帆这个观点太对了。还拿计算机打比方，“文艺腔”是友好的界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友好的界面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首先，“软力量”虽然有帮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还是得有“硬力量”为基础。这些日子热映《梅兰芳》，又有文人出来写博客感叹了，说是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风靡”也是被夸大的了，于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里自怨自艾了起来，但有一个跟帖发表了话糙理不糙的意见，它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当然不是鼓吹咱们现在就想办法去美国设立军事基地，而是说，它确实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之间的关系。说实话，如果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中国人有几个会去喜欢西方的歌剧？即使今天，我也从根本上怀疑那些花重金去听西方歌剧的小资是真的喜欢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欢，但他们不敢像西方人评论中国的京剧那样毫无顾忌

地说出来，他们必须装作十分喜欢，不然他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文明”。

其次，在当今中国，“软力量”应该用来为提升“硬力量”服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像现在的那些“文艺腔”所做的那样，自己扩张自己，搞自肥。这里的关系可以拿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来类比：金融市场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结果它却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自我膨胀起来，最后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严重牵连了实体经济。

我们今天就算搞的是“软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艺腔”，其背后的思维应该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应该是为“硬力量”服务的。只有当我们的力量大到无与伦比，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时，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为软力量而软力量，纯搞“文艺腔”。当然我并不是完全排除纯娱乐，纯娱乐也是需要的，否则他们那顶“法西斯”的帽子马上扣过来了。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让“文艺腔”占据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间，主导了中国的大方向，这就不行了。

“文艺腔”确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但我们已经玩不起这种奢侈的传统了。中国古代就特别重视诗词歌赋，而不太注重逻辑思维。其实，在先秦的

时候，中国人还是相当“理工科”思维的。虽然中国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较明确的形式逻辑，但当时理性、务实的精神还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看看当时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各诸侯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不太“文艺腔”。“文艺腔”的开始应该是在汉代，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过于偏重华丽的辞藻了。但古人对“文艺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宁变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举中的诗赋考试，使得考试能够选拔出更为实用的人才。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诗赋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认识到了“文艺腔”的危害，因此想采取行动予以纠正。可惜的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文艺腔”有不小的危害，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应有的重要位置，有识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这恐怕也可以用我经常使用的“选择压”的概念来解释：到了汉代，中国最激烈的战争打完了，按东方朔的话说就是“天下平均，合为一家”。没有压力了，太舒服了，当然可以玩“文艺腔”了。然而，秦汉留下的老本我们已经吃了两千多年，吃没了。到了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挨打和挨饿两大问题，实际上是玩不起“文艺腔”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

而，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的惯性是相当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艺腔”还在阻挡我们现代化的脚步。

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观察。要论最优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国一流大学里这么多的天才，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可以很快赶上去。我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即科学技术用不着考虑人均素质，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东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后来我回到国内，进入了社会，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国虽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国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数学、逻辑的素养远远比不上日本大学生。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100多年之后，与日本相比，

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素质仍旧差得很远，仍旧过分“文艺腔”。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只靠少数理工科天才，一个国家的进步是要讲人均素质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科技素养都这么低，那么，正确的意见就会被埋没，少数优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会可以利用的财富。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王小波的例子，一个半吊子自称的“理科生”，随随便便就可以蒙住这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这些人心目中成为具有“理工科思维”的神，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科技素养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必须摈弃“文艺腔”，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现代化，并进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黄纪苏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呱呱呱“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

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

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東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



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

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

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 附文1 一个国家的欲望与恐惧

张小波

在新近读到的一本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研究著作里，作者（姓名忘了）指出，出生并成长于奥地利及捷克背景下的卡夫卡较之他苦难的同胞具有更尖锐的“犹太人性”，而贯穿其短暂一生的文学母题便是“欲望—恐惧”，这种合二而一的命题构成了足以令其生命形式崩溃的秘密咒语。很多年后，村上春树在《奇鸟行状录》中借一次意义深远（这种意义至今并没有加诸中国人的心灵）的战役——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战——来探讨“日本性”及“日本人性”的形成。我确信有九成以上的中国人迄今为止对这次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日苏大战（它是有史以来日本高级军官阵亡最多的一战）知之甚少；而我又无来由地确信，在日本和俄罗斯，关于此役的各类书籍肯定蔚为大观。

而中国性，进而言之中国人性，一百多年来从未得到过准确而清晰的梳理与表达，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这种阐述尤为暧昧。但是，虽然成因不一（中国的苦难与犹太民族的痛苦分属两种类型），但这个国家仍然在其自身的历史中模拟着“欲望—恐惧”的双面影像。令人喟叹的是，被汉语挟持的我们对此进行思考与表述时，往往会变得稚拙、结巴

与倾斜，有时候似乎整个民族都会因为一个偏见而激动着，以至在西方看来“表现得糟糕极了”。

十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似乎具备了上述所言的全部特征，无论从其文本的粗鄙、某些暴力性的征象以及似是而非的结论中，此书都会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读有了一个可以自我原宥的借口，国内也有很多智力优异的知识界人士对此大为光火。记得当时对我们几个作者最为常见的指称是“网络时代的红卫兵”“新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越被批判越高兴的高级牟利团体”……

它巨大的行销量使人瞠目结舌，仿佛整个中国都为了一本书陷入了争吵之中。有的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因为此书的出版，世界银行给中国的XX亿贷款没戏了；而国内某高层人士则下令对作者的身份进行追查——谣言满天飞，一天一个样。作者们也被惊呆了，他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引爆了一颗核弹，其后果此前则一无所知。

问题在于，在当时，《中国可以说不》是必须的吗？换言之，它是几个人心血来潮时的意气之作，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的纸面映像？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是斐迪南王储的死亡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是一战爆发需要斐迪南王储去死？

中国要在不断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确认自己，这样的努力自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变得更为困难和焦灼。事实上，那时候的社会现实承受着巨大的自我分裂的拉力，时至今日，如同天文学家对宇宙大爆炸学说的描述那样，“我们都活在其后果当中”。不要讳言，中国当前的重要乃至首要任务仍然是如何去实现政治或政策和解，政府和人民的和解，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和解，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和解，甚至知识分子内部的和解……

《中国可以说不》无意中承担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试——结论是可怕的，从人心到人脑，其裂缝之大，其隔阂之深，其家园感的疏离和丧失——都使我们对“向何处去”无以言对，让人悲哀的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和犹太民族对待苦难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他们“背负着奥斯维辛去找耶路撒冷”，而我们甚至对“生命之轻”都无法找到一个东方式的承担。

它同时也无意完成了对“中国性”和“中国人性”的阶段性的测试，结巴的社会现实形成一个戏仿式的更为结巴的文本——“西方眼中的我们”“我们眼中的我们”及“我们本来的样子”之间在相互试探、体认；“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可以说”或“中国可以不说”也就不仅仅是对语法

秩序的各种可能性的调整了。“欲望—恐惧”这枚双面硬币的旋转是无法停下的。我们越想确认自己，我们的恐惧便瞬时产生；我们越想告诉世界“我们在”，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们在哪里？”

所以，“9·11”的那些死者对于我们来说是“在”的，因为他们死亡消息同时传遍了全世界，他们的生平、身份、族别印入了我们的记忆之中。而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那些死者对我们来讲是不“在”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在”过，他们不能用死亡来证明自己曾经活过，因为他们死亡的消息永远不会到达世界——这样的“恐惧”是否对全人类来说更不能够承担？我曾经有一首诗里写道：

我要杀死自己  
才能留下一块空地  
让亲人们守灵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说不》现在看来也许就显得荒诞可笑了。最后的问题是，在中国的诺门罕，有过一次惨烈的大战——那时中国在哪里？

（《SOHO小报》2007年第11期）

## 附文2 疑虑重重的中国准备迎接世界

[英]杰夫·戴尔（《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

近30年前，当邓小平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规划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保持低调。他对同僚们说：要“韬光养晦”——否则其他国家会感到受威胁，并一起阻碍中国的崛起。

如今，在北京奥运会开始之际，邓小平的这部分遗产也许可以被忽视了。开幕式由获奖电影导演设计，预算达巨额美元，随着这场开幕式，中国不再“韬光”了。

很少有哪一次体育赛事充满那么多政治意愿。为努力突出新兴大国地位，中国一直致力于邀请世界各国首脑出席奥运开幕式。8年前悉尼奥运会，后期传言说比尔·克林顿可能要出席，把组织者们吓了一跳，因为安全保障是个麻烦事，但中国却以布什成为首位参加美国以外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总统而感到骄傲。

所有那些首相和总统们到场向中国东道主们表示敬意，但他们参加也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也想使这届奥运会成为一届成功的奥运。无疑，美国希望金牌数第一，而有许多政治维权人士，他们把奥运看成抗议中国政府弊端的绝佳机会。但西方领导人希望的是，奥运能顺利进行，因为他们意识



到，那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与世界交往的方式。今年火炬传递引发了游行示威和反游行示威，使他们害怕一个有易怒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对于一个动不动视自己为受害者的国家而言，奥运可能起到安慰或加重的作用。

这种意义远超公众情绪。是更紧密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更为单边的路线，关于这个问题，几年来，在北京对外政策专家中存在着激烈争论。中国在奥运期间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是否轻松自然，可能对那场争论有着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奥运会将导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既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不那么有益的。”乔治敦大学教授、前布什政府亚洲专员维克托·查表示。他著有一本关于亚洲地区体育和政治的著作。“一届成功的奥运将增进自豪感，但要是出了问题，就会有这样的念头：西方总是试图遏止中国，现在他们得到了在阳光下的瞬间，但仍试图要遏止中国。”

中国领导人希望用壮观的体育场和志愿者大军来展现一个日益繁荣自信的国家。皮尤中心最近一项民调发现，80%的中国人对于国内事情进展的方式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尽管从数值上看，个体满意度比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满意度要低，但民调结

果仍把中国排在民调24个国家的首位。

尽管希望很高，但奥运期间一些政治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被骚扰，一些被认为是潜在闹事者的人在奥运期间被赶出城。

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随着大量社会团体正尝试参与本地决策，这个社会变得更有主张，对领导人的要求也更高，大量民间团体试图参与地方决策。两周多前，政府宣布中国现在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美国。到中国首都的游客们，无法不被这个国家快速经济现代化的各种迹象所感染。

西方外交人士希望，这种自信感将鼓励中国更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并帮助缓和某些围绕新兴全球大国出现的紧张和冲突。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5年时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立克提出了一个概念，要推动中国，使之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方”。

“和中国打交道很重要，” 布什总统在赴京途中说。布什挡住了美国国内对他出席奥运这个决定的批评。

在奥运前的准备阶段，中国已抵制了西方让中国削弱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关系的请求。然而，外交人士认为，在当前与朝鲜和伊朗的谈判中，中

国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此外，中国在与其最重要也是最有害的关系——与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中，取得了进展。

然而，来北京的首脑会有一定的不安，因为这届奥运会被潜在爆炸性的动力包围着，而它又是由一个渴望被承认却又害怕任何尴尬的政府和国家主办。

让完美的筹备工作出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从污染造成的运动员健康问题，到围绕抗议者的暴力场景，到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佳。而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媒体则在密切关注可能发生的差错。

围绕奥运火炬传递接力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情绪的预演，而一届令人不愉快的奥运可能让这种情绪宣泄出来。3月份西藏发生了骚乱，随后被平息，此后，火炬传递成了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者们的目标，尤其是在伦敦和巴黎。这些抗议者继而激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激烈反应，他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了。这种感觉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中间尤其强烈，其中包括许多在海外大学求学的学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举行了反示威游行，并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联合抵制家乐福和另外多家法国企业的运动，这是一系列网上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新的一次。

对火炬和西藏的抗议暴露出，在西方对中国及其新角色的看法以及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对火炬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媒体的偏向感到义愤填膺，而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事件可能引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严重对抗性反应。

“在我的国家和属于我这部分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我们处于全面抵制状态，”加拿大籍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迪克·庞德上周警告。“公众意见和政治意见(曾)在向实际抵制本届奥运的方向发展，是(5月份发生在中国的)地震惨剧，才把外界注意力从一些本来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上转移开。”

在每个国家里，民族主义是一种生活特征，但奥运火炬传递挫败，暴露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继续体现根深蒂固的受害人情结。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残暴的外国侵略，中国历史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非常强调洗刷国耻的观点。

牛津大学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指出：“20多岁的人们已在后天安门环境里成长起来，那是一个故意灌输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环境。”他补充说：“中国境内有许多关于中国人感情如何遭到外界伤害的持续性宣传，人们建立起了一种强烈的愤

慨感。”

对于曾教授而言，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可能继续给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造成问题。他说：“有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将反映到中国在中期内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的方式之中。”

对于中国的许多人而言，奥运被紧紧地包裹在那种关于国耻的叙述中。这个国家开始利用竞技体育，作为在输掉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导致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之后，创造一个更强健和更好战国家的方法。徐国琦(XuGuo - qi)有一本关于中国对奥运会态度的书，他表示：“中国一直热衷于在重要国际竞技赛事中赢得金牌，以证明其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新地位。”

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在上届奥运会期间就开始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亚利桑那国立大学吴旭教授写道，当美国NBC电视网评论员鲍勃·科斯塔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对中国侵犯人权和怀疑中国运动员使用药品进行评论时，年轻的海外华人是如何的怒不可遏。他们向NBC狂发电子邮件，NBC后来为此道歉。

徐教授说：“如果奥运会办得不顺利，那可能引发一种复仇的渴望，可能会强化这种网络民族主

义。”他表示，网上民族主义已产生了影响，几位美国运动员本周抵达北京机场时，戴着黑色面罩以保护自己免受污染，在网上爆发了一场抗议。这些运动员最终不得不道歉。

虽然这些类型的民族主义爆发已趋向于加强对政府的支持，但官员们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集合太多动力，很容易就能转而针对领导人。

围绕奥运的是一种好客和怀疑的微妙气氛，政府招募了数千退休北京人来帮助游客，其中的一位对这种气氛进行了总结。曾经当过小学教师的侯远翔(音译)即兴讲开了他对于奥运的态度。

“对于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欢迎你们外国人来到中国，来表扬我们的优点，并帮助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有许多缺点，真的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他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已被你们侵略和欺凌地太多了。我们的许多财富被美国人和日本人抢走了。”他停了片刻，然后继续说：“中国人非常友好，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金融时报》2008年8月9日，冀琴伟译谭卫兵校)

## 附文3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未来

[英]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北京奥运会之壮观强有力地震撼了人们的视听。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前对一家新成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非正式访问，以及

与一些中国年轻企业家的交谈。

这些中国人，无论男女，都非常聪明、敏锐和坦率，不怕就中国及其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充满自信和乐观，不愤世嫉俗，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使我想起鼎盛时期的美国和奋勇向前的其他任何国家。

这些人没有恐惧，而是满怀希望地憧憬未来。尽管中国还有数百万人仍生活在贫困中，尽管中国还存在一大堆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要解决，但是，正是这次体育盛会期间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在我担任英国首相的10年间，我看到了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我曾在讲话中谈论中国，但只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去理解它。没有切身感受，因此，我无法从政治上完全理解它。

自从离任后，我先后四次访问中国，不久会再次访问中国。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届奥运会将给中国留下什么？这次奥运会标志着一个新纪元

——中国的开放进程将永远无法逆转。它还意味着，随着现代中国的现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逐渐减弱。

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东方转移。有些人把这看成是威胁，我把它看作是巨大的机遇。不过，我们不得不发挥想象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任何傲慢残余。

北京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跟20年前我首次访华时的印象截然不同。而且，中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及其取得的进步感到由衷的自豪。

没有一个理智的中国人——包括中国领导人——怀疑中国还有尚待解决的人权和政治及宗教自由问题。但是，也没有一个理智的中国人——包括最西化的中国人——怀疑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中国正在旅途中。它正在迅速前进。但它很清楚旅途还未完成。观察家们应该设法指明前面要走的路，但也要承认所走过的旅程。

中国领导层全神贯注于国内发展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中国的内部挑战对于理解中国及其政治和心理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欧洲有大约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中国的这个数字却接近60%。今后几年，中国将寻求让数亿人从农村移居城市。



对中国来说，这种经济和社会转型必须伴随着政治稳定。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是放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关乎存在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团结一心。这也是为什么西藏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应当继续通过对话，就人们非常关心的这些问题同中国进行接触，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当多少理解一下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这意味着西方需要与中国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要深入经济，而且还要深入到其他领域。事实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充分参与，21世纪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良好运行。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全球大国。因此，无论是气候变暖问题、非洲问题、世界贸易，还是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我们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需要中国利用其影响力与我们配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再提出中国的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民主改革的问题。

有关中国的崛起，可能是被夸大了。譬如，欧洲的经济规模仍然很大，超过中国和印度的总和。不过，正如这次奥运会和奖牌榜所显示的那样，事

情不会一成不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刻。转瞬10年后，人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20世纪前，权力曾属于西方。到了20世纪，权力属于美国。现在，我们必须适应一个新世界，与远东地区分享权力。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事实。对于下任美国总统来说，这应是首要议题。

奥运会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重大的体育赛事，而且人们对体育都普遍热爱，因此，奥运会成为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造成切实影响的事件之一。这届奥运会使世人对当代中国有些了解，而任何演讲可能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华尔街日报》2008年8月26日，宋彩萍译）

##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或者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

#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宋晓军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

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

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

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趋势？其实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自从1895年中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我们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划在了台湾海峡，现在的安全界限不还是在台湾海峡吗？可以说100多年后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当然现在年轻人都认为：之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

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爱好军事和历史的年轻人，马上就想到了前苏联在1929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苏联利用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完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报告，当时苏联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的技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没有利用那时西方的经济危机进行技术、设备抄底，根本无法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我记得不久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起眼儿的新闻，称天水星光机床公司收购了法国一家数控机床81%的股份。就这么一条小新闻，网上的年轻人讨论了好长时间，兴奋了好长时间。其实这个动向与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一致的，按说应该是一种统计文化与统治文化趋同的态势。说白了，年轻人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过好日子、舒服日子，没有军工产业的基础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西方与中国未来博弈的关键点。西



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有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费了那么大劲把德国、日本彻底给压倒了，俄罗斯也弄了个半残废，现在又来了一个马上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按照西方自己发展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没有战争准备。中国人口、资源、地形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发展经济的欲望和能源需求，也许恰恰是中国招来战争的天然条件，同时也是未来世界真正走向和谐的中坚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现在美国与俄罗斯表面上有争夺，中国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可以超然事外，掩饰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从中得好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国，特别是争过霸的大国都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将来是一只老虎，现在这只老虎还太小，而中国这只虎已经足够大了，不能再养了，虽然不一定马上杀了，但至少有限制吧？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过布什政府的一次“霸权大跃进”之后，一定会回归到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上了，而这背后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国当年的经验。其实英国人非常重视印度，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据说英国人认为印度教是可以与西方宗教融合

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冷战期间就认为，印度在整个西方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明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

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国的经济还会振兴。可是我追问了一下是什么科技存量，他们都不清楚。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军事科技，当年要真有可以拉动经济的科技存量，美国这么精明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一定不会对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过头去玩房地产。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积累是不是要靠战争拉动呢？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次战争最好不是美国参加的战争，最好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的国力无疑是最佳选择。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为此我问了一些人，他们有回答是中国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国和印度的。我认为，目前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小于后者的可能性。从

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大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两种假设，那么我们战场建设和应对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向东南沿海倾斜，改为全国均衡布局，同时加快我们的中西部建设。而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希望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有所准备。比如在我国的西部，现在基础设施与东部的经济接轨还有待加强，才能进一步为我军在西部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可能会牵扯到西部的国土整治问题，包括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的尽快实施。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地方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国家如果从安全的高度去审视这个问题，从战争准备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还是最近因孟买恐怖袭击制造的印巴紧张局势，都表明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观点：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就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国防建设的状况看，我们绝不能轻言战略主动权在我们这边。台湾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经济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

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我们毕竟面临着最强悍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西部虽然我们面临的军事存在相对较弱，但是毕竟是两个核国家的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不是小问题。况且我们在西部方向的驻军和作战条件相对较差，这会对我军作战效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内要求打击巴基斯坦的声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学家萨马尔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在“9·11”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准备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计划，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还一时脱口而出说了如果巴基斯坦袒护本·拉登，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可以试想，如果奥巴马上来针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巴基斯坦的局势会非常微妙，中国又是与巴基斯坦军事技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核弹头大约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试验中，氢弹技术还没有实现，可以说与中国差一个级别。但是美国2006年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后，印度极度缺乏的浓缩铀技术可能会得到帮助，印度自己的计划也是在2030年生产300~400枚核弹头，应该说印度试

图与中国实现一种“核平衡”。

在印度孟买遭到恐怖袭击后，12月4日，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专门在纽约的国际分析网站上写了一篇《中国与巴基斯坦：一个邪恶的核联盟》的文章，声称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后，中国马上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994年搁置的核电合作协议。这种声音是美国解套金融危机、培养消耗中国国力的战争代理人的信号。所以我们要要有长远打算，要从危机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能遮盖过去的。人家与你是竞争的关系，怎么会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干扰你呢？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比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更复杂了，可以说马英九是中美“连体婴儿”经济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或者好转，中美这种“连体婴儿”经济都会变化，进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或者东边，或者西边，中国崛起的和平环境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说比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完成工业化试图实现崛起时更加复杂了。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上绝对不会变化。在这里战争因素占多大比例？遏制战争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实力准备、战略布局是不是从一个长远的目标上去考虑？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时

间应对。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

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那中国呢？说实在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老年化社会也在逼近中国，再不确定一个“大目标”，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宋晓军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

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

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

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

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穷钱，我穷钱，最终两家都穷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

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

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

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



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

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

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时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

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

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

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日，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

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

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

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宋晓军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去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博客，认为这样做成本过高、有些操之过急，网上有些年轻人不理解，骂我胆小。其实我一点也不生气，我特别理解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海军走出去，为自己的商船队护航。这与1840年后中国人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受的窝囊气确实有关系。后来我在一篇介绍一本书的博客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我写道：中国海军去索马里护航，从地理上看，确实算是“远洋”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海军战略，这个“护航”就是个临时举动。因为如果没有远洋的战略指导，从配套的后勤补给体系建立到舰船的设计，再到相关的海外中国企业和侨团的配合，肯定是一笔“乱账”。不过中国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了再说。可是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不是更应该尽量先设计战略呢？因为你毕竟比别人走得晚，要赶上人家，就更要设计。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把财富都集中在了东南沿海，不仅海上没有考虑安全纵深，就是陆上，也把该有的防空设施都让给房地产开发了，等着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闹起来，

才想起从俄罗斯引进海军装备技术，在引进、消化过渡时期，只能靠二炮的战略导弹顶着。由此可见，有长远战略规划多么重要！一个国家任何时期都不能没有大目标。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护航前，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被西方盯上了，抵制奥运会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是苏丹问题。1985年美国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名字叫“闪电行动”，内容是苏军入侵捷克，于是美国派特种部队与捷克游击队配合打击苏军。现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叫“武装突击”，内容变了，游击队变成了苏丹人民解放军，虽然对手没有说是谁，但是所有人都能猜出来是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和一系列产业在苏丹。中国在那里的石油利益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关的配套产业集群在苏丹、安哥拉建立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为非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优于西方后殖民的模式。这与奥运会期间一些人以苏丹问题为理由抵制没有关系吗？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如果没有大目标的准备，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很高。中国这次派了军舰，美国、日本、韩国就马上跟进了，就是台湾也完成了图上作业，最后认为没有办法完成补给放弃了。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

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年的市场经济已经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你让不让9亿多农民进城？让不让他们的孩子享受那种在电视“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让，你的政权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如果让，你的铁矿石、石油从哪里来？你的制造和贸易附加值那么低怎么养活进城的农民？再退一步，就算城里人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他总要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吧。当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资要出问题时，他怎么想啊？其实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就要早早设计，如果不设计，等出了事再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义和团”。以中国民众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设经验来看，中国是应该有能力设计大目标的。

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了，有关金融的所有机制、体制都没有变，除了奥巴马给美国底层说了点儿空头支票一样的漂亮话外，所有帝国大佬、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太想维持和延续原来的舒服日子了，想就

这样慢慢混过去，这可能吗？在这期间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实中国也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模式，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官方的各种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口号，但是原来发展的惯性加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种改变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转折迹象，无论是“奥运火炬事件”，还是后来的金融危机，真是巧合了，有一种天意让中国催生出大目标的机会。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出了“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会更平衡”这样的话，中国无法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秩序中放弃伟大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引爆点。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



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王小东

不怕挨骂，我们就是要除暴安良

如果没有大目标，人不会想把事情做好。要完成一个任务，我才会感到我这个地方不够，那个地方不够，我要改进这些不足之处。如果没有大目标，我们就吃喝玩乐好了，就腐败好了，有什么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呢？不管哪方面的事情，包括建立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大目标一定是一种促进。当你发现要实现这个大目标，现状有太多的缺陷，照老样子实现不了，你就有了真正的动力去改进它。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有世界1/4的人口，我们要对世界做较大的贡献。要是把这个话说明白了，怎么才算是较大的贡献？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从有效管理这个世界上更大的资源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优缺点、加减法都算过了之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论。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和利用。从这个角度说，

只要这个世界允许充分的自由贸易存在下去，我们来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比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上所具有的大得多的资源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一些西方国家在利用非市场的手段破坏这个趋势，比较和缓的如卖给我们的铁矿石比卖给其他国家的贵，将来也许还会有更激烈的，比如说西方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甚至采用军事手段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世界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某些国家也许是有利的，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来保证国际上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不受干扰地运行。

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我们是最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的，西方人要排第二。我承认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但是从整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比它更有资格来领导。

有人说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一个榜样，但我认为，如果中国只是要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榜样，那这个目标太小了，中国应该提供的是真正的管理和领导。

我知道这样说许多中国人会骂我（比骂我的外国人还多），他们说：就中国这副德性，自己都领

导不好，还要领导世界？我的回答是：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领导着当时她所知道的世界，领导得相当不坏，现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她的力量正在恢复当中，如果中国人当中能有一部分人有一个大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中国必能更快地改正自己的许多缺点，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如果中国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不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好吃懒做、不负责任，堕落到抢、骗的地步，而使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退当中。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认为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可以不卖国，可以爱国。梁启超就说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不相悖，不但不相悖，而且是相成的。可这帮人非得说是相悖的，这样，他们就是自己把他们的那个政治民主化大目标给毁了。

你提倡民主自由，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到处展示卖国嘴脸？甚至给小布什施加什么压力，让他派

兵来救中国？作为中国的意见领袖，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作为。

这次干扰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事发生后，博客中国请我们去开会。胡星斗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先是批评了西方不明智，然后痛骂义和团，说那时候义和团看见有人上衣口袋别钢笔就杀——这个我还有点怀疑，那时候不是穿长袍马褂的吗？上衣有这个口袋吗？能插钢笔吗？他说这次“义和团”又闹起来，是民主宪政的大倒退。我回答说：胡星斗教授，如果说出现了中国在民主宪政方面的大倒退，责任在谁？我认为责任就在你们，是你们非要把民主自由跟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你们应该负责。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我也提了一些比较好懂的口号，如“内修人权，外争族权”。这些说法，我也是十几年前听了广州中山大学一些年轻人的启发才想到的。比如他们告诉我，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对内民主，对外扩张”。本·古里安是否这么公开说过，我不知道，需要考证，但我觉得这个意思大致是对的。我跟他们说：“对外扩张”这个咱们改改，我们改成“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总可以。我力图做一些调和政治民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的工作，但是

像袁伟时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不买账，硬是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坦率地说，这么干的话，他们的政治民主化目标必然会受到重大的损害，这个责任在他们自己。虽然他们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里面很有影响，因为现实很容易让人在感官上接受——美国人又是汽车又是洋房的。

中国的这些自由派精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另一方面，30年下来，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我们可以两个都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要？30年进步是非常大的，现在真的和以前不同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认识到了这个国权，我那时候还讲过，我完全承认“人权高于主权”，但是有一条，在目前的国际秩序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国权或者说我们的族权被严重损害的话，人权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国权是手段，人权是目的，人权当然高于主权，主权不能保护人权的话，主权还有什么用？可要废了这个手段，目的也就无法达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比如上次开《色·戒》的讨论会，中央戏曲学院的一个很年轻的老师，也就二十几岁，讲得非常明白：我为什么反对《色·戒》？因为它损害了我的个人利

益，我反对它就是捍卫我自己的权利。这句话非常好，年轻人非常明白，我们讲要保卫族权，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自己的人权，人权和族权是一致的。在两国交兵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国家利益丧失，个人利益肯定完全没有了。

我再讲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80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留学。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他们的毕业联欢会上，席间有一个台湾留学生喝得微醉，就开始吹牛，说我这一毕业出去，一定要当“一流人间”——这是日本话，“一流人间”，就是我要当“一流人物”。日本老师就说了：你看台湾学生志向很大，你这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有什么大志向？我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国家成为一流国家，如果我的国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我是不可能成为“一流人间”的，如果我的国家能成为一流国家，我做“二三流人间”也就可以了。可不是吗！美国那些“八流人间”到中国就成了爷爷了，在中国通吃，这还不是沾了美国一流国家的光？还要点面子的留学生，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很有体会的。从我们自己的人权、自己的利益出发，我们知道国家的强大对我们有好处，国权跟我们的人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实想想，人类历史不都是这样嘛。讲中国历史，什么叫“国人”，什么叫“野人”？“国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同一个族的人，野人就不是。国人就有权利，野人就没有权利，中国周朝的时候不就这样吗？西方也是这样的。在古罗马，只要是一个罗马人，就具有主人的地位，而奴隶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发了财也还是奴隶，依旧是别人的财产。

我在以前的大量著述、演讲中为西方民主制度辩护，强调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我决不会后悔自己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支持，但我现在也不得不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还能不能给中国一个实现民主的机会。

李零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读〈动物农场〉》，其中有一段我认为很中肯的话：“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这段话确实阐明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人必须首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他的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然而，生存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居然找不到应予考虑的位置，这恰恰是由于他们今天过得太舒服了，感觉不到这个



问题了。

具体到今天中国，我们可以责备中国的政治精英，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没有在今天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快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然而，长远一点考虑，我确实担心将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经济环境恶化，实现民主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

到了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优先考虑生存问题，“其他问题慢慢来”。而为了应付生存危机，民主是最好的解决手段吗？（如果这时你还坚持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在《天命所归是大国》里曾经为“民主作为应付危机的手段”做过很多辩护，但是真正到了危机来临的时候，理论只能是理论，人类会抓住最方便、最现实的手段来渡过眼前的危机，到那个时候，中国也许还真就没有实现民主的机会了。而无论意识形态，无论民主与专制，中国人还要争取活下去，争取活得好，所以，我们的眼界必须放宽，既不能排斥民主这个选择，也不能认为只有民主一个选择，没有民主我们就不活了。直至今今天，我们的指向仍旧只能是一个，完全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其他问题倒不一定都得“慢慢来”——有的还可能要快快来，但其他问题只能是手段，看合不合用。

英雄集团从民间崛起

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包括我说的尚武精神。

可惜的是，这些年当中，我的这个想法几乎被中国的精英阶层完全扫除出了他们的视野。现在只有一些军事迷还具有这样的视野，但军事迷不属于精英阶层。你只要一说这个，要不就说你是白痴，要不就说你很邪恶。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还可以再探讨，再商量，但是这个视野一定要有，我们需要一群英武的人把我们的民族带出去。这里实在在用不着什么高深的道理来故弄玄虚。你只要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现状，我们的人口，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就只能得出这两句话：人要走出去，东西要拿进来。

人要走出去，有光荣地走出来，有不光荣地走出去。不光荣地走出去，就是像老鼠一样爬出去，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像老鼠一样爬出去。但是我希望不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中国能有一个英雄的

集团把中国人挺直腰杆带出去，而不是爬出去。

我们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也在把东西拿进来。我们进口了大量的木材、粮食、石油、铁矿石，但是如果后面没有一把剑的支撑，人家随时可以不让你拿。贸易交往一旦断掉，对于我们来说就太危险了。我们13亿人，就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内乱了。晓军告诉我，英国有一个爵士罗斯议员说过：英国只能在内战和外战当中进行选择。英国的选择是外战，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就应该选择内战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非常短视，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怎么样去外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只能选择内战。也许中国不幸只能内战，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最起码，我提出一个想法，让我们中国人知道，让我们的后代——将来的中国人知道，其实至少有一些中国人还是有其他想法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问题是全方位的，确实很严重，我们不得不追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出路在哪儿？我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但是不乐观。坦率地说，崩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崩溃得要比美国早（美国也有崩溃的可能性）。

怎么办？我说，即使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全面腐败，在中国出了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国家不行了，我们作为个人，作为这个民族比较能

够思想的人也要找出路，我们要看得远一些。

国家不行还有民间，民间可以大范围凝聚，也可以小范围凝聚。我曾经讲过，即使到了明代，中国的海盗还是很了不起的，很少的几个人就能够在海外横行。中国要这种精神，即使精英所组织的国家框架出了问题，我们也还能凝聚得起来。能大规模凝聚就大规模凝聚，大规模凝聚的条件不具备，小规模凝聚也可以。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给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朝廷原本并没有同意他们去，可也没辙，还得奖励。当时的中国，跟《河殤》批判的中国一样吗？和《狼图腾》描绘的中国一样吗？真的太不一样了。再后来班超一行36人就敢横行西域，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英武。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

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献俘。当时也不是互联网时代，王玄策没法跟大本营请示汇报，更没法得到大本营的支持，最多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作为个人做出了很大的事，当然他们有国家的威望支持，这个条件今天差一些，但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

有些事情国家不肯办或者不方便办，其实民间可以搞美国式的“黑水公司”，或者“海外保安公司”。其任务一是为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合作保驾护航，二是维护当地的和平与安宁，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我认为这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有人能开个头，中国那些在海外有重大项目的公司不得和这些“海外保安公司”签约，最后会离不开他们。这样，这些“海外保安公司”会成为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也就在中国的市场结构、政治结构中站住脚了。

我听晓军说，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海外保安公司”在酝酿了。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我进一步希望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能够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而不仅仅是为中国的海外工程项目保驾护航。除了招募退役的特种兵之外，还要有熟悉当地情

况、懂得民政管理的专家、干部，以及环保专家等。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必须承担一部分改善当地民政管理的职责，把当地的事情办得比原来更好，才能站住脚，才能让国际社会最后也说不出什么像样的反对意见来。以中国文明数千年在行政方面的经验积淀，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是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不俗的成绩的。这样一步步积累下去，最后，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应该能够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区获得成功，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同时也为当地人民送去福祉。

我希望我们不要做“海外保安公司”的绊脚石。看看历史，明朝政府就做了中国人在海外开拓的绊脚石。朝廷不但没有利用中国民间开拓海外的主动性来向外进取，而且和民间的海外开拓者对立，引火烧身，很不明智。可是，即使明朝如此缺乏广阔的视野，中国民间在海外还是有一定的地盘的。后来中国收复台湾，“国姓爷”郑成功不就是自己出去开拓外海事业的英雄吗？郑氏家族，不管怎么说是有“国际主义”胸襟的。

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把中国的退伍兵都用起来。我们有人力、组织等方面的优势，由我们民间的“海外保安公司”来恢复这个世界上

很多无法无天的地方的安宁，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好好学习班超、王玄策的精神。

美国哈佛大学有个叫做弗格森的教授，以发明了“中美国”一词而闻名中美两国。最近他去了重庆一趟，回去就写了《中美国的终结》一文，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其实并不一定要依赖与美国的合作。文中有一个认识和我在这里谈的东西很有关系，他说：“你决定从某个地方获取资源。你感觉单单依靠市场力量来获得那些资源有些不放心。于是你说：‘我们要拥有基础设施。’你开始建设道路和港口设施，升级矿山设备。然后你发现有关国家的有些事情很糟糕：它们在政治上不稳定，特别是在粮食昂贵的时候。于是你会怎么做？‘好，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财产。我们最好有些拿枪杆的人在那里。’”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最多是在私下里说说这些想法，第一次准备公开发表，就是这本书。可还没有等我们的这本书出版，人家美国教授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就替我们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不管我们说不说，人家也认为我们是会这么想的，因为只有这样想才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说，蒙蔽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的双眼，却一点也挡不住人家这么想我们，所以，我们

还是就把这些话说明白吧。



##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王小东

“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最早不是我们而是军事迷提出来的，在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比如说，解放军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就提出：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

说白了，世界经济在这样相对平和的氛围里面，在家中混日子，我们得防着某一天崩盘了怎么办。不能让中国13亿老百姓饿死了，最后世界上抢起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咱们说白了，没有什么道德制高点。有什么道德制高点呀？在道德制高点上待着就会饿死。

比如石油的枯竭，有人说30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反正不超过100年，在这种问题上其实是没有道德制高点的。如果非要说道德制高点，我说的由中国来除暴安良就是道德制高点。

我们中国原来的表现，我们当帝国的时候我们对周边民族的统治要比欧洲要好，要仁慈得多。人家却说你傻，别人送你一盆花，你非得送别人一盆黄金。

当然，很多西方学者坚持说：古代的中国人也没有那么仁慈。比如原来大家认为郑和下西洋全是行善，白花钱。澳大利亚学者就讲，这是蒙人的话，其实郑和到处建军事基地，到处干涉部族内政，杀人，不是还抓了一个亚烈苦奈儿王押回了北京吗？这是和平之师吗？也像现在的美帝国主义，在扰乱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这跟欧洲人有什么区别？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说：东南亚人，包括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都是从中国南部过去的。原来的东南亚土著居民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印尼还保留了一些，因为印尼的地形比较复杂。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完成殖民过程只不过是比欧洲人早而已。

欧美学者的话不可全信，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想把中国拉到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样的位置上，以示自己行为正当化。但另一方面，有时也是现代的中国人没底气了，只能说一些强占道德制高点的话，说我们如何如何道德至上来着，最后没蒙

了人家，倒是自己把自己装进去了。这个现象也是要警惕的。

经济利益的获取，或者说，想弄钱，无非就是生产、抢劫、欺骗，没有别的招，物质守恒嘛。在这几招里面，生产为上策，拿剑保护着生产为上上策。抢呢？如果说生产和抢劫结合到一起，这也可以算是上上策——美国不就是这么办吗？如果只剩下抢了，实际上表明你已经老了，虚弱了，生产不出来东西来了。但是也有人口比较少的民族，如蒙古人上来就抢，但蒙古人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大民族光抢是不行的，世界上的财富不够他抢的，生产和抢一定是结合起来的。我认为，无论如何生产都是第一位的，但一定要有剑，剑和商要结合，单独生产是不行的，最好剑和商有一个平衡，就是持剑经商，这是上上策。开赌场行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下下策。如果能够持剑行骗，还稍微好一点，美国也是这样。中国现在是处于单纯生产，剑还没有磨快的状态。金融战士那帮人的主张是生产也不要，剑也不用，咱们直接开赌场，这是最下策了。开赌场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法对那些经办人问责。如果他们把大头送给外国人，自己截流一部分，用这种方法洗钱，我们有办法问责吗？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该去赌。可有一些人却说：

现在这些人去赌不行，让我去就行。我说：你去也不行。

那我们应该怎么走？在这里我还是谈一些大的线条。儒家有一个价值取向，就是仁爱是由近及远的。我们要先对自己的亲人好，对自己的邻居好，再对自己的国人好，最后才是对所有的人好。对亲人好不用说，这不是我想讨论的问题，我们还是从民族说起。这就是首先争取中国的利益，等中国坐到老大的位置上面，可以领导这个世界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给世界安排更好的秩序。我们有这种远大目标，就是让世界人民比现在更爽一些，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是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个现代化的道路离走完还早着呢。在未来几十年当中，我们要在世界上争取资源、保护资源。我曾提到，咱们的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着急，到处找石油找疯了。比如说，前段时间又跟伊拉克签了几十亿的石油合同。可是仔细想想，原来跟萨达姆签的那个已经作废了，我们怎么能够担保这次就不作废呢？我们签的其他协议呢？恐怕都担保不了将来不作废。

所以我们必须持剑经商，我们想打商战，不想打军战，但是要打好商战，我们手中一定要有剑。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我曾经用更粗俗的话来解释

这个道理，结果被很多人骂。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也不想想，就算你是妓女，靠卖淫挣钱，你不还得有黑社会保护？如果没有黑社会保护，嫖客不给钱怎么办？这话是针对南方资本家说他们阴柔经商比尚武好得多来说的。他们说：我们商人就靠着阴柔把人服务舒服了赚钱，不像你们举着剑，要去砍人，把人弄得不舒服。我们商人把你弄爽了，我们拿到钱我们也爽了。说得不客气点，相当于妓女把嫖客弄爽了，她拿到钱也爽了。可是，他们忘了，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后面有黑社会，哪个嫖客要是不给钱，黑社会就出来了，一顿胖揍。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都这样，但是中国这帮精英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妓女可以脱离黑社会的保护。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假设，就是他们认为西方的嫖客都是有道德的，不会不给钱的。我说没这回事，要是没有黑社会的砍刀，不管西方嫖客还是东方嫖客都有可能不给钱。

他们不想自己拿砍刀，他们要傍西方的黑社会。现在我告诉你，少数人也许能傍上西方那个黑社会，但对于中国这个民族来说，人家还就是不让你傍。人家说：我就是嫖客，我是白玩你的，你想让我保护你收保护费，没门！我跟你不是一道的。我还要继续白嫖呢，我凭什么保护你？

##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王小东

一语道破危机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中国有很多人說美国非常强大，强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们还在这么说，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兴地说，美国还是这么强大，一点事都没有。比如前些时候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计划，那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还是能够做出适当反应的；如果没有通过呢，他们也能有一套说辞，说你看这是民主的胜利、宪法的胜利。不仅仅是右派、左派，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他们也非常畏惧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形势也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阴谋，是来套中国和其他国家钱的，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套进去以后，美国什么事都没有。很多左派、民族主义者都这么看的，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国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牛。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的缘由很简单，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的那么复杂。人世间的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一些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没什么

真知灼见，想冒充有学问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错误的道上引，从中取利。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里也包括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还是不够。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灭，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是没有的。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先说抢，美国不但抢了，而且还抢得很多，但是它抢的效率太低。为什么抢得这么低效？我认为就是想抢又没有胆子。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兵一年要拿走几十万美元，装备要几百万，就这么花钱。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摆不平。当然自由派会讲，那是美国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会去抢，真仁慈就不会躲得远远地、十分安全地，像玩游戏一样杀死几十万平民。抢的效率低，得不偿失，缺口还是补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骗了。怎么骗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谓货币战争。骗，这个事短时是可以的，长期一定不行。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

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现在美国老百姓说是那帮商人骗他们，而且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华尔街的那帮人是贩毒的，我们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进戒毒所，而贩毒的应该判刑。这是我看到美国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论。但是讲老实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上当，就是想不干活却能住大房子。

美国社会确实衰朽了。宋晓军说过：美国精英对美国力量的感觉，跟它的真实力量不相称，结果是抢的时候力不从心。打个比方，我这个老头看到一副哑铃，我年轻的时候举100下问题不大，所以现在也去举，可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这样的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



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样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只要看一看那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各国那么多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要我说，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

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到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说过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

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

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一把，中国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这个国家是输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我们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业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

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我们说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莫非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可以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偏激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

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我们再不能听那帮“金融战士”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饱鬼还是饿鬼。听他们忽悠，几十艘航空母舰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我们的空间站和登月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上千万套家庭的房子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几亿农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没了。

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原本意义并不是赌博，而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这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然而，从据说是最为“发达”、最为“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前进榜样的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金融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它所起的实际上是劣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把钱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去，金融市场成了一个骗子横行的大赌场。金融市场还要存在下去，但必须做大的改革。比如说，必须大大减少金融产品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对于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最必要的部分；必须大大减少房贷的中间环节，只允许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存到银行，再由银行贷款给买房人。

走重生产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

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而我们走得了，因为美国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世界上的一些教训。首先是冰岛。一直到1973年，冰岛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都属于发展中国家，80年代靠玩金融突然发了（类似于中国那些非法集资案），2007年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位——这个联合国也是尽瞎掰。它的人均GDP是五万美元（当然是破产前），比日本还高出很多。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它不堪一击，国家破产，所欠外债相当于其GDP的七倍，也就是说，即使它能像原来那样骗钱（这根本就不可能了），也要骗上七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债。英国许多人，甚至政府部门如警察局，都被冰岛骗取了巨额财产，所以英国援引反恐怖主义法案冻结了冰岛的资产。

然而，英国自己也步了冰岛后尘。最近英国自己传出的消息是英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冰岛，也要整个国家破产了。这个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英国比冰岛还是强太多了，但出问题的性质还是类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今日英国，唯一有点活力的地方就是金融业，这总是不行的。

历史上的罗马就是典型的靠骗靠抢而不生产的例子，其最终结果所有人都清楚。罗马到后期也是

老黄瓜，也没办法，最多是出点文化而已，所有的生产都是国外完成的，到罗马港口的船只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美国还没老到罗马这种程度，毕竟还在生产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我们的电脑的关键芯片还是美国生产的。而罗马不生产物质的东西，只生产文化，这就到了衰亡的边缘了。现在又有一群人说文化产业有多么多么重要，用文化产业挣钱才是最牛的。这其实也得打一个问号。当你只能用文化产业挣钱的时候，你也老得差不多了，也快死了。当然这还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你前面如果没有嫩黄瓜这一段，没有朝气蓬勃的制造业这一段，也轮不到你能用文化产业挣钱。一定要有非常辉煌的制造业的硬的一段，才能用文化产业来挣钱，硬完了才能软，先有了硬实力才能有软实力。但是真到了硬的被架空了，就剩下软的时候，也就快死了。我们看到罗马后来的结果如何？你只能生产文化，不能生产物品来，早晚会形成一个大缺口，怎么办？还是要去抢。罗马的情况当然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糟糕：最后罗马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去抢了，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怕死，怕苦，怕累，连抢都得靠外族雇佣军团去抢。最后外国人说我干脆把你罗马抢了得了。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用这种赤裸裸的，直白的语



言把经济学的道理讲清楚。

##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王小东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然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很多边界条件都是相反的，而这些边界条件使得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认识不清，则可能使我们自己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完全清楚，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会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骂，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说，国人因此而对这样一个机遇毫无认识，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崇洋媚外，从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吓破了胆的状况，中国不可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遇，但多少给他们吹一点风，或许还是有所助益。

凭什么你美国人不降低生活标准

在这次经济萧条中，西方国家纷纷出台救市措施。纵观所有这些救市措施，都没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边界条件却与罗斯福时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为什么说现在它们的边界条件与罗斯福时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那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有钱不会花；其次，那时的美国是全世界的债主，全世

界都欠它钱。好了，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的这些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之有多么的不同。在分析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时，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触发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绝对不是美国人有钱不会花，而是把钱花冒了，美国欠了外国人巨额债务。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况根本不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给能力。

原本，假设不存在结构刚性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惜贷等，是调节其有效需求过高的市场杠杆，将其有效需求降下来，使其靠拢美国的实际生产能力。问题在于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都是存在着结构刚性的，减下来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上面，它一定会伤害到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美国原本就不足的生产进一步减少，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计划，力图恢复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然而，结构刚性在这里还是要起作用，黄纪苏在《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的调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结构刚性问题：美国人消费，最终获利的竟然

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产确实在走下坡路了。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如果想恢复对于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同时也扩大对进口的需求，而这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对外债务，使得原来引发经济萧条的把钱花冒了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政府不用怕赤字，因为赤字是美国自己欠自己的钱。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欠外债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意思是干脆就是不还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倒是看到多数美国网民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欠了别人钱就是欠了别人钱，不能花言巧语说是欠了自己钱。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做道德评判，仅从利益出发，美国怎么可以指望外国，比如中国，傻到永远为它把钱花冒了买单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拒绝买单了，就算原来欠的债它可以全赖掉，只要这个需要外国人永远输血的结构没有改变，美国赖账以后又怎么办呢？看来，美国和中国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永远比高深的经济学家更诚实，也更正确。

那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等今天的实际状况，又应该

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正如我们在操持家计时体会到的那样，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永远是好解决的，而把钱花冒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好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有解，那就是美国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费和工资都降下去，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自己的产品价格，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进口产品和劳务上面。其实，美国政府官员一个劲地吵吵要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是这个意思。然而，问题并不全出在中国政府不肯调高人民币的汇率。首先，美国人能够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吗？要知道，他们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卖给他们的便宜货，来自于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却还在那里对中国骂骂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则美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事情就这样了。要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算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简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经济萧条，从紧急程度来说，比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要轻些。但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来势那么凶猛，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济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实当时的情况要

比现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则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所以，它病势虽缓，却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及相对生活水平都会持续缓慢下降，除非出现天崩地坼的情况，如战争等。

并非绝对的双赢：过高估计对手也是取败之道

我们只要一说西方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我们再实事求是，再保守，都会有一群“奴青”或认识不清的人跳上来认为你是“义和团”，你“无知”，这已成为中国从上到下各类人等判断局势的最大误区。

我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这种分析，肯定会招来很多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右派甚至左派的谩骂。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幅由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制作的世界各主要银行市值缩水图。我的本意是给博友们提供一点信息，因为这幅图制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评论。但就有那种我称之为“奴青”的人蹿上来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中国的不足，为西方主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具体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网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们使用的说词非常符合中国的“满招损，谦受益”及“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等传统价值观，似乎应该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其实，问题是严重的，并且是明显的：过低估计竞争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固然是取败之道；但过高估计竞争对手，过低估计自己，也会使自己垂手丧失最为宝贵的取胜机遇而最终归于失败。只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反观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真正的生产能力过剩，同时，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的债主。简单的说，中国现在的边界条件与80年前的美国恰恰是类似的。所以，对于中国因受出口市场不振影响而产生的经济萧条，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美国一样，是个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其实是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据说2009年春节之后，未找到工作的民工达两千万之多，是原来估计的两倍。这个情况可能又会被有些人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实际上还不如西方国家，中国的状况有多么可怕，等等。其实，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中国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项目，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等罗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

出口产业剩余下来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术工种，转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什么不适合。实际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们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我们甚至会发觉，现在的条件比世界经济萧条之前还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上涨的原材料，现在突然便宜了下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的美国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的美国没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技术壁垒，甚至德国人自己犯糊涂还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赶到了美国去。而中国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封锁是十分惨痛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中国拿出钱来拯救他们，另一方面却坚决不肯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刻骨敌视。但既然现在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存底，西方国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完全不转移恐怕也由不得他们。

关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神话，就是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西方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不了，所以，中国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西方人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点，那个发明了“中美



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庆，就认为“中美国”终结了。为什么他去了重庆一趟就明白了呢？因为他看到了重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白了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的市场，只要依靠自己的内需就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崇尚外国，依赖外国的思维已经成了中国从上层到下层的定势，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觉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庆这样歪打正着。

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比西方国家还要穷得多，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比西方国家落后得多，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来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经济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根本不用怕什么海外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有效需求的减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创造出有效需求。中国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给，但在今天的局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用不起这些原材料了，我们就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不着出口那么多的东西就可以换回这些原材料，所以，来自海外市场的钱少挣一些也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形势对于中国

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吗？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够力度，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维持得更久一些，对于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拯救对于我们抱有如此刻骨的敌意的西方国家？以目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体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做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这就只有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则多不认为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那个发明“中美国”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嘛。

上述的这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力量关系，会是一个常态，除非它被国际贸易、被军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断，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原材料供给被战争切断，这个时候，力量的对比就要看军事，而不是经济了。

产业升级的最不利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产业技术落后上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谋取生存保障，中国实行了工业现代化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由于“文革”而被中断，真正实施的时间很短。除了

在少数有关军事工业的领域，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在整体上仍旧是非常落后的。“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战略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技术落后的局面改观缓慢。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技术落后不是问题，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市场上挣到钱就可以了。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后劲这个纯经济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安全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其生存环境永远都不能算是安稳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时时牢记产业技术这个命门，抓住机遇，实现其大步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产业技术升级，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整体还是在缓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部门异军突起的那种情况，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处于更有利地实现产业技术起飞的位置上了（所以，我并不同意那种完全否定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技术基盘，我们已经有了更好

的条件来承接更高端的技术，这是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相对低端有所放松（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术转移过来），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认为，这次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萧条，将使得中国在迫使他们转让技术方面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有必要认清他们在今天所处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比如英国人，他们今天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脱困，话都说得十分谦恭。但光说谦恭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表达善意，这主要就应该体现在转移技术方面：我们手里有现金，有大量的现金，可以通过买你们的东西来帮助你们，但我们不想买你们那些除了满足一小撮暴发户的虚荣心什么用都没有的奢侈品，我们就想买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不卖，那就说明你们非常敌视我们，我们还怎么与你们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企业乃至个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那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到华尔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会赌场中的几招手艺的骗子！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家的赌场还开不开？怎么开？那些手艺还用

得上？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请这些骗子回家有什么用？抄底人才应该去底特律、西雅图！去招那里的工程师。再不济，就算招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回来，给我们随便讲讲人家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也比招华尔街的那些骗子强一万倍。更何况，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对我们没有那么敌视、现在也陷于困境当中的俄罗斯，它至少还有一些军事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听说它现在已经降低了门槛，愿意转移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他就有这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这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作为原来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作为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们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位航天工程师的意见。中国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说西方的科技有多么多么神秘，我们多么多么不行。我承认，这种被外国人吓破了胆的心态有着它的历史经验基础，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学、盲目

浮夸的历史。但我今天说科技并不神秘，我们中国人是能够搞的，与那种盲目浮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么一批废物“精英”，一听你说中国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归到“义和团”里去。

其实，就算西方不转移技术给我们，以我们现在每年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完全可以组成一支极强的科技大军，来实现产业技术的大踏步升级。我们现在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跟踪的是有很大后发优势的：你至少已经知道哪个方向是能够成功的，哪个方向是不能够成功的。当然，跟踪也有后发劣势，那就是市场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手里有着大量的现金，有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补贴科技研发，将其作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的一环，用不着去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

科技上的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资源投下去，假以时日，就能搞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腐败严重，把资源投下去，只会助长了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样说的人并不了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科技领域易于腐败，植根于它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

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制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但这绝不能作为我们不往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理由。更何况，对付科研领域的腐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现之后的严刑峻法。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事后的严刑峻法比事先的防范措施更有效。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当今之日，西方经济萧条，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而中国恰恰需要启动内需，需要安置大学毕业生，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我知道，由于我们从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可能完全抓住这次机会，但我在这里说说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人听我说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点机会呢。

##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刘仰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愿意向别人借钱，然而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前几年，我遇到一个杀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平时接触也不算太密切，有一阵子不见了，偶尔遇到。据说他在搞一个大工程，眼看就要发大财。我是衷心希望我身边的朋友都能发大财，万一哪天我缺钱的时候，找人借钱不是更方便吗？过了几天，该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手头临时缺几千块钱，问我能否救个急。巧了，我刚发工资，看他时间分寸掌握得多好。朋友有困难暂时帮一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说：过来拿吧。几千块钱借走了，接着两三年就没了消息。其间偶尔打个电话，放不下面子，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情，几千块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知道对方还在北京，还在搞大工程，忙得很，不便催他，但是心里总是不舒服。

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正巧遇到他也在请别人吃饭。打了招呼后，双方的客人互相介绍一下，我动了个心眼，对大家说：今天本来我请客，居然遇到一个替我买单的。该朋友有点不好意思，趁其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悄悄还了我一半。

如果借钱的数量再大一点，比方说几万、几十



万，对方如果不还，估计要上法院了。我常对人说：如今借钱给朋友，最终结果，要么钱没了，要么朋友没了，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没了。但是，如果借钱数量再大，几百万、几千万，即使朋友没了，也不能让钱没了啊！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伤感情不说，打官司的结果无非是冻结财产，拍卖资产，目的就是要把钱讨回来。但是，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借的钱，数额巨大，而且超过了他的所有资产，拍卖干净都不够还债，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向银行贷款的人不少，假设你向银行借贷10万，如果你不还，银行会采用各种手段逼你还钱，上法院、查封、拍卖等等，直到把你的资产变成钱还给银行。但是，如果你向银行借贷10亿，你的资产全部拍卖还不够10亿，银行会怎样？实话说，这时候你就是老大。只要你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劲头，银行恨不得派保镖天天跟着你，生怕你哪天被人害了、跑了、自杀了。银行会给你说好话，求你即便不能全部还，哪怕先还一部分也好。如果这时你对银行说：再借给我1个亿，否则我不能赚钱还你原来的10个亿，说不定银行也就答应了。所以，在现代社会，借钱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借巨额的钱。借小钱被人看不起，而借大钱，一直借到自己根本还不

起，你就是英雄，就是人才，你就是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当今美国正是如此。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一篇署名钮文新的文章《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给美国的债务算了一笔账。该文介绍说，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万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已经达到81.6%。当然，在国家债务率上，有些国家比美国更高。这篇文章引用其他人的话介绍说，美国实际上的债务比这要多得多。美国某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克尔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什么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摊到全世界头上，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一辈子都赚不到9000美元。

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该文介绍说，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

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6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破产？这就是前面说的，当今社会，要么不借钱，要么就狮子大开口，借得别人不敢让你破产。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了大笔美元债权，如果美国破产，其他国家也将跟着一起破产。因此，美国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美国如何能够做到绑架全世界？因为它有巨大的武力，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国的借条——美元。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比喻为一个集贸市场，美国就好比这个市场上的黑社会老大，他给每个摊主打白条，拿走别人的东西。人们也许相信他能偿还，他有时也确实偿还一点；人们也许不敢不收美国白条，因为他说不定就动武，这个集贸市场没有强大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公平的法律，美国作为黑社会老大左右了这个集贸市场。如今，每一个摊主都明明知道，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已经无力偿还全部美国白条，眼看着美国

白条即将成为废纸，但是，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暂时护着他。

一些人总是说，只要学美国就能强大。其实不然，理解了美国赚钱、抢钱、骗钱的方式，理解了美国绑架全世界的方式，就该明白，美国是学不来的。跟着美国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最多做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小跟班、小马仔，帮着它一起欺负人，分一点甜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把集贸市场做得更大，美国打白条拿东西的对象更多。

那么美国的这种寄生虫的生活方式能持久吗？

寄生虫以消耗寄主的营养为生。当寄主摄入的营养大于寄生虫的消耗，问题暂时还不大。如果倒过来，寄生虫的消耗大于寄主摄入的营养，寄主将日渐消瘦。如果不及时治疗，不及时清除消灭寄生虫，寄主最终会死去，到那时，寄生虫也会死去。美国就是这样的寄生虫。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的癌症，我们说不清现在属于中期还是晚期，因为这种病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早已不是初期。动手术是必然的，大难不死是幸运的。即使侥幸保住性命，美国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来吸取教训？比方说，知道美国是因为抽烟而得了肺癌，那么其他国家就该戒烟了。学美

国，某种程度上说，知道美国是怎么死的，就不要再像美国一样。为此，人们应该感谢美国的舍身、献身精神。日后，人们会长期缅怀美国作为反面典型的贡献。

说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没出息，是因为他没有借好几亿的钱。他借不到好几亿的钱，是因为他没有像美国一样有绝对的武力，让别人不敢不借。所以，他弄得名声不好，不像美国，反而成为一些人无比崇拜的对象。

## 九、打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黄纪苏

“红眼” “仇富” 某种意义是中华民族力量所

在

20世纪80年代反思国民性，说中国人这毛病那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窝里斗，互相挤着比着盯着瞟着，当时有人还给起了个名，叫“酱缸文化”——十亿条蛆你拱我我拱你。中国人骨子里的确好攀比，你有我也得有，你胖我也得胖——吃不胖也一耳光给抽胖了。这容易形成集体行为，学坏争先恐后，学好也是一窝蜂。这种行为的人性依据，我从前起了个名叫“比较意识”，确实比较晦涩，如今有个年轻人另给起了个琅琅上口的——“注目礼文化”，其实就是平常大家说的“要强”。人都想比别人强出一块，这是社会不平等的人性基础；但人也都不愿比别人差着一块，这又是社会平等的人性基础。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历史最恒久、最活跃的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对这股力量的抑制，要比其他有的文明弱些。所以中国人历来有股子冲劲，在内不服输，在外不低头，总是在“争”，争得不一定多有爆发力，但特有持久力。自己没混出息，就非得让儿子出息，把什么都

搭进去也在所不惜，越是那扫地卖菜的下层，越是不认不服软。我老婆单位算是半企业半事业，那儿的职工学历普遍不高，但那些人的孩子无论考高中还是考大学普遍比社科院的子女考得要好，道理就在这儿。因为这样，整个民族的那股冲劲老跟充着电似的，满满当当的：上面的刚不思进取吃喝玩乐，下面的就惦记着挤上来取代他们，不管是考上来还是杀上来。社会流动的各种渠道都相对通畅，文化价值观上的阻力也比很多人以为的要小。现在不都说中国跟印度最具有可比性么？这方面印度显然不如中国。张文木在印度路边上亲眼看到一个行人被汽车撞一跟头，爬起来掸掸土，二话不说就走了。这在中国几乎不可想象，早围一大帮人闹事了，没准能把车掀了甚至点了呢。现在一帮右派学者老的少的张口闭口就埋怨中国人“红眼病”“仇富”，其实没有“仇富”“红眼病”，贫人看着富人无动于衷，啥想法没有，这还可能有平等或机会平等么，还可能有民主和社会公正么！这种“争心”使社会富于张力，没有这张力，别说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概不可能，就连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压根也不可能。还举印度的例子，富豪的儿女结婚，包了两架波音飞机去意大利租了个宫殿办婚礼，穷奢极欲，媒体报得眉飞色舞，百

姓看得眉开眼笑——全都不红眼。这种事情，放在一个先有种姓制度、后被彻底殖民化的社会里真是顺理成章。虽然中国的报刊、电视现在也开始步印度后尘，成天介绍富人的快乐生活，但总的说来，这套在中国是吃不开的。《道德经》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史记》所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水浒》所述“智取生辰纲”，都说明中国文化鼓励社会流动、机会平等，对社会资源的通吃独占保持高度的警惕。

“红眼”“仇富”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它造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辩证运动，一方面鼓励出类拔萃，拉大差距；另一方面又成就你追我赶，缩小差距。计划经济压制了活力创造力，于是便有改革开放；这些年贫富分化过大，社会便迅速反弹，进行及时的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中国之所以当年搞社会主义要比印度有声有色，后来搞资本主义也比他们有成效，这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原因。厉以宁那些人经济懂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真一窍不通。

中国驻孟买的前领事写过文章，就讲这个事，说印度太好了，一点都不仇富。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中国人也能这样，中国就和谐了，就和谐社会了。看看某些人的心态，糟糕到什么程度！麻木到



什么程度！新儒家也是搞这套东西，印度有印度的佛教，新儒家期望中国用儒家思想把中国搞得跟印度一样。代表人物杜维明就这样讲：中国一定要向印度学习，向印度看齐。

这股子冲劲，只要不被滥用，像“文革”那样的极端平均主义和后来穷凶极恶的强者哲学，就会成为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战略资源。对内，它有可能促成平等与自由之间合理的平衡，使社会既相对和谐又富于张力。对外，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首先推动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拾级而上；继而挑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打倒拳王，实现全球范围的机会平等、社会公正；并最终改造国际秩序本身，打碎拳坛，为历史别开生面，使人类的发展进入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我们要提倡理想主义，理想就不是现实，就是对现实的改造。中国虽然有很紧迫的工作，但也应当看得远，看得远跟看不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还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先打倒拳王再打碎拳坛，先扫房后擦地。那天在一个会上有个朋友出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说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值得同情的是西方工人阶级。我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农民工阶级呢？等中国的农民工挣的跟西欧北美一样多了，咱就跟他们无条件联合，现在

联合只能是有条件的。讲“阶级”没错，但现行国际秩序就是阶级关系，也要讲啊——毛泽东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这话没错。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很欣赏，但他们的理论在国家民族问题上不能辩证，是有残疾的。

### 中国需要自己的“摩西”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跟人类理想总体上并无矛盾。前段日子一位西方驻华参赞找我聊天，聊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我批评了默克尔关于粮价的说法，她说粮价飞涨是因为印度人吃两顿了，中国人喝牛奶了。这种情绪在西方比较普遍，说穿了，就是嫌发展中国家起来了，分他们资源的一杯羹了。这位外交官说，你们中国能不能换种别的模式？我说我们原来就是别的模式啊——男耕女织、小桥流水、诗词歌赋什么的。中国的模式就像象牙套球，也叫“鬼功球”，一块不大的象牙雕出四五十层来。雕了五千年的中华鬼功球被西方填了火药的霹雳球炸得粉碎，我们只好也转产西方的霹雳球。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我们一直在捣鼓这个霹雳球。我们搞自己一套，西方说这是愚昧落后，我们搞西方一套，西方又嫌我们吃多了，吃好了。其实我们人均粮食消费只是美国人的几分之一，我们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赶不上西

方。西方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时候，不受任何指责，没有任何压力。等西方发展完了轮到我們发展的时候，清规戒律就来了。清规戒律就清规戒律吧，美国还不遵守。我头两年读了一位法国学者的文章，说到如果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以西方的模式和标准实现工业化，那整个世界还活不活了？外交官听了这话连连称是。我说，我们可以不用石油，可以不烧煤，但西方呢？总不能我们重新钻木取火的时候你们开着游艇去江河湖海乘风破浪，开着飞机去玩空中跳伞吧？——甚至还有富人乘飞船到地球同步轨道上无限风光。外交官说，西方然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也有罗马俱乐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张嘛。我说，罗马俱乐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张好像还不是主流观点，好像也没落实为基本的社会政策、产业政策啊。总不好让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去为西方几个神人的另类思想当试验田吧。坦率讲，我本人对物欲跑道上的疯狂竞赛没啥好感，一个人的幸福不能全靠财富，一个国家的幸福也不能全靠GDP——当然也不能不靠。我也希望把目前这个破坏环境、折磨心灵的资本主义体系改造成更有意思一点的文明。但改造不能是目前这么个改法，因为西方的改造方案考虑的主要是西方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两全其

美、横竖合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应该动大手术，但由这个体系的“地主老财”做主刀和麻醉师，我们敢签字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是让能源顶不住了。地底下就埋了这么多，把咱们现埋进去也变不成石油，而且别的能源一时半会儿也顶不上来。烧干树叶、枯树枝本来也没什么不可以，人类一直不就烧那些东西么？但自打西方一烧上煤，就开着火轮烧杀抢掠，逼着我们不得不烧煤烧石油。但都烧煤烧石油又确实又不够烧。于是西方动员我们少烧煤和石油，多烧“天人合一”——也就是烧了还能再长的树枝树叶。我们要是没被他们烧杀抢掠过，我们真有可能接受他们的建议，光烧“天人合一”，但我们100多年的教训还热乎着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天人合一”，但有个条件：你得跟我们一块“天人合一”。这可不是为了较劲，而是为了让你不再打我们，也不再骂我们，不再灭我们。我跟那位西方外交官说到这块，人家就不接话，乐呵呵扯别的了。所以我的看法是，世界的确需要搞点“天人合一”以缓解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给寻找新能源、开发新能源留出足够时间。这就需要改造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价值标准，需要有新的力量出来领导这规则和标准的重

建。这样的重任肯定不能压小国肩上，得找够个儿的。不敢说中国就一定够个儿，但肯定比新加坡、斐济够。个头不是问题，问题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不行，一根鸡毛都扛不动。

现在西方人把我们看成现代化运动中直眉瞪眼的蛮族，看成见了红烧肉便忘了胆固醇的暴发户。其实我们历史上曾经阔过，曾经“现代”过，曾经“后现代”过——那么多回园隐逸诗歌说的不就是后现代么？对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心里有数，而且问题的方方面面看得未必没他们齐全。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人在拿环保忽悠世界。美国、德国搞生物燃料，从玉米里提炼乙醇，其实就是从穷国穷人的胃里开采石油，那不还是为了继续坐汽车坐飞机么，并没有改骑毛驴的意思啊。中国的一帮“业余美国人”也跟着起哄。西方笑咱们慢的时候，他们是百分之二百五的发展主义者；如今西方嫌咱们快了，他们也跟着变脸，变成无比生猛的环保主义者，组织完“散步”，又故纸堆里一通忙活，告诉我们说中国从伏羲帝那会儿就是“环境友好型经济”“资源节约型发展”。这种本该由郭德纲说的反话，他们一个个都说得正儿八经的。可让你不烧煤气捡干树叶枯树枝烧你干么？那才是“环境经济”“绿色能源”呢。另外，中国的富人如今也效

法起世界的富人：他们先是毁了大家的青山绿水盖自家豪宅，如今又要撕了大家的建筑蓝图来保全他们落地窗外的怡人景色。他们恨不得豪宅之外的世界全是树，别人全是树上的猴。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及其价值观，的确病得不轻：太穷奢极欲了，而且谁不穷奢极欲谁就被淘汰出局。这能把人类拽进死胡同么？这的确是一个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需要认真对待。人类这样穷奢极欲下去大家都得死，但如果我们退出现代化竞争，那我们现在就得死，而且我们死了也解决不了人类还是要死的问题，因为西方领导的世界还会继续在穷奢极欲的跑道上一路狂奔。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从西方手里夺过世界发展的领导权，为人类开一条量入为出、健康发展、价值真正多元的光明大道。中国文明古老而常新，既能强悍又懂仁爱，应该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境界。

中华民族这100多年的大抱负是死地求生、后来居上。这个目标，我们以几代人的前仆后继、左突右冲，到今天完成得有点眉目了。咱们有时走到天安门广场，看着纪念碑后面的题词，想想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带领一个苦难民族浩浩荡荡，九曲九折，从黑夜奔赴晨光，真像史诗一样

啊，让人联想到大禹和摩西。当亡国灭种、吃饱穿暖的问题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就会有工夫认真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为了四蹄生风跟活驴似的，从产房一直跑进火葬炉么？如果这种活驴生涯是上帝定的，那咱也就只有死心塌地地跑了，争取把两条跑成四条腿，跑死别人，跑活自己。但上帝好像没这么定吧？人塑造自己，为自己选择或创造好一点人生的余地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当然了，跑也没什么不好，长了脚不就是跑的么？彩电冰箱灯红酒绿，奔五奔六不跑能有什么？我不想否定跑，没那意思，但一刻不停地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除了跑还是跑，是不是太过了点呢？马克思说的“按照美的规律”重新改造人心人性人境，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宏远抱负的一部分——我说的可是“宏远”，想抬杠的人就别拿眼前的事儿抬了。

我们自己眼前的事当然首先要做好，才有资格替世界和人类起草远景规划。记得很多年前，有回在西单街头看见一个摆地摊卖“洁齿灵”的，说得天花乱坠，说抹完了牙齿能跟白瓷砖似的。旁边一小伙子看了忍不住说：“您倒是先把您那嘴大黄板牙整整白呀！”我们自己在民主、法制、公平、自由方面的“黄板牙”的确先得整整白，然后才谈得

上“对人类做较大贡献”。道理很简单，这些方面你达标了，你才有软力量，人家才拿你当榜样，你的硬力量才事半功倍。再有，既然谈的是世界抱负，不可能不追求自身利益，但你也真要具备公心，要提出普世的价值，联合大家一起干，否则世界人民只能跟你打巷战了。



##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王小东

赶快搞我们的产业升级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就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再发展制造业，挣来更多的外汇储备，不放在金融市场上，不打金融战争，又怎么能够增值保值呢？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花掉它，当然是花在适当的地方。

那么花在什么地方算是适当呢？首先，花在全面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上，花在航空、航天、新材料、国防科技上。技术研发，可以自己干也可以从外面买。自己干不用说了，我们来说一说从外面买。不错，的确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禁运，我们可能不得不以高于其他西方的朋友的价格购买技术，但只要把钱砸上去，有很多技术还是可以买到的。我们要把全世界的能工巧匠都招到中国来，把中国建成他们最能发挥聪明才智、最能得到个人回报的地方。其次，花在储备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方面。我们首先应该逐渐减少或停止出口我们自己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多进口国外的，把它们储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个人和地方蒙受损失，对此进行补偿就是了。再次，花在扩大内需上面，花在改善人民生活

水平上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把钱花到适当的地方并不容易，但总比挣钱容易。我们把钱都挣来了，花到上述三个地方，就算里面有些浪费，也远强于像现在这样被别人在金融市场上骗掉。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制造业集中在低技术一端，但是，西方的精英们看得很明白，这个情况会逐渐转变。日本的企业家们就讲：所谓研发跟制造业可以截然分开的说法是胡说八道。我的一个朋友去富士康，他说富士康的人跟他讲，iPod是美国人设计、我们生产的，这是非常片面的，应该说iPod主要是我们开发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只是提供了一个很粗糙的想法，要想真的把iPod这个产品做出来，还需要大量的研发，而这主要是在中国进行的。我也讲过，德国人说过去20年中，有1/6的企业转移到了国外，一开始，德国的精英们蒙德国老百姓，说我们转移出去的都是低技术岗位，但是现在来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是研发一起转过去了。日本企业家们相对比较乐观一点，他们说：由于离中国地理条件近，所以日本的情况会比欧美国家好。什么意思呢？他们又说：研发一定会跟制造业走，欧美的研发一定会衰落，但是由于中国现在技术水平太低，不能一下子就把研发全接过来，日本由于在地理条件上离中国近，最起码在一

段时间当中，欧美的研发会跑到日本去。

虽然如此，完全否定这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是错误的。跟之前的赶超时代比，我们有得有失。那时候，我们是在跟军工有关的少数几个部门立起了几根柱子，但是整个技术基盘是很低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这30年，按刘力群的说法是“花钱保权”，做雷达的改做电风扇和电视机了，也就是柱子降下来了，砍掉了，天花板就降下来了。但是经过这30年的努力，也包括中国企业家的功绩，整个技术基盘确实是提高了，而且进步也不算慢。

我看过几个在日本跑企业口的记者的评论，他们举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模具。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模具制造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培养了大量的中国技工，培养好了之后中国技工全跑了，自己开厂了，因为中国人是不甘于久居人下的，这也是种冲劲，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不够意思了。

日本记者采访一个搞模具的老板，那老板说：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培养了好几百名中国的模具技师，现在跑了一大半，他们开了无数公司跟我竞争。还有一个是电视台采访一个日本老师傅。日本电视台很鬼，他先采访这个老师傅的中国徒弟。徒

弟说：我技术学到手了，我现在非常有信心。电视台又切到了采访老师傅的镜头上。老师傅说：我被出卖了，我教会了他们，他们却跑了。主持人问：那你以后还教不教呀？老师傅回答：我是真不想教他们了，可是没办法，我还得教。为什么？不教没有收入。前面提到的那个搞模具老板在上海做生意，他说：现在跟我竞争的公司多起来了，我现在的生意跟十年前没法比，不好做。记者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回日本？他说：回日本死路一条，因为制造业在中国，在中国至少还能活。

我觉得一些知识分子也妄自菲薄得过头了。他们这样做可能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30年不完全是钉死在低技术一端的过程，技术基底的提升也不算慢。我们现在既然有这样的基础，完全多搞点空间项目什么的，顺着这个势头赶紧把我国的技术水平托起来。

我记得有本书是一个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写的，大概在2003年出版，作者的倾向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中国实际上没有社会主义，西方左派都死了心吧，实际上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还认为，中国这几年的技术升级，从初级到中级是非常快的。

感谢西方种族主义有助于我们召回人才

我看到《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谈到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高科技人才，为什么返回中国的不少。文章承认：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在美国所遭受的“天花板”要比印度科学家厉害得很多，印度科学家有可能被提拔，但是中国科学家很难得到提拔。这形成了一个“玻璃天花板”效应。

在早期的欧美电影中，黄种人是一个极端猥琐不堪的形象：怯懦、愚蠢、道德败坏。总之，所有人类的、动物的坏处全能在黄种人身上找到。这是一点不奇怪的，咱们被人家打败了，没有力量，就是这个形象。今天怎么样呢？这个形象有了一定的改变，因为今天的黄种人不再那么没有力量了。比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里，你会发觉，有时候黄种人的形象并不太差，但是黄种人包括日本人，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里往往戴着一副眼镜，显得非常精明，不但是科学狂人，同时还肯定是坏人。这就是今天西方人心目中黄种人的形象，是一类比较可怕的坏人，西方人接受不了。

就西方白种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的关系而言，他们最看不起当然是肤色比我们更黑的人，但关系上最疏离的恰恰就是我们。因为像印度人、东南亚人、黑人，他们虽然被看不起，但白种人也感不到有什么威胁，更何况印度人、东南亚人、黑人因为

原来自己的文化相对落后，所以是一张白纸，可以任由西方殖民者涂抹，在语言、文化上要比我们西化得多，所以，他们在文化上、感情上跟西方白种人要比我们亲得多。我们是既强大又异类，因此，在种族问题上，白种人显然把我们当作最大的敌人。特别是现在，白种人感到自己不再具有绝对的强势了，他们反而会对我们更戒惧。大谈“文明冲突”的亨廷顿，实质上谈的就是种族主义，当然也包括宗教敌对。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讲的西方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宗教敌对，而与所谓儒教文明的冲突，其实就是一种针对黄种人的种族主义。所以他设想如果中美开战，日本是站在中国这边的（这一点其实是胡说八道，影响了美日同盟的大局，所以一些美国人也骂他），他还在那里叫嚣：西方人必须抱成团，否则就会被非西方人一个一个绞死。

美国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它能改吗？我认为改不了。坦率地说，美国人没有种族主义的话，中华民族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全跟着美国走了，特别是精英全跟着美国走了。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存在，恰恰是由于西方的种族主义，他不要你，他把你推出来了，他把相当一部分精英也给推出来了。当然，确实是有一些精英比较

没骨气，忍气吞声在那儿过活，只要能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住个别墅就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美国和当时的秦国有很大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当时的秦国对六国人不歧视，美国却对黄种人高度歧视。而黄种人由于开创的文明在古代历史中处于相当发达的地位，坦率说，智商高的人还真是多，人才库在我们这儿，它却不要人才库，把我们推出来了。要是今天的美国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气魄，把世界各国的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全给用了，中国很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而美国只是用了一点百工，商鞅、李斯之类都不会用。即使在百工当中黄种人地位也是最低的。这恰恰使我们中国仍存在崛起的希望，所以西方的种族主义在这个层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总之，西方种族主义对中国是一害也是一利，他们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外部选择压。最起码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感到了一种不愉快，感到了我们处于屈辱的地位。于是，觉得我们还要造造反，反抗一下，夺回自己的尊严，我们要当老大。西方和中国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人歧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这个话要点透了，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隐瞒这一点是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人的一种

欺骗。现在不准谈种族主义意味着他们可以拿种族主义欺负你，却不准你说。奇怪的是我们自己也不敢说，某些官员和知识分子、文人在那里把着：谁说这个谁就是坏人，谁说这个谁就是种族主义。这不很可笑吗？

不能一起“爽”，也不能被别人吞掉

美国人戴蒙德，就是写了相当有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那位，他写的另一本书《崩溃》的中译本也出版了。他在这本书里描绘了一个在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的压力下行将崩溃的地球。里面有一章专写中国。他好歹比中国那些头脑冬烘的文人强，他承认：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他同时又认为：要想让第一世界放弃穷奢极欲的生活，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这里就差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兴衰十分有洞见的戴蒙德在这本书里也犯了一个现在看来是十分低级的错误。他充满希望地宣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冰岛一直是欧洲最贫穷的、生态最脆弱的国家。然而，冰岛人终于以史为鉴，采用严谨的环境保护措施，该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戴蒙德言犹在耳，金融危机来



了，结果证明了冰岛只不过是靠骗别人的钱致富，靠骗别人的钱保护环境的一个国家——他的最后一点点希望也在事实面前破碎了。所以，与其在那里做小女生玫瑰色的梦，我们不如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不能一起爽，我们也不能被别人吞掉。

好多人都说，中国达到美国的程度，四个地球都不够。问题是美国人凭什么永远在人均上是老大，我们永远是老一百五十？这是不行的。人爽不爽，不光看绝对量，还要看相对位置，如果中国的相对位置是这么个地位的话，中国人永远爽不了。这个相对位置本身就使得中国人不爽了，本身就说明了你就是“贱民”，就是“劣等民族”。这就不仅是物质上不爽的问题了，精神上也永远爽不了。

我才不管你要多少个地球，中国排在别人后面就爽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爽了两千多年了，就这160多年没有爽，我们接受得了这个现实吗？

无数人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让美国人爽，我们要克制自己，我们不爽就算了。凭什么我们不爽就算了？或者劝美国不要这么爽，这么爽要死的。他会听你的吗？我们要制定出国际新秩序，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爽，但是你也要这样。

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一帮逆向种族主义者被

他们吓破了胆，总是在那里说：我们不能那样，我们要那样，这个地球就完了。我说：你才完了呢！

我觉得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的言论是弥漫性的，有些人可能不是自觉地接受了“中国人是贱民”的洗脑灌输，包括一些还算有头脑的人。他们认为西方人就是狼，我们就是羊，羊只能被狼吃。这就是《狼图腾》中宣扬的观念：人家是狼，我们是羊，我们主动让人家吃了，进了他们的胃也很光荣。

《狼图腾》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推崇这样一本宣扬窝囊废精神的书。

我再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回，我和朋友乙在朋友甲当总编的某杂志社。朋友甲说：中国人就是羊，小东你搞民族主义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朋友乙开玩笑说：小东就是想把羊犄角绑上刀，弄一个火羊阵。朋友甲就说：这要是火牛阵吧，倒是可以冲过去，可你这个火羊阵，羊犄角绑上刀，到时候不敢往前冲，只能互相之间冲撞，自相残杀了。朋友甲又说：小东，你是中国人吗？你整天讲尚武精神，你这个想法不是中国人的想法，你肯定有匈奴血统，中国人都是羊，没有说狼话的，像你这样说狼话的肯定是匈奴人。我没有反驳他，只是心里说：你好好看看《复活的军团》吧，

我们有高度尚武的基因。

我觉得，这几十年一些人的脑子真的被洗白了。也不用说太远，我们就说说毛泽东时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回到那个时代，但是话说回来，毛泽东时代有这种“我们就是羊，人家就是狼，我们的价值只能在狼的胃里体现出来”这种白痴想法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是羊性还是狼性？

这30年，首先脑子被洗得最白的不是老百姓。我承认，这30年逆向种族主义的影响确实很大，老百姓一定程度上也被洗白了。但是老百姓念书少，这成为一种幸运。因为被洗白的主要通过念书，所以念书念得越多，就被洗得越白，这些年思想、文化、娱乐精英们写的书就是洗衣机。

当然也不能说全被洗白了，他说不定知道这个道理，问题是这还有一个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比如说我让狼起来了，那狼的利益就大。说难听点就是课题费，咱俩争一个课题。你说：你不会外语，这个课题都归我。就是相互争着的这个意思。

把被西方吓破的胆补回来，中国就会有更出色的发展

我还是认为，我们的精英群中的主要倾向不是低估了美国和西方，而是被美国和西方吓破了胆，认为它们是无所不能的。有人说：从1929年的危

机中站立起来的是一个更强大的美国，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认不清楚，美国今天所遭遇的危机可能比1929年要小得多，但今天的美国却比那时的美国要衰朽得多。有个朋友说：美国还是家底雄厚的，至少中美两国的青年才俊如今都在美国。我也认为美国的家底还是雄厚的，现在只是衰朽，离被打下擂台还非常遥远，但至少中国的青年才俊可未必都在美国——中国的青年才俊多了，除了一些人去了美国，还有很多人仍旧留在中国，那些从事航天工业的年轻人不是才俊？那些设计、建造军舰的年轻人不是才俊？而且，只要中国启动自己的大目标，就会有许许多多今天在海外的青年才俊回到中国。他们既然是才俊而不是傻瓜，就会看清楚，一旦中国启动大目标，这个世界上最能施展个人才华的地方就会在中国，最能获得个人利益的机会就会在中国。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有些上层人士，实在有必要把被美国和西方吓破的胆补回来。如果我们能够破除“中国人事事不如西方人，永远不如西方人”的这种心理残障，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快、更高的发展成就。举例来说，我认为中国发展高科技和国防工业的时间表是过于保守的。在科技发展的实践中，最困难的是找对发展方向。现在我们是在跟

踪，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已经把方向找到了，我们连“跟”都这么没有自信，每一步都重复一下，有必要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跨过中间一些阶段，直追他们的最新目标呢？比如说，曾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人如果跟在西方人后面，每一步都重复西方先进国家飞机的发展步骤，那么永远也追不上先进国家，在亦步亦趋跟随先进国家发展历程的同时，中国至少应该安排一支科研力量，投入一部分科研经费，直接研制混合翼体飞机，以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们把这个方案给我看过。正如我猜到的那样，这个方案在最初阶段就被弃绝了。我不是航空专家，没有能力评价这个发展混合翼体飞机的具体方案是否可行，但我认为在原则上，这样的思路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就算这个混合翼体飞机项目确实不可行，类似的跨越性项目会有可行的。可是在胆被吓破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对跨越性项目做出公正评价吗？当然，我也承认，前30年有不少不顾科学的胡乱跨越，但今天我们不能因此走另一个极端。

##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刘仰

全球变暖领衔的环境话题无疑将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忧心忡忡日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然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只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例如，最近报道的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大规模消失，以及中国山西的污染等等，都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劲头。

西方媒体最近报道说，巴西亚马逊雨林近40年消失的面积，超过450年殖民地时期消失的面积。言下之意，发展中国家现在大规模地破坏生态，造成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反过来看看我们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得多好。美国某著名杂志将中国山西天空污染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同时大力炒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于世界第二”的消息。这两个报道内容都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个事实背后的原因。

以巴西为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消失，主要是用来种植以大豆为主的农作物造成的。在巴西被砍掉的树木中，木材50%销往美国，28%销往欧洲；砍掉树木以后种植的大豆，50%销往欧洲；还有一

些土地被用来养牛，牛肉53%销往欧洲。换句话说，亚马逊雨林消失的最大获益者是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的享受，才导致亚马逊雨林的快速消失。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参照是，美国目前在本国探明的煤矿和石油，大多不开采，绝大多数用其他国家的。他们的环境当然保护得好，可那是以牺牲别人的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发达国家在指责中国的环境污染时，日本却大量进口中国的煤，储备起来以备不虞之需。而且他们只看到近几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却不说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直到几年前，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前5名、前10名都是发达国家。如果计算一下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总量，70%以上是少数发达国家排放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巴西，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地的人们牺牲环境发展经济都是为了过上富裕的日子，而这个富裕的榜样就是发达国家。因此，当发达国家一再标榜他们自己多么先进、多么文明的时候，又反过来指责发展中的国家试图把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举动，就显得很不厚道。虽然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寻找其他方式来发展经济，但是，首先，开发现有资源是最快的致富方式，发达国家如此强有力的榜样，必然让落后地

区的人们寻找最快的致富捷径；其次，落后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也是照搬发达国家以前的方式；第三，落后国家牺牲自己的环境，开发的资源大多也是被发达国家享用。

我曾经见过一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地球的夜晚到处灯火通明，最亮的地区都在发达国家，他们极大地消耗着、浪费着地球的资源，却指责别人试图变成和他们一样。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前不久，发达国家在全世界面前作了一个秀，先是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关掉造型效果灯光5分钟，然后很多城市也关掉照明灯光5分钟。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大喊一声的效果，还有什么用？他们愿意像落后国家的人们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吗？他们愿意自己城市的夜晚像非洲一样黑暗吗？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根本不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普适的价值。如果中国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过着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的生活的话，这个地球的资源绝对不够。有人计算过，那将需要5个地球。因此，落后国家环境的破坏，一方面有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强行提供的错误榜样。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资



源高消耗的方式，在他们发展的初期，应该说，也没有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而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明显。

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一个大发明家，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爱迪生还办过电力公司。爱迪生坚持给居民供应直流电，只是后来被交流电淘汰了。其实，爱迪生的很多发明都是为了他的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建成后，如果仅仅只是照明用电，居民只会在晚上使用，白天的时候，发电厂的机器没有使用效率，变相增加了成本。于是，爱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发明可以在白天用电的民用电，例如留声机。虽然现在 we 说，这些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看来却是错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指导思想延伸到现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夜间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背后就是电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电，它才好多多赚钱。因此，灯光也不只用来照明，更多是用来装点，这完全是一种浪费。这种方式现在也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背后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白天睡觉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经是发达国家带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

地销售商品的商店规模都很小，自从美国建起了大型商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也是因为电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没有电力照明，大型商场里面就会很暗，而且大型商场提供了豪华的空间和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小商店无法比拟的。虽说大商场增加的巨额成本可以从高利润里赚回来，但是，毕竟它的方式就是以高消耗为前提。而发达国家大量的一次性产品更是这种高消耗的典型，这类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生活方式，即将彻底毁灭中国人几千年养成的节约习惯。

所以，当全世界的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发达国家不应该指责落后国家破坏环境，而更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给全人类树立的生活榜样。仅仅在食用油这一项上，美国人均消耗的水平就是中国人均的四倍。在人均能源消耗上，美国也是中国的四五倍。发达国家有什么权利不让中国人像他们一样使用能源？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减少自己的能源消耗。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应该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榜样。比方说，现在很多房子都和美国一样，落地门窗，玻璃外墙。其实，玻璃的传导性很强，外面的冷热很快就会影响到玻璃墙的里面。这种房子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用大量的电力来运转空调，使得在玻璃房里面的人，既可以享受外面的

风景，又不会受冷热影响。而在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是只有南方炎热地区才会有大窗户，北方的民居窗户一般都很小，就是为了提高自然保温效果。这种习惯，现在已经被高耗电力的空调生活所代替，另外还带来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结果。

当全世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发达国家希望亚马逊地区能够更多地保留热带雨林，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氧气，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如果巴西当地人不砍树，世界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难道要他们继续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吗？

2008年度，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共盈利452亿美元，平均每天1亿美元以上，创美国企业史年利润最高纪录，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企业历史上年度利润最高的。它的这个高利润，一方面是石油涨价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鼓励能源消费的结果。

面对发达国家已经树立起的资源高消耗型的生活榜样，再加上发达国家时时处处都在宣扬自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落后国家再宣传要环保、要节约，哪个力量更大？在现实的享受面前，人毕竟是自私、短视的。因此，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环境问题，首要的就是放弃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的榜样。发达国家能从自己做起

吗？

##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王小东

新儒家“感化说”是痴人说梦

中国人现在对犹太人崇拜得不得了，特别崇拜。2008年奥运会上以色列残疾运动员破口大骂中国人是屎，某些中国人还是崇拜，说犹太人骂得没问题，那是对的，咱们自己就是屎，所以并没有对犹太人太大的谴责。实际上，我觉得犹太人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至于以色列总统出来道歉，那是面子上的事。而且坦率地说，不仅仅中国人在他们眼里是屎，其他民族在他们眼里都是屎。犹太人虽然曾受到希特勒种族主义的迫害，但是犹太人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非常强，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不知道。但是中国既然有这么多人羡慕犹太人，最起码得从犹太人那里参考参考。比如说，犹太人已经被其他民族反复打败，反复征服，国家早就不在了，居然还能凝聚在一块，还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被打成这样吧？从文明史上的实际成绩来看，中国人比犹太人好太多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人。我不是说咱们完全就像犹太人这样，就是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优秀，但是最起码，我们不应该像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者那么想：我们中国人都是

贱民。这样的话，有国家在就不行，国家不在就更不行了，那就真没希望了，绝望了。

我们还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国家最终在腐朽的精英手里败掉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就完了？我认为，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我们还是不会完。当然，我们最希望我们这个国家不败掉，我们的精英能够高尚一把，或者他们高尚不了，有其他精英能高尚。

有一天吃饭，我们坐在蒙古包里面听蒙古歌，黄纪苏说：这时候想起一个英雄时代来了，感觉有一丝凄凉、一点伤感。我跟纪苏说：我去蒙古大草原几次都是这么种感觉，成吉思汗当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他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到现在还没有其他人达到。可是现在怎么样呀？从文明史的尺度看，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我们中国文明真的很独特。我是讲我们的文明，不是讲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文明和民族当然跟国家有联系，跟政权也有联系，但有联系并不是完全等同。你看那么多盛极一时、强极一时的文明、民族消亡了，可是我们这个民族还在，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还很强大。虽然我们近170年处于最低谷，也没有灭绝掉，甚至没有崩溃到欧洲文明中世纪那样。仅仅是170年的时间，现在毕竟在

一定程度上又起来了。这几十年的中国在世界上真是一个奇迹，所以我说是“天命所归”。

中国精英现在出现的严重问题应该是暂时的。中国将来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当然要管理世界上更大的资源和面积，我不是指要兼并国土，我是指领导和管理。我相信我们会比美国和其他西方人管得更好。只有在这种意义之下，所谓中国文明对于地球资源问题所能起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中国文明才有可能对环保，对节约资源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绝对不是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什么“我们和他们比谁发展得更慢”。

现在西方文明确实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资源的浪费，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里面有西方文明本质性的问题，西方的发展模式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石油的供给是无限的。如果石油的供给不是无限的，这个模式总有崩溃的一天。但我们要替全人类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观念和方法上强过他们。而新儒家那套感化他们，跟他们比“谁发展得更慢，谁更节约”的理论，无非是痴人说梦——人家谁跟你比这个，谁受你感化？

既然石油的供给不是无限的，现在的模式总有崩溃的一天。怎么办？

有人说是回归社会主义。《纽约时报》有一个

美国网民评论说，最终还是USSR，就是苏联打赢了冷战，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样说，可能左派会欣喜若狂，你看美国都回归社会主义了。但我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那个网民也只是说说而已。每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包括凯恩斯那个时候也讲过：投资这么大的事，不能放到私人手里。这样的观点，放到现在就是极左的言论。但是，斯大林的体制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已经名誉扫地了。那个时代如果真像有些左派说的那么好，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而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就回不去了。看来要走新的路，这个路也不大可能是儒家的。儒家的那个“天人合一”真的跟环保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我们决不是照搬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要带头走新的路。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天命所归”，最有条件带大家走一条新的路？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是摆在这儿的。我在前面说了，跟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相对比较短暂的文明比，甚至跟确实也很了不起的欧洲文明比，我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好的。继往开来，为什么“开来”的不



是我们呢？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是表现最好的，就最近一二百年差一些，凭什么说我们将来不行呢？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表现？

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人应该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当下这个并不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力量和足够的财富，但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干，于是就腐朽就堕落，拿着力量腐朽和堕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大家为之奋斗，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内部的人群才会有道德，才会有诚信，才会有好的行为。

我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

那么，走这样一条道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保障呢？民主制度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看到了。但是如果民主制度不行，回到儒家禅让制度更不行。一个制度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解决统治效能的问题，二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民主制有时确实不

是效能最高的，毛泽东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最英雄，实事求是地说也是和效能相背离的。他老人家自己也不信这个，说这只是一种政治操作而已。有治国效能、管理效能的一定是精英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又没错，他提倡精英治国。但是精英治国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精英不为国家做事，而是为自己做事，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怎么办？我们今天精英的智商也不错啊，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但是怎么防止他们腐朽，防止他们只为个人私利服务？现在我也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大的框架我想应该是在精英内部有竞争的选择，和平的竞争和选择。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叫“党内民主”，叫“军事民主制”，像古代那样——蒙古人也好，满洲人也好，他们在一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机制。这是一个成功的机制，他们的精英集团保持了团结，保持了高效能，保持了内部的良性竞争。当然，这种古代的军事民主制没有维持很长，很快就归于专制了。

说到这里，早就盯着我的那些自由派又要跳出来了，说我原来讲的支持民主制度的话都是谎言，因为我支持的民主制度不是西方式民主。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下：我只不过是在探讨民主的各种形式和

各种可能性。如果历史选择了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我是支持的。或者说，历史显现出中国实行其他民主形式的可能性不大，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可能性最大，我也是支持的。我认为无论何种类似的民主制度都会比排除了内部良性竞争的非民主制度要好。

### 龙永图“争取入党”之谬

我们必须要有大国心态，但是我们大国心态绝对不是现在那帮精英、主流媒体说的那种“大国心态”。那是管家心态、管家学术、管家具容、管家媚态。

有的精英倒是干脆把话说明白了。比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美国是党支部书记，我们是争取入党的群众。要是管家的话，最起码还是入了党的，而说我们是争取入党的群众，那不是连管家都不如吗？还有一个说法：美国是部级干部，欧洲和日本是局级干部，咱们最多是一个副科。明白吗？这些说法体现的是大国心态吗？所谓的副科是大国心态吗？你要说副科心态就是大国心态，这不荒唐透了吗？

我们甚至有必要回顾一下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歌曲，比如说那时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知识青年从军歌》，非常不错，我转引在这里，大家自己看。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文言文不大好懂，但我们大致能看明白。“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不管那时候中国人有多难，中国人还是有大的志向的。

###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王小东

空话连篇的“美式八股”

一个网站的编辑想让我评论一下奥巴马的新书《我们相信变革》。他把书都寄来了，我也只能顺手翻翻，好歹写篇评论。好在这本书看上去不薄，其实没有多少字，很快就能翻完。坦率地说，这是一本满篇空话、胡吹大气、让人不堪卒读的书，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窗口。

这本书的上半部是奥巴马的施政方略，下半部是他的八篇竞选演说。我们老是说中国式八股空话连篇，没有内容，可这本书还不如咱们的呢，他除了吹牛还是吹牛，实质性内容甚至不如咱们常拿来开涮的“动员报告”。他在这本书里，全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许诺，要给老百姓这个，要给老百姓那个，可全都是口号，我看不出任何可操作的可行性。他甚至说：美国到2050年，要减少碳排放量的80%。这有可能性吗？有！一是在此之前人类已经把石油用完了，没有什么碳可以排放了；二是打核战争了；也有可能是二者一起来了。如果不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变，美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

能够做到不增长都难。可奥巴马把这些告诉美国人民了吗？他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了，到2050年，奥巴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随便吹吧。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我记得晓军曾给我打电话说：中国国内那些亲美媚美派，在奥巴马当选的问题上已经分为两派，那些虽然亲美媚美，但和美国尚无血肉相连的感觉，或者见识较浅的人，都在欢呼奥巴马的胜利，可是那些已经真正全身心地效忠于美国，与美国血肉相连，有比较有见识的亲美媚美派，却都在因奥巴马的当选而替美国担忧。我看这些真正效忠于美国的中国人见识倒还是有的。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确实一片欢呼，我也看了中国电视，中国专家们也是一片欢呼，都认为美国很多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对此我实在是深表怀疑。要解决美国今天的问题，是不能光喊口号的，你要给出东西，就必须找到东西的来源。能量守恒、物质不灭，是基本的物理学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那么我们看一看，要实现奥巴马给美国人民许的那些给好处的愿，以及他的“绿色”构想，来源在哪里？

我认为，第一个来源只能是实事求是地要求美国人民共度时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挥霍无度

的生活方式。这件事当然是很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奥巴马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高人气，引导美国人民往这个方向走。毕竟，就算是美国真的把碳排放量减少80%，也只不过是达到了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水平，既然中国人可以做到，也还活着，为什么美国人就不可以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是美国一切“变革”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所谓的“变革”都是空谈。但奥巴马的施政方略和演说完全没有涉及这样一个方向，而是给出可以过更挥霍无度的生活的许诺。这也就是说，奥巴马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叫的“变革”，只是一种指望天上“变革”出馅饼的虚伪许诺，而众多的美国人相信这样的许诺，则表明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

第二个来源是劫富济贫，即拿美国的富人开刀，从他们那里拿东西，也就是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奥巴马有这个意思，这也使得美国国内外的左派欣喜若狂。但他上台之后，偏左的经济政策许诺到底会不会兑现？如果不兑现，他辜负了今天怀着满腔希望把他选上台的选民。虽说美国总统选上之后一般都会对选举时的承诺打折扣，但你说话完全不算数还是会有不少问题。如果兑现呢？增税，惩罚那些把业务搬到海外的美国的企业？要是这样，

人家企业干脆就不当美国企业了你又如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准备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的地方很多，奥巴马如果真这么干很有可能把企业赶跑，那不是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了吗？

就拿眼前的事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如果不大幅裁减工人工资，至少减到美国本土的外资汽车厂，如丰田、日产、本田等的水平，就是没救的。即使能救得了几个月，也不过一年半载，还是救不了永远。所以，要救美国经济，单纯偏左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必须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左，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右。奥巴马有这个政治智慧做到吗？有这个政治本钱做到吗？我看这些都没有。

现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已经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简而言之，就是表明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小政府、大社会”的事你们就不要吵吵了，我该大政府就大政府了；自由市场的事你们也别吵吵了，我该政府干预就政府干预了。这似乎颇有罗斯福的气概，但是，我已经说过，今天美国的问题和罗斯福时代大有不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确实就是一个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今天的美国，本来就欠着债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本国生产能力根本就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求的问题。用同样的药方治



完全相反的病症，我看要出更大的问题。

我实在看不出奥巴马就能更好地把美国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我已经讲过，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原因，笼统地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老了，美国人“八旗子弟化”了。美国社会老化这个问题使得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1929年那么猛烈，却比那一次更难解决，换谁都一样，但像希拉里、麦凯恩等至少还稳健一点，少吹一点牛。

第三个来源是外国人。一是骗，骗外国人的钱。在美国金融赌场穿帮之后，这件事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大家不仅接受了教训，也没钱被它骗了——也许只剩下想去华尔街“抄底”的中国买办还准备拿着中国人的钱主动去被它骗。二是向外国人借。可现如今，欧洲的盟友自身难保，自己也钱紧得很，有钱也未必会帮它。就连美国最铁，也是最有钱的盟友日本，都连续减持美国国债。只剩下一个经常挨它敲打，被它看作潜在的敌人的中国，还在那里执著地增持它的国债，但中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日渐增高，使得任何人，对美国再有深厚的感情，要大把花钱去帮它时，也心有忌惮。

第四个来源就只能是抢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超级强大，这是美国唯一突出的长处。我有一位朋友的老板是美国人，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有次

美国老板和我们说到美国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国债淹脚面。我说阿拉斯加有很多自然资源，美国可以以这个为抵押还款。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真惨到那光景混不下去的时候，好歹我们还有那么多军队可以出去抢钱，何必卖家当呢？”看来这个美国人还是挺坦率的，直白他们在经济危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军队出去抢钱。我看这是美国人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只不过那些记者、教授、政客们未必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然而，如我以前说过的，美国人去抢伊拉克已经被证明效率不高，如果要抢比伊拉克还强大得多的国家，未必能赚。奥巴马不是要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到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更有威胁的战略要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吗？然而，制造或助长紧张局势，挑唆其他国家打仗，然后卖军火赚钱，确实是美国的长项。所以，中东、南亚次大陆等局势的紧张，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 摇滚歌星式的奥巴马“变革”

简而言之，美国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谁当政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奥巴马摇滚歌星式的执政方式是更不行的。我看他执政不如希拉里、麦凯恩，乃至小布什。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好，能够制衡一个没有执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统，甚至能够制约一个胡来的总统，我在相当程度上认

可这种说法。但这样一来，美国所谓的“变革”也就成了胡扯了。

有人把美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这件事本身认为是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变革，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彻底被清除了，并且认为这是全世界各族人民走向大同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纽约时报》称奥巴马当选扫除了美国“种族屏障”，中国一些学者也说奥巴马当选表明了美国种族问题淡化了。我看还不一定。首先，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变坏的可能性都有。种族问题要是那么好解决，现在美国应该早就不存在白人和黑人的分界了——都一起住了好几百年了，早该混血混得差不多了。可事实是白人和黑人的分界还是鲜明地存在着。这次，如果只有白人投票，奥巴马还是输了。有些人说奥巴马这次已经创造了近几十年民主党在白人选民中的最高支持率，但是，考虑到小布什这些年来外政策的不得人心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奥巴马是个白人，我认为他一定也会在白人选民中获胜。再次，你看看麦凯恩承认失败的讲话时的场面：在场的几乎都是白人，当麦凯恩说祝贺奥巴马当选时，全场一片嘘声。小布什在临下台时有个讲话，告诫共和党人不要对于奥巴马仇恨过甚，这恰恰说明了在共

和党内部对于奥巴马的怨怼超过了以往一般的政权交替。我认为，美国的一些种族主义观念较强的白人反而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变得更“种族主义”，并有可能更多地从思想转化为行动。当然，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白人正沉浸在他们的国家选举出一个黑人总统给他们带来的道德优越感中，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愿意给奥巴马较多的时间来取得成效。但我认为，美国人的这种欣喜如果没有奥巴马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实质性利益迅速跟上，希望很快就会转化成失望，这时候他们本能的种族主义情绪会不会又上来？

从国际层面上说，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我怀疑奥巴马能做得更好。奥巴马当选，欧洲的欢呼声比美国本土还强，期待美国会放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一味强硬。但放弃单边主义和强硬政策，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伊拉克问题。奥巴马准备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在上任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于阿富汗吗？现在很多拥护他的美国人民都盼着他兑现诺言呢。可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很难说。现在能说的是，奥巴马准备把兵力集中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

线，以加强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另一个俄罗斯问题，俄罗斯对于美国的挑战姿态是明显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奥巴马当选的同一天发表的国情咨文强烈谴责了美国，并明确宣布：由于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拒绝解散导弹部队的三个团，同时准备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摆明了强硬对抗的姿态。比起冷战后那一段美国一极独大的黄金岁月，俄罗斯的对抗姿态使得今天的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这都是个难题，奥巴马就能做得更好？我怀疑。而恰恰由于奥巴马是属于少数族裔的黑人，在国际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他会受到比一个白人总统更多的批评和怀疑。

这次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去了200万人，气氛热烈到了极点。毫无疑问，在今天民众陷入茫然无措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一个摇滚歌星似的总统来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让大家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困窘。真正优秀的摇滚歌星凯莉在现场把大家的情绪调动到如火箭一飞冲天，但戏散了大家还得回家面对现实。我认为，无论现在美国人民多么热烈地拥护奥巴马，只要他不能立即带来明显的好处，美国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他的拥护、国民的团结，很快就

会转变成怀疑、批评和分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当今这个困难时期，由少数族裔担任总统，立即成功便罢，否则就很快会转变成劣势，他会得不到多数族裔背景的总统所能得到的那种谅解和信任。

我在前面的大多数判断，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的。我无意于“jinx”美国，我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疑问，提醒大家除了一片乐观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我衷心希望美国人民成功。从中国的角度说，我们需要的是警惕美国出现严重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选择战争或挑唆战争。所以，张兆垠将军2008年12月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主张“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乃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

##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宋强

1998年的时候，在一本书的序言里，我写过类似的话，一个人，大凡不会邪恶到这种程度，因为拗持他的观点，不惜乐见用别人的生命、别人的鲜血、别人的损失去证明。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偏偏显得好像我们很邪恶。一本粗疏的“说不”，一些貌似偏执的情绪色彩很强的快论，包括中美之间的冲撞，包括后记里“15年内美国必然要出大问题”这样的访美心得，主流学术根本不屑于认真对待的预言，偏偏要应验，偏偏有这么多不争气的事情一轴一轴地凑上来帮着印证。你说这叫什么事？

全世界都在帮一个具有威望和实力的大国买单，这也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买单的时间太长了，伺候到了这种程度：把美国人惯的，不干活偏偏要住大房子（王小东语），而人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状况延续了很久，被认为是正常的。有人不平衡，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反而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个“世界秩序”的铁桶什么时候被摇撼的？有人说是《日本可以说不》，有人说更早，是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因为他公开怀疑过美国工人的素质，似乎还酿成了一场外交风波。总之，轮到日本人对这种秩序发发牢骚，说说风凉话，才会

被认真对待。而亚非拉国家一旦有点自我意识，都被看成“愣头青”，挨了打活该，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

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像某些亚非拉国家那样勇于惹事，可是我们也挨了打。这也是有转折意义的往事，连我们几个“说不”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态会那么邪性！

大家知道的，1999年发生了炸馆事件。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安贞桥一家饭馆和几个朋友吃午饭，一个哥们儿来了电话：中国驻南使馆挨炸了，午间新闻刚刚播的。一起吃饭的朋友有一个是团中央院校部的，他另外一个职务是全国学联的办公室主任，听到这个事哆嗦了，手脚浮动了。他说了一句话，真是不想来什么就来什么。他们团系的干部很不容易，“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压力太大。那些日子他确实很累，好不容易溜出来喝点啤酒，又得提前告辞回单位了——得去应对学生的示威游行啊。

那几天，我去了北大三角地，去了英美大使馆，见证了那场“人民外交”风云。我听到人们在怒吼，同时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免的“消解”的插曲，一个哥们儿提议：一起唱国歌吧。他刚起了一个头，后面有人说：操，唱错了，那是



《国际歌》！一片哄笑声。说实话，这个场面，我觉得该难为情的是我们大家。我们自我消解、自我放任的历史太长了，当我们真正需要自我表征一下的时候，感觉都不太像。文化深层面被揉碎的东西，有时候在日常细节中是可感的。

那个时候，许多中国人都极其郁闷，包括那些特别精纯地相信这些西方国家会真诚地帮助中国民主富强的学者们，他们的滋味可能更不好受。在北大三角地，我就听教工说，某些平时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紧贴着老美的教授，这个时候傻眼了，噙着眼泪喃喃自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我也想问问：怎么会这样？

人都是有局限的，修炼得再好，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姿态。那个时候，看到慷慨激昂的自由主义斗士们的无语，听到他们的低泣，我有一种释然的心情。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都不宽恕”是非常对的。我们确实带着莫大的快意，看着自由知识分子无语的窘态。这不叫邪恶，但确实不是“高姿态”。我又会和他们同悲，我认为这种受损害的悲痛是真诚的，我尊敬这种真诚。因为我觉得那饱含眼泪的老教授还没有堕落到这种程度：觉得自己的国家遭到袭击，这个国家受到侮辱，是一件可乐可贺的事。比起今天的某些精神现实，比起那种公开

宣扬要当美国兵，不惜做美国兵而战死的叫嚣，比起宋永毅之流的“下流的民族”的咒骂，比起那种理直气壮甘当“第五纵队”的行为艺术——这种情怀，贴上去想跟别人亲近却而被踹回来的失落，实在是可以给予足够同情的（虽然确实是一种亲美的情怀，也值得同情）。

可以由此而说到的，是我们怎样在长久失去自我表征的能力：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习惯于在别人的评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说到这一点，想岔开说两句，“第三只眼睛”的情结，喜欢从镜像中看自己的心态，倒不属于什么“劣根性”。日本老百姓不是也很喜欢外国人写日本的书吗？对本国人士信不过，这个现象，可能是相当数量的人类可爱的毛病，我用了一个字眼，“村社”情结。对近邻亲族，哪怕是优秀的表现，会撇嘴，会有点不服气，会找他的茬，会给他喝倒彩。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中国人变得“洋气”了，然而难以觉察的是“村社”情结也在膨胀。越是以前熟悉的，越是看不起，以最简单的逻辑，把熟知的经验斥之为陈腐，几乎是发自本能的去讥笑它，所以不自信的心理之源，从这种乡巴佬情结（乡巴佬没有侮辱的意思，大多数时候不失可爱，我喜欢柴科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就是俄罗斯的

乡巴佬。)中，找到文化信息有趣一面。老百姓看电视，看到正经的场面，会敬肃，不言语，但只要是本县本乡人人出来，都会哄笑，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气氛马上变得活泼起来。所以自虐的现象，“贬熟”的风气，是基因在里头的，可以趣味性解读，没必要动不动上纲上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我长期是以善意来看待自我讨伐现象的，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表现。可是，我们讨伐国民劣根性那么多年，有没有想到过，把热衷于“贬熟”的“村社”情结讨伐讨伐呢？为什么不把另外一种基因拿出来说道说道呢？讨伐的目的，难道不是求得我们自己稍微变得尊贵一点吗？这个关于日常生活的小观察，也许可以推演到很大的方面，知识，学问，思维，发生着的扭曲，和我们的纵容自己，不讲求变化气质，难道没有关系吗？

自我矮化的风气，从小处着眼，是有文化传承的。

我们稍不注意，就被惯性驱使，失掉尊贵，浑然不知，我们长期笑话日本人在交际上，在其他的某些领域，动不动表现出来的近乎神经质的反应，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们还会嘲笑阿拉伯人。可是，难道自我保护意识的荒废与放纵，方方面面的麻木

不仁，才是“大气”的表现吗？学者专家动不动批民间声音对中国遭到羞辱的反映“缺乏大国风度”，难道就没有想一想，对青年们的一触即跳和幼稚，和我们反应机制的松弛没有关系吗？为什么不从这个层面，真诚地检讨“国民劣根性”？

这种不自信的历史是如此漫长，让人想到了“沈崇事件”里外前后国人的表演。60多年前，北平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后，很多要面子的中国人异乎寻常地关心着在日本的另一起美军强奸案，包括中国的外交官，都担心美国法官不给我们台阶下。大伙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猜度着美国人会怎么去判。当他们得知驻日美军法庭判决强奸犯死刑而北平强奸案的美军中士无罪开释被护送回国时，天崩地裂的感觉可想而知！我们的尊严，可悲地依附于别人的脸色；我们的脆弱和绝望，源于“同比”的不公。在一种被蔑视的失落感中，才吞吞吐吐地承认独立自由的时代合理性。

这是中国人精神史上极其灰色的一章，原以为这种颓丧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有有所改善。然而我看到了什么呢？相比那个时代而言，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恶毒的咒念，已经变得直率了很多。残忍的施虐、下流的语言比比皆是，可是没事，他们的境遇比许多草根爱国分子好得多，还可

以被奉为“时代的良心”。这是这个时代的超级悖论，无原则地咒骂自己的国家、打压一切申诉国权族权的行为，被视作“正派人”的作为！或者能博得最清醒、最高超的名声！这就不是什么“自我表征”的问题了，而是丧心病狂的自我摧毁。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范畴，也不能不说没有联系。

早些年，关于乔良的《超限战》，有一场笔墨官司，这个官司的曲直姑且不论。令人作呕的是，指控作家乔良的书评人为了显示其高超，顺手拈来了一些“国际资讯”，来为自己加分，这个插曲，也说明实行自我矮化已经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本能。我当年为乔良声辩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书评人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本书其实在国际上“一片恶评”……“一片恶评”的说法从何而来？笔者一直在关心关于《超限战》的各种反馈，竟然感到讶异，是本人孤陋寡闻还是跟不上凭才气做文章的写作大趋势？

总之是谁都没有用足够的资讯来告诉我们：国际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片恶评”声的。联想到当年有人言之凿凿说一本时政评论书吓退了多少多少外资，我们认为应该对书评家发一句忠告：一本书的意义有限，不要给读者制造无谓的恐惧。《超限战》这本书造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美国思想库和

军方也有一定的反应（不排除发生了一些担忧）。但如果因此恣意夸大它在西方军事界的影响（哪怕是善意的）或就此事制造某种恐惧：比如指责它“反文明”，比如断言它是邪恶的民意折射，这两种做法都是过于“超限”的。

长期以来，清流评论家沾染上一种毛病：动不动把中国民众思想趋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社会思想现实联系在一起，甚至民众正常的阅读趣好也被解读出一大堆不祥的讯号，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疏离程度真的至此了吗？且不说清流们向民众“普及文明”的可笑，联想到某些本土知识分子这些年不遗余力地炮制中国式暴民黄祸图舆（甚至比西方还要卖力），需要再次告诫一句：不要制造无谓的恐惧。

毋庸讳言，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而西方的回答是：“你们在哪里？”自我矮化的时代歧路，绝不是心理镜像，而是周遍都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丧失了自我表征的动力和能力，这是现实中最大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韩寒在“龙图腾”问题上对吴

友富的批评是特别到位的，韩寒写道：“据说，DRAGON的英文意思是充满攻击性和霸气的庞然大物。……改成温驯的没有攻击性的黄金猎犬是最合适不过。这样多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专家按照自己提出的意见，他可以率先称自己为狗的传人，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

而图腾争执后来升级了，成为2009年初的新闻看点。零点集团总裁、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袁岳搞了一个创新性建议：龙太霸气，代表的是古代中国，应该用温顺的熊猫做现代中国的图腾。对于这种闹腾，王小东的回答更干脆：如果不在乎外国友人是否喜欢，那还不如干脆选赛金花算了！王小东在北京电台里是这样说的：

如果中国凡事都要以外国人喜欢不喜欢为标准，我以为，那就干脆一步到位，直接以赛金花为中国的图腾好了。理由：“国际友人”一定更喜欢赛金花，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是赛金花，那“国际友人”们还不得爽死！

这些精英……吸取中国最多，却最害国，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做个了断？

一个国家的图腾只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化倾向的很狭窄的一个方面，不可能代表全部。如果中国文化，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有某一个方面需要代

表的话，我宁可选择精英们诟病的强大，而不是他们热衷的温顺——他们似乎只对外国人温顺，对国人好像也是很凶的（鲁迅先生怎么说这种现象来着：在凶兽面前显羊样，在羊面前显凶兽样）。

中国的老百姓要争气，不要当羊啊！

黄纪苏描绘的一个“胸无大志时代的文化谱系”，造就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现实。

失去自我表征的勇气，如果都被指斥为没有智慧，那也不公，但总觉得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过了头的“智慧”。那阵“第三次思想解放”最热乎的时候，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在一次研讨会上跟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说了一番别再强调什么意识形态不同啦，等等。霍克听了，马上反应：这位先生的表述是错误的！国与国之间……翻译觉得会让院长大人下不了台，不敢翻译。王小东叫了起来：翻译啊，怎么不翻译了？

翻译出来了，霍克前总理说出来的话，根本不跟你讲朋友。醒醒吧，人家根本不跟你玩虚头滑脑的一套。

我听了这个插曲，感觉的是莫大的悲哀，想贴上去，被人给踹回来了。

这里想到的问题，其实我早就认识到的，不能否定一些持“浪漫开放派”人士的国族情怀。很多



人也有信心，很多人从感情上是不愿意自虐的。比如，他们会讲：中国这个民族在西方人美国人的眼里还是神秘而且有魅力的，是能够赢得尊敬的。不管这话是否天真，我相信许多寄希望于美国给我们民族好的表现机会的中国人都是真诚的爱国分子，虽然这种爱国情怀不是全面的。我也相信，许多激烈反对“说不”及反对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生都是拥有一定智慧的国策派，往高里说，他们有春秋时代智囊型知识分子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希望中国在这个险恶的世界环境中有着充裕的发展空间，交足够的朋友，做赚钱的生意，然后步入西方行列。一句话，希望中国能够傍上西方的大款。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指责的，然而因为这种信念，而去故意遮蔽另外一种事实，却不能不说：这种做法又是极其不正派的。

##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宋强

对于“浪漫开放派”人士来说，大概他们感到最难堪的就是这一点，面对西方，他们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一场，不就是朝着你们贴近吗？还要我们怎么把话说透底呢？我们急吼吼跟尼泊尔毛派划清界限（才不管别人骂我们怯懦呢），我们对很多国际事件哼哼哈哈，不就是为着去抹平“洋大人”不快的记忆吗？什么“斯巴达国家”，什么“红色中国”，我们在竭力抹平这个，你们为什么还抱着“洋教条”不放呢？

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主张，不惜闹崩了都要去坚持的主张，就是一个坚守底线的问题。什么“情绪化”不“情绪化”？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不妨去想一下：这么些年来，西方和中国，到底是谁在考验谁的耐心？难道被打脸不作声，那才叫不“情绪化”？习近平最近在拉美对华侨讲话，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外交场合，在民间国际交流中，经常看到某

些批评、某些挑衅，经常有中方人士这样激愤反问：你要我们怎样做才能满意？

搞外交，并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样，未必是佛陀一样的不形之于色，大多数时间也并非酒杯亲善，就像20世纪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题材”电影，把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场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涂抹一番，说一些欧化句式，哼哼哈哈，整个肉麻了得。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国代表脸上悠悠地喷烟，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总理在以色列领导人面前愤而离席，可以看到克林顿面对日本学生鲁莽的问题显示出的窘态，可以看到鲍威尔讲话指责南部非洲内政问题时国际会场的惊讶的尖叫和激动的抗议（甚至还有要上台扭打的冲动表现），可以看到卡洛斯国王打断查韦斯“你为什么不开嘴”，看到当年的纳赛尔像呵斥小孩子一样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赛因国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情感抉择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规律，爱显示自己见识广的装蒜“高人”从来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这不对的，国与国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点，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就是。虽然现在大家批评这个法则很野蛮，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了，事实上，国际关系上，以“温情”之壳行使冷酷野蛮之实的事，倒是比比

皆是。看看《卢旺达饭店》，不就是这样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对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级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国通，他们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喜欢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向着你们的，其实我们特理解你们，理解阁下的职务压力（这是特别聪明的西方信使的口头禅，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这里面的善意成分，因为当年，他们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有国会，我们给国会、给少数党领袖面子上得有个交待，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你们担待一点，……诸如此类。

早些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切磋的时候，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可不可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我们国内的民意汹涌啊，人民提高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你看，这回你们就担待一点吧。

所以，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

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又想起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有条件决裂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果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再说到情感选择，其实是人类交往中极其高端的形式。我们经常看到生意场上，老总之间闹掰了，会扔下一句话：你算计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玩我！这里，生物性的反应可以暂时压倒一切。这种反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

国际间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我觉得中国网民对这个人的评判并不幼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发表了一些乱弹中国的讲话，比如“把婴儿放到水里煮”，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

就不会把水平放到他的层次的，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来打趣。但是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有个“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着脚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萨科齐就有点像那个“发贱鬼”。不把他彻底教训一回——就像诗人王琪博常说的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不这样，一定于事无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倣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 十六、萨科齐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王小东

这次萨科齐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没去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是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后天是丙，几圈下来，一个不拉，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而中国这种给其他人更多好处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不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幼儿园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进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国

家的实际力量，他们虽然力图遏制我们，却也不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还得跟我们做生意，同理，以我们今天的实力，也还得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还不具备跟他们全面翻脸的实力。对于他们给我们添恶心的回应，要么是直接惩罚那个国家，如果惩罚有困难，则只能先不理睬，但决不应该用奖励其他西方国家的办法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买美国或欧洲的大飞机，既然不得不买，我们就没有以不买西方国家大飞机来惩罚他们的能力，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以买谁的大飞机来作为外交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应该完全不考虑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们今天说美国惹了我们，所以去买空客，明天又说欧洲惹了我们，所以去买波音，几个轮次下来，他们还可以借所谓的政治上“友好”而抬价，我们自己却成了傻瓜。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呢？难道就是不回应吗？我认为，可以有很多的着眼于长远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让中国国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技术优势欺凌我们的，我们要不受他们欺凌，就必须把自己的产业技术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自己的先进燃气轮机，自己的先进的数控机床，自己的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等等。其次，我



们的主流媒体，早就应该停止对于西方人的美化、神话了，早就该告诉国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国的电视早就应该告诉中国人：巴黎的地铁、巴黎的街道有多么肮脏，这一切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普通”驴友所拍摄的照片为证。而这一切都反映了法国人素质的低下，以此作为对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达赖抛媚眼的回应，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十年前就写过《光荣孤立论》，那里面的思想今天仍旧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一切回应，都不是直接针对外国，而是着眼于练自己的内功，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宋强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

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樣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告“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

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

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

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

话，你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更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

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



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

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章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

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宋强

距那本“说不”发表已经十多年了，五个作者仿佛是创下了孤例，不再借势上杆子说不，而是“不说”（张小波就写了一篇短文，名叫“中国可以说”）。“不说”的意思是，看着国内知识界那种皮里阳秋，本来接下来再写“精英之死”的，看了一下状况无言以对，还不像王朔，话说了个半截，扔出一句：“我骂的人都是人品可疑的。”

那年我们说了话，应和了一股风潮。四川话有一个词“打眼”，这是一个略带负值评判的俗语，意思是说特别显眼，突兀得当事人自己都不自在。“说不”成了1996那一年很“打眼”的一个标志，记得当年说了一句话：爱国不能当饭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年是在言说我们自己的身份状态，所以我们说：“说不”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一个体制外作者的写作路径，“爱国不能当饭吃”，是有其谋生手段的意指的。但是，若干年后看到龙永图在那里说：听说有一本《中国可以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说“不”的。听到龙永图的高论，我们更加明白，爱国又确实关乎了吃饭问题，龙永图先生不会不知道，在国家利益上，存在

着博弈，因此，在谈判桌上随时存在着“说不”和“说YES”的变化。这个道理他不会假装不懂吧？

我觉得，需要特别强调“爱国”这样一个题义，肯定是因为内部外部都出了问题。

我们经常在教育课和少先队的仪式中听到“爱国”这个字眼，因此大家有个感觉——“爱国”好像有点小儿科。但是又要说了，什么叫“小儿科”？人要安身立命，赚钱、体面、感情缺一不可，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堕落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力量不够强，所以我们不要去“说不”，体面、感情都可以不要了，那世人会把我们看成什么东西？现实之中的劳资关系都不一定“谁有钱谁是老大”，国与国的关系怎么可以是这样呢？况且做生意和讲权利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多年前就剖析过：这是奴隶思想和霸权思想的混合物。联想到龙永图先生后来大骂平民百姓是“刁民”，证明我们对这个人的不友好的猜度，对他思维品质的蔑视，对他这个人一切不靠谱言行的讪笑，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年北约刚刚开始打南斯拉夫，我在旁听一个国际形势研讨会的时候，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员在纵论天下大势，他讲的很多东西非常有趣，丝丝入

扣，很有说服力。但当他说到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时，一句话令在场人士感到讶异——“现在老百姓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都吃上生猛海鲜了……”当时我就听到有人低语：“是你吃上生猛海鲜了吧？”国防大学教员说话的腔调，确实容易得罪人。且不说他这句话的漏洞，但是他起码说对了一点：吃饭问题，随时在支配着我们的理念。那好，我们少说点理想，少说点“情感抉择”，可以的啊！宋晓军和王小东都论述到中西方博弈中隐伏的“吃饭”问题的实质——“持剑经商”等等都是。很多专家都在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个话题非我所长，但是起码在图书业的竞争中，能够感觉到这一点。贝塔斯曼刚刚垮掉，贝塔斯曼在业内的砸钱，那个不把别人都挤对掉誓不罢休的狂劲儿，人所共知，可悲的是贝塔斯曼是被他内部上上下下的贪腐盛行弄垮的。最近，另一个外资图书发行公司又惹了官司，原因是它以低于进价的折扣销货，老老实实卖书的中国企业当然急眼了，当然要跟它打官司。

这里举了图书业的例子只是小处着眼，没有生发开的意思。讲到金融战争，连王小东都对“阴谋论”有保留，可是我觉得从大的情势来看：就是有阴谋！“阴谋论”没错！

有些国人总喜欢把老外渲染成那种有道德洁癖的那一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人里里外外见识多了，外国人也是人！外国人比中国人懂怎么掐架！十几年前小东跟我讲述少年时代掐架的往事，我印象很深。他说，你拿板砖威胁拍人，就得有那个真敢拍上去的底气！否则是唬不住人的，你只能挨揍。

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有条件决裂”的真谛。

有条件决裂，就是掐架，商战、军战都是。

这么多的国际事态，凭着看《三国演义》的那一点学问，都能知道在那种道貌岸然的背后，藏不住的是什么。西方已经扯下来最温情脉脉的伪饰，有些中国人，弄不明白他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且让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国际关系吧，且让我们不要吞吞吐吐，正视“崩盘”的可能吧，“有条件决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和平不可能，你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争权，崛起，谈都不敢谈吧？邓小平说过：决不当头，可是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要有所作为。

还记得，宋晓军激愤地反问过：都在支支吾吾，不敢言“战”，连做个电视节目都在有意绕开，你怎么绕？要是台湾真独立怎么办？

鸵鸟，也不至于这样去“鸵鸟”吧？

那一年，对台湾问题，我们这样分析，中国是一个有热烈文学情感的国家，但是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我们问所有的“聪明人”：

但怎样才能叫“现实的态度”？如果构成我们国家基石的起码要素都不能成为最大的现实，那么还有什么能算得上是“现实”的？

现实就是吃饭，现实就是吃饭可能还要抢盘子，讲国家利益，没有“唯改革派”和“市场浪漫主义”吹鼓手们说得那样落后反动。

萨科齐在中法关系上大玩云雨术，中国报界终于用了一个词：“制裁”，最终制裁与否，姑且不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是一个有划时代的表态，中国人也敢掐架了。

有什么不好呢？太好了！

很多的以“义愤”为己任的网站，很多的追逐“先进价值”的网民，在国与国的关系判断上，是极其幼稚的；而在强弱之分面前，他们又是极其势利眼的，在哈马斯问题上，在西方制裁缅甸问题上，他们富有个性的表演，只是逞一时之快，他们



的时事判断，比过去票友还差一截子，这里的最大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自觉性。

一篇时评这样写道：

看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安理会高高举起右手、向英美提交的缅甸问题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的照片，很容易联想起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

如果说10多年前，“说不”还只是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幻象的话，那么今天，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家的日趋强盛，中国在诸多涉及国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问题上，可以越来越从容地举手“说不”。

缅甸毗邻中国和印度，也是唯一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陆路通道，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英美出于地区战略而向缅甸挥舞大棒之际，中国的否决理直气壮，也为中国通往印度洋之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要讲利益，就不能回避斗争。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或者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

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

## 十九、中国可以说

宋强

这里又想到“中国可以说”这个由头，我们倒是因为对某些可笑的表演说了几句风凉话，差点被自由战士崔卫平封杀。头两年在《SOHO小报》发表一篇文章，调侃一下著名的崔卫平教授。这事很简单，她译了米奇尼克的书通过个人渠道卖，卖得好，她开始大幅度涨价。本来这件事谁都不好说什么的。这里面有个局啊，假如有关部门把她的书查封了，她就是民主自由的烈士、殉道者。她玩了个擦边效应，拼命敛财。大家有些议论，都不好说；说了招嫌啊。张小波说：去她的，就说了！

这篇《今晚，谁在阅读米尼奇克》这样写的：

要承认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有着普世情怀的女教授在兜售这本册子，32开400来页的民主培训必读书，索价30元，后来行情看涨，提到35元。以善的名义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大可能是米奇尼克先生自己的意思，（会有好事者问米尼奇克能拿到版税吗？）翻译者大概不会心思缜密到会一边拿翻译稿酬一边兼为某种崇高的事业募集献金。本书并非公开出版物，自然受到许多局限，又增添了许多令人叹惋的悲壮的色彩。她那副勇于济世的悲壮姿态和理直气壮的敛财，使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本身蕴涵的张力。

.....

佛教《劝世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阎王请两个即将转世投胎的人选择：你们是希望过索取的人生呢，还是过一种给予的人生？第一个人说：我选择过那种索取的人生；第二个人说：那我就过那种给予的人生好了。阎王于是决定了两个人的去向，那个希望索取的去当乞丐，每天接收人的施舍；那个有襟怀肯去给予的则做了大富翁，有了经济实力，于是可以天天仗义疏财，修庙铺路。这个故事品位虽不是太高，但给了那些有志去济世开愚的聪明人以勇气。这个隐喻很俗，但它是一种很实惠的甜俗，可操作性较强，难怪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乐于去仿摹。

文章登出来，还贴在网页上，崔卫平气势汹汹勒令：给我删了！

这就是自由民主战士对待她不喜欢的言论的态度。

这是一个失范了的时代的超级悖论。泡沫汹涌下的真相，可能是颠倒的镜像。由此想到，在中国，做一个抱持民族立场的言说者，会有落伍之虞。但是看看这些龌龊的货色，看看他们的虚伪拙劣，你又不得不对未来前景感到鼓舞，因为即使中

国按照他们的路径走，让他们得势，受愚弄的还是老百姓，贪婪的精英上台，没准儿又是一个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倒会“武运长久”。

诗人徐江笑云：真的要把这种人想象成有道德洁癖的人，那就傻了。其实，打破这些涂抹着启蒙光泽的牌坊，倒是符合80年代的反潮流精神，这也是《中国可以说不》一以贯之的精神，看着知识精英骨子里的虚伪，精明到了愚蠢程度的经营算计，实在要替他们拆一下台。就像卓别林在电影里经常做的，朝着道貌岸然的大师屁股来上这么一脚。一切都可以彻底解构。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确实活泼有生趣，具有中国气派。

在我们这里，到处触目可见的是生活模仿艺术。不堪的真相，比《儒林外史》最不厚道的描摹更如画。那些在浪沫里招摇着的伟大演员，真是大家设想的那样执拗、孤岸，抱着崇高的不合作精神吗？对于他们的真实生态，对于他们的渴望“招安”的情结，可以不说。从这个层面上说，范跑跑符合他们的本质。

那么，希望在哪里呢？

有人憧憬着中国诞生自己的摩西，在这个世界大变局中找寻自己的“出埃及”之路。年轻人主张

的一种“具有勇气的思想”，倒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落地”感觉的阀门。

想到宋晓军写到的俄罗斯的80后，想到中国的年轻一代。80后女孩林子这样写道：

虽然它（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是源于对自己民族自豪的分支，但这两个分支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民族主义只强调自己民族的优秀，而不宣称别人民族的低劣，更不会无耻地给各个种族划分严格的等级。

民族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不至于流离失所，生活愉快不至于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于受人所制。

我坚持相信，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上最情感、最有勇气的思想，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冷酷无情、野蛮贬义，特别是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出自中国人之口的时候，会倍感伤怀，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对家园、对亲人最基本的情感，或许他们企图把整个世界当作家园，把每一个人当作亲人，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国度和民族的概念依然存在，美国绿卡依然很难拿到，别人还是把你当作客人，甚至企图把你，以及生活在非洲的黑人从“人类”这个物种中驱赶出去，重新建立一个可能叫作“黄祸”的物种。

而你最终在寻梦的过程中分不清回家的方向，  
记不起亲人的面庞，你只有继续流浪。

总有一天，过去的岁月会告诉他们，曾经有一个年代，在中华民族走向上升的年代，他们的上辈却在用“国民劣根性”把我们这个民族的面貌刻画得晦气重重卑劣而渺小。

总有一天，他们也加入到愤懑的一群的时候，  
会责难我们：我们为何早早地丢弃了骄傲，我们的灵魂为什么无所依托？

总有一天，他们回顾历史，会重新审视中华民族曾有的高贵的精神和“美的历程”。

总有一天，他们会咂摸这样的诗句包含着的历史信息、情感信息：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 附文1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

张小波 宋强

有一个朋友的岳父，这老人家的一生一世是又悲凉又喜剧的：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先是驻节A国，A国发生了巨变，他很尴尬地去了B国；不料B国积弱已久，最终被邻国合并了；他又去驻节C国，不久C国搞民族自决，原来的联邦拆成了两个国家，他又苦笑着去D国当大使，D国闹的乱子更大，解体了。经过这样一番历练，他的心态变得像一尊佛。佛观一碗水，四万八千虫。但他转过头来观照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命运比破城灭国还要崎岖——“文革”期间他为了躲避风浪，长期假装自己得了肝病，像一个真正的肝病患者那样起居饮食。晚年时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肝上真的有阴影——依经验判断是很凶险的阴影。全家人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老外交官进手术室那一天，他的儿子也从国外回来，等待残酷的判决。可是老人家的胸腔被打开以后，所有的专家都傻眼了：肝没有任何问题，仪器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假象。医学在这里变成了哲学：肝对人类进行了欺骗，谓之“肝欺骗”。危机结束了，一家人在欢聚，笑谈命运。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一家人庆祝老人家新生的晚宴上，从国外回来的儿子因为喜悦过度大笑



而亡。

这个故事和米奇尼克有什么关系？最近知识界搞得很兴奋的米奇尼克思想言论合集的行销，让人想起了奇趣知识圈的某种近似。国族命运与人世悲欢的缠绕，使得历史更像小说。看上去这个外交官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太像戏文，这就是生活模仿艺术的范例。人体上的一个器官变得有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加入到秩序的整合中——这又回到异化的话题上来了。而在米奇尼克的故事中，异化的道具不再是那具狂乱的肝，故事本身也没有这样雄奇，它是一场静悄悄的启蒙秀，生活照样模仿着艺术。

传播米尼奇克这个事本身不是小说题材，要承认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有着普世情怀的女教授在兜售这本册子，32开400来页的民主培训必读书，索价30元，后来行情看涨，提到35元。以善的名义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大可能是米奇尼克先生自己的意思，（会有好事者问米尼奇克能拿到版税吗？）翻译者大概不会心思缜密到一边拿翻译稿酬一边兼为某种崇高的事业募集献金。本书并非公开出版物，自然受到许多局限，又增添了许多令人叹惋的悲壮的色彩。她那副勇于济世的悲壮姿态和理直气壮的敛财，使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本身蕴涵

的张力。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今晚是成千上万的不满足于思想界长期庸碌无为的热情读者在渴饮米奇尼克。但必须看到对这个波兰思想家存在另外一种阅读——对伴随着感召力的市场潜能、发售前景和现金流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数读，包括它还有多大的涨价空间的喜悦的评估。当然，还兼有对推出这本书会获得的无形利益的解读。当拿到这本给中国的普罗大众们滋润自由民主之甘美的《通往公民社会》时，突然会想到在中国知识社会里一个恒久的玄奇的命题——我们越来越不像生活在正在“演进”的实体空间里，一边是高唱猛进，一边是精神世界的“肝欺骗”。我们更像生活在荒诞的小说场景之中。所以与知识界的异常兴奋相比，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天然自足的戏剧意蕴。

人们从米奇尼克的书中读到了心灵中非常稀缺的东西——包括自诩为天然的民主拥戴者和自由价值捍卫者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未曾意识到的可怕的盲点，我们为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个遥远而真切的未来而做着心灵和肉体上的蓄备，而我们同时又发现自己千疮百孔——生活在过于戏剧化的现实里，被冲突本身所牵制，冲突越奇伟，角色越渺小。这不仅是小说的悲哀，也是陷入了悖论里的文人书生

们的悲哀。

很少有人问：在通向未来走向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型争论范畴的问题，什么时候浮出水面，让我们擦了眼等着看。现在热谈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从这个事情解读出的公共性却是现金流织成的“公共”，而且你还不能质疑，操作这么一个敏感的题材多不容易啊，给人家一点压惊费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嘛。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两头占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性：若有麻烦我可以获得先行者的声名，而现在最好，我在长夜中播火，米奇尼克也不好意思问我版税的事。

这可是一支风险股，不是你们小角色能领会的。

女教授在播火，同时，她在丧失。她可能也预设到人们会囿于大义而羞于说出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的灵魂解放之路同时变成了自我丧失之路，在传播新思想扫荡众生的庸碌时，过于精明算计的预设和水涨船高的牟利又为这种庸碌麻木增添新的事实。佛教《劝世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阎王请两个即将转世投胎的人选择：你们是希望过索取的人生呢，还是过一种给予的人生？第一个人说：我选择过那种索取的人生；第二个人说：那我

就过那种给予的人生好了。阎王于是决定了两个人的去向，那个希望索取的去当乞丐，每天接收人的施舍；那个有襟怀肯去给予的则做了大富翁，有了经济实力，于是可以天天仗义疏财，修庙铺路。这个故事品位虽不是太高，但给了那些有志去济世开愚的聪明人以勇气。这个隐喻很俗，但它是一种很实惠的甜俗，可操作性较强，难怪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乐于去仿摹。

说到东方精神与西方物质，这个将宗教精义脱化活用的售书故事给了我们万般启迪，大公和小私和谐兼顾的薪火相传，叶绍钧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利害守恒，超越着一切古旧的短视的经验。当年的列宁若有知，会自叹弗如，因为他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火炬》都是自费油印，是无偿地散播到痛苦的俄国人民手中的。难怪俄国革命更像都市报纸卡通栏里“笨贼一大窝”的故事，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熬煎，革命也未能善终。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时评名叫“中国可以不说”（不是“说不”），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担忧说了犯嫌。现在的思想现实就是这样，政治正确性的考量让你不得不前后思忖，说话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曾经涉入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有人这样批评：借助于所谓民族大义和

国家利益的制高点占口风上的便宜算不得好汉。这样说不是操蛋吗，大凡辨事理写文章，没有比找到一种制高点更令人心安理得的事了，既然你承认我在制高点上那就别悻悻然。

但是今天这个关于制高点的套子也笼在自己身上了——面对这本备受欢迎的“内部参考资料”，笔者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不是那么心安，也不是那么理得。但是仍然要在一个低凹点上变了一个姿态对这个事件发出一两声坏笑，并施放出冷箭，因为从它的结构奇迷中解读出了能让我们大家偷笑的东西。

（《潮流反潮流》SOHO小报编辑部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版）

## 附文2 中国对美国的三个真正挑战

[美]傅立民（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重新崛起为富裕强国是对美国显要地位的直接威胁。然而，正如查尔斯·弗里曼所断言的那样，美国要想确保继续充当全球领袖的角色，就必须克服在经济、科学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自满情绪。

最令人担忧的是，当我们忧心忡忡地面对来自中国的双边挑战时，很可能会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而且，我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对于我们国内的自满情绪——特别是对美国在经济、科学和技术以及政治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自满情绪——构成的至少三大挑战。

现在就说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方向标或许有些荒谬。毕竟中国是后起之秀，而且没有人会把中国视为政治典范。

然而，中国正在奋发图强、竭力赶超，它的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和适应变革的能力使它在过去28年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这些现在反倒不是我们值得夸耀的品质了。

**全球领袖**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社会最安宁、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尽管说它是治理最好的国家还有争议。如

今，它终于痛下决心重现自己昔日的辉煌。

对于中国可能取得全球领袖地位的可能性绝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在于这个世界工厂展开企业合作时可能削弱我们现有的优势地位。

### 第一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来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及其政治继承人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嘲笑为“强盗资本主义”。

中国创造了许多奇迹，而付出的代价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腐败日益猖獗、对社会弱势群体仍然缺乏保护机制。

然而，尽管美国国内对于中国这种酷似狄更斯作品中描写的境况发出种种指责，但中国如今的确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它作为世界工厂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潜在领袖，在美国境内外赢得了赞誉也引发了恐惧。

**中国消费** 中国经济成功所带来的主要挑战更多地在于，它可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和资本市场，而不是充当全球产品制造商的地位。

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1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正在以极为谨慎的幅度稳步上升，并正在向完全实现浮动汇率迈进。

**实现浮动汇率** 许多中央银行和私营投资者目前

都在尽可能买入大量人民币。人民币汇率一旦完全放开，它将和欧元一样成为可供选择的外汇储备。

我们很可能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货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欧洲与中国所起的作用随其经济的影响力而水涨船高，而且我们不再享有经济优势的种种特权，必须与他人分享财力。

人民币也似乎可能成为账户的标准单位，在目前只能采用美元交易的能源及其他商品的贸易中使用。

**影响深远的投资** 中国已经消耗了世界上25%~40%的原煤、铁矿石、钢、铝和水泥。其能源进口每年以6%~7%的速度增长。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

中国在自然资源上的投资也使其迅速成为在亚洲最具影响的经济力量，并成为拉丁美洲等地区可取代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经济伙伴。

**不再遭到冷遇** 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开始开放，但它很有可能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世界金融中心——看看它的开放、活力和规模便可知道，更不用说它超高的储蓄率。

中国是个资本出口的债权国。中国机构不久将收购的远不只是厚厚一叠的美国国库券。中国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近来在国际证券市场的初期投入只是



刚刚拉开序幕。

我想我们要好好感谢我们的新任财长不同于国防部长，选择了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不是冷眼相待。

## 第二大挑战

第二大挑战来自于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越他人的雄心。美国人已对主导科技领域及全球贸易与金融习以为常。但如今，我们的毕业生中仅有15%能拿到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的本科学位。

中国在该领域的毕业生达到50%。美国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人中有34%是外国学生，而取得工程博士学位的学生中留学生占56%。在科技领域中有许多最优秀的学生是中国人。

严密的安全措施 然而，“9·11”之后我们社会安全的管理和签证政策都发生了变化，致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被拒之门外，大大削弱了我们的吸引力。现在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人数比去美国的多——去欧洲其他国家的也很多。

由于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雇到中国或印度的工程师，美国企业正在将其研发基地搬到中国或印度。而且，当真正受到我们欢迎时，中国的投资商和企业主也能在美国再造他们在中国的辉煌。

再一次要提到中国作为后起之秀的弱点了。中国企业只有万分之三对他们的核心技术拥有知识产

权。99%的中国公司没有专利，60%没有自己的品牌。

**变革之机** 中国决心消除这些弱点。它在科技领域的战略投资计划中列出了几十个今后有望发展成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领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其中许多目标都很有可能实现。

来看看现实中的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今年晚些时候，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最多的国家。不过，在我们美国创建并至今由我们控制的网络体系中，全球30%的网址是我们注册的——而中国只有2%。

**创新机制** 换种说法就是，在现有网络中，每个美国人由6个网址，而26个中国用户才能分享一个网址。

这种资源分配模式给予了中国极大的创新动力。

早在1994年，有人出于实用的考虑曾提出一种方法，将网址的数量扩展到无限大的水平。这种被称为网络协议（IPV6）的新体系从理论上说允许石阶上的每一台电子计算机都能通过互联网受到监控。在美国，IPV6还仅限于理论上的可行，而在中国及东北亚的其他地区，正在成为迅速确立的现实。

呈指数增长 到明年底，中国宽带用户的数量将达到美国的一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美国人将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及其他亚洲人已发展成为世界信息技术领头羊的水平。

酒店的调配、交通信号灯、电子公告牌、全球卫星导航装置、交警及出租车都通过联网指挥，以便将往返于奥运场馆间的客人快速送达。

未来怪客的天下 互联网也将控制所有的设施——从安保摄像机到照明及空调设备等一切设施——而且奥运赛事将在网络等系统现场直播。你会说，这简直太棒了。你或许已经知道互联网被称为“将来统治地球的怪客”。可如果这个怪客扎根中国又会怎样呢？

然而，中国正在设计和安装的网络系统其意义远不止于解决交通问题和调节建筑物的室温。

例如，它还将影响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公开——但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以及影响信息战的能力——至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会容易得多。

信息革命 然而，坦诚地说，这些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带来的巨大竞争优势可能会逐步消失，从而导致权力发生转移。

如今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信息革命的下一个

阶段将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担当领头羊。这就意味着他们，而不是美国人，将拥有和控制知识产权、驱动用的“杀手程序”以及不断改进的技术，我们要想赶上他们就得花钱购买他们的版权。

### 第三大挑战

自满是超越和创新的大敌。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就是骄傲自满的反面例证。在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正在进行中的一场角逐中，中国却在挑战其他亚洲国家乃至它自己。

对于我们显要地位的第三大挑战在于对全球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我们近年来的所作所为令世界对我们众叛亲离到了难以启齿的地步。

如今憎恨美国的外国人数量激增，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再尊重我们的传统价值观，而是由于他们认为我们在拒绝他们的友谊，或者说至少没有尊重他们。

对外影响 除了几个明显的瑕疵之外——就像我们国家和德国一样——中国已在各个领域取代美国成为人们最羡慕的国家，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连中国人自己都认为这种体制问题百出，亟待改革。

中国，一个曾经自绝于世界与外交的文明古国，已向国际社会开放——并成为最擅长外交的国

家之一。

强烈的观念 中国并没有那么热衷于争夺我们这个民族安全国家正在丧失的全球领导地位。

其他国家对中国趋之若鹜是为了填补权力真空，并平衡他们感受到的来自我们的威胁。

最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曾长期位居等级明确的国家体制之首的非西方国家，中国居然成为曾经纯粹是西方信条的国家主权平等和领土不可侵犯原则在国际上最坚决的捍卫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创建之初曾明确反对由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支配并建立的世界秩序。如今，它倒成长为这个秩序坚定的维护者，反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的反思和改造。

左还是右 作为美国人，我们对于国家主权、多边机构的权威及其法治有着新的看法，而中国却拾起了我们的老观念。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持续增强，我不敢保证华盛顿目前的激进主义会比北京的保守主义更占上风。

东风可能的确会压倒西风，但并非是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之中，它好似持续不断的和煦微风，使其回归到我们曾经拥护但如今又背弃的国际法准绳与国际礼让。

全球挑战 中国成功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它模仿了美国过去打开国门、求贤若渴的做法。而美国失去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闭关锁国、固步自封。

最终，我们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对我们构成的最大挑战实际上并非中美双边性的，其本质上是全球性的。

中国在财力和实力上的重新崛起促使我们反思，并重新发掘我们善良的天性，用合作代替单边主义，恢复追求卓越的美德、再度确认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如果能做到这些，我认为我们会好过得多——世界也会好过得多。

（《全球主义者》2008年8月29日，杨真译）

### 附文3 受害者还是获胜者？——中国的奥运历程

[美]兰·布鲁马（美国巴德学院教授）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且希望外国人也认同这一观点。外国的达官要人进到皇宫，只能作为朝觐“天子”的“封臣”。当然，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观念了。但是，中国人仍然十分在乎国家荣誉。“面子”仍然很重要。我用“面子”这个词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好词了。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及之前的一些活动对中国而言如此重要。

四川大地震展现了中国最好的一面，也让人们瞥见了其最不好的一面。缅甸政府在应对“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时出现了应受到人们谴责的失职行为。相比之下，中国当局最初虽有些举棋不定，但最终全力投入到与这场灾难的斗争中来。他们不仅允许日本、台湾、新加坡和俄罗斯的救援队进入灾区协助救援，还一改惯常做法，允许国内媒体对这次灾难进行全方位报道。这股未曾料及的舆论自由之风使得人们自发地与受灾群众团结在了一起。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受灾现场。

但如果不是临近奥运会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中国领导人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它，特别

是在平息西藏事件发生后。所以，中国看上去突然比以前好了一些。人们从一场导致5万多人（原文如此——编者）遇难的自然灾害中看到了获取更多自由的一线希望。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天似乎又有些变化。爱国主义在中国受到鼓励，但条件是它不得超越官方的控制。这些将对北京奥运会这个全球爱国主义大集会产生什么影响？

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和奥运会对对方都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是文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如大多数深受19世纪历史影响的政府一样，中国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社会：爱搞大型群众活动、举行国家庆典、推动民族主义情绪并搞国家大型工程建设。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以达尔文的民族斗争为信条，这种民族主义与时代严重脱节，而奥运会也是如此。

现代奥运会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是法国一位低阶贵族，深受法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巴黎人民起义的影响。在他看来，法国成了一个一蹶不振的国家，需要振兴，用他独特的话来说就是需要“重新铸造”。组织体育活动是实现这一目的最合适途径。顾拜旦如很多穿着艳丽上装的贵族一样，极其崇拜英国强调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的公立教育体制。他相信，体育活动可以



恢复国民健康，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法国。激烈的体育比赛会让世界各地人民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少进行反抗。战争将成为过去。现代奥运因此于1896年诞生，并诞生在雅典这个再合适不过的城市。

顾拜旦作为他所在时代的一名贵族，性格实际相对自由。他的爱国主义从不带有好斗性。遵照英国公立教育模式，他提出的奥运会口号是：重在参与而不是输赢。然而，19世纪的法国还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是厌恶自由人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犹太人。不过，他们的厌恶程度并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比顾拜旦稍微年轻一些的夏尔·莫拉斯，他是激进右翼运动法兰西行动的发起人。莫拉斯观看了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尽管他最初讨厌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世界主义特点的奥运会。但他的看法随着比赛的进行开始发生变化。他深信“当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了接触后，就会相互排斥，关系会逐渐疏远，尽管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交流。”

这个世界性聚会当然会成为“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欢乐战场”，这就论证了莫拉斯世界观的正确性。

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通常游走于顾拜旦和莫拉

斯的民族主义观之间。在正式场合，中国政府喜欢谈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和谐与和平，同时又不断宣传中国人因在历史上受到外国列强侵略而留下的创伤。当这种宣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失去控制时，不管这种活动有没有受到官方鼓动，这种民族创伤感都可能会转变成咄咄逼人的暴力活动。

中国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属于莫拉斯式而非顾拜旦式，出现这种民族主义是因为种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莫拉斯在1896年雅典奥运会上看到了，或者希望看到的是，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冲突。

中国的民族主义因为总是界定不清哪些人属于中国人而变得复杂。官方认为，中华文明遍及世界各地，从新加坡到阿姆斯特丹都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东南亚及大陆、台湾都在讲着不同的华语。很多美籍华人从种族的角度出发，认为他们像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一样，也是中国人。所以，当马友友，一个在巴黎出生的美国人1997年在香港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以庆祝香港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时，就加强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

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总带有政治色彩。四川大地震不仅激发了国内人民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热情，来自海外华人的捐款也大量流入中国。中国人不管

拥有哪国国籍，不在乎谁是统治者，总爱说热爱中国。这样看来，“中国”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

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现代的说法。在19世纪以前，很少有人从种族或民族的角度来定义一个国家。实际上，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把眼光放到他们所在地区之外的地方，甚或是他们所在村庄之外的地方。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自1644年满清统治开始后就被激发出来，他们因处于满族的统治之下而感到失去民族自尊。满族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19世纪的反清运动通常是汉人释放激愤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西方殖民大国，特别是英国，却正以他们先进很多的武器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不平等贸易条约。

当满族统治者在1912年被最终推翻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这里的“民族”指的是种族。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孙中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不过，他想强调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复国斗争的一部分。他曾写道，“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来自国外，而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严格来讲，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本人也受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等历史人物的影响。像多数种族民族主义一样，中国

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当德国的土地被拿破仑军队以自由、统一的名义占领时，德国的诗人、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以语言、血统和土地为基础的新民族主义。这种观点迎合了欧洲很多浪漫主义者。但它尤其迎合亚洲人，因为亚洲人觉得他们处于西方帝国的统治之下。

奥运会，如顾拜旦所设想的一样，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并不完全一致。如夏尔·莫拉斯一样，德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奥运会具有不健康的盎格鲁-撒克逊个人主义的特点。德国人喜欢健身运动和军事操练，尤其是大型的。很多美国人有德国血统，因此，美国19世纪末在体育方面也产生过分歧，有人偏爱英国公立学校里的团体运动，有人喜欢德国式的健身运动。前者最终获胜，但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后才获胜的。

体现革命英雄主义、战胜反动敌人的大型体育活动在朝鲜仍很常见，统治者更加倾向于这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强劲的民族主义之风并没有发生改变。即使在现在，也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国际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员是为国家事业征战的士兵。如果比

赛失败，不仅会让运动员本人感到沮丧，也会让国家蒙羞。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国，也不仅存在于专制国家。欧洲和南美洲的足球民族主义可能会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集体疯狂。

中国的领导人总需要用一种正统学说，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后毛泽东时代，官方一直用民族主义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国人还会定期进行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不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和毛主席语录。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和纪念馆，这些场馆一般都建在经历过黑暗历史的地方。

如同学校教科书、官方讲话和体育比赛中经常提到的所有爱国主义说教一样，它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过去的错误只有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力的展示和所有中国人重获自尊的方式才能得以纠正，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认为抗议北京奥运会也让他们蒙羞。因举办奥运会而产生民族自豪感，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各国也会出现。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奥运会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实现他们所期望的中国伟大复兴的一部分。要想获得民族自豪

感，首先要获得国际认可。因此，借此事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西方人不仅仅是做错了事，还成了试图阻止伟大中国崛起的敌人。支持外国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卖国贼。

把这些好斗行为归咎于中国政府只是说对了一半。这种集体不满情绪可能，也往往会转变成对政府本身的不满。叛逆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一般会指责中国政府在面对外国压力时没有进行坚决反抗。这就是统治者在允许公众发泄对外国列强的愤怒情绪时，不得不加倍小心的原因。这种愤怒情绪可能会突然转向统治者。最近20年，当人们认为政府对日态度软弱时几次差点发生这样的情况。

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通常与独裁政治相辅相成。当人们缺少发表不同意见、发泄内心挫败情绪、公开发表批评性言论、全民普遍参政的合法途径时，民族主义就会填补空白。只要领导人能控制住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就对他们有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就一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药。中国不太可能突然间和平过渡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民族主义不会消失。没有任何党会对其他大国，特别是日本和美国表现出软弱。中国在现代史上受到了太多的伤害，伤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愈合。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毒药，特别

是当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人们以受害者自居的情绪之上。从长期来讲，更加开放的政治参与应该可以缓解这种情绪。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2008年6月7日，冀琴  
伟译 谭卫兵校)

## 附文4 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不应惧怕的国家

[英]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英国前外交大臣）

冷战时期，当文化大革命制造愚蠢莽撞的混乱与破坏时，对中国很难有积极评价。展望世界的未来，曾经有人向我建议：“乐观者应当学俄语，悲观者学中文。”

现在回想起来，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开幕，中国展现出无限的自信与能量。

用奥运会来比喻新老强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斗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讲不是没有道理的。当运动员上台领取金牌时，人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

过去几年里，不断有人提起中国不同凡响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防务预算以及对中东和非洲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渴求。与此同时，巨额贸易顺差使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稍有变化就会给步履艰难的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因此，中国举足轻重。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用了多长时间将其政治经济潜力发挥出来以及我们有多大的承受力对显而易见的事物感到惊奇。中国



不仅以13亿人口(是美国总人口的四倍以上)成为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且始终有一点显而易见，即一旦挣脱有缺陷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它就会迅速成为一个购买力无可匹敌、出口额数字巨大的世界经济大国。但先别由此认为美国即将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加入前世界超级大国的行列，要正确地看待中国的成就。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基础薄弱。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在今天也只位居世界第四，不仅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其次，将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误导性，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今只有5300美元，而美国是45800美元。

再次，防务预算亦如此，据说中国增加军费在五角大楼引起了不安。据预测中国的防务预算到2010年将增加到880亿美元，然而美国的数字是4820亿美元。

中国的出类拔萃在于同俄罗斯相比，俄罗斯除了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之外没有什么可卖的东西，油气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4和政府收入的一半，这就使俄罗斯经济与其说与美国相近，不如说与利比亚相近。相比之下，中国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加工产品，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

俄罗斯。

因此，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最强大的长远竞争对手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正确地看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越来越自信，它会希望得到其他世界大国的平等对待。

美国人至少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不必担心的是中国会在全球力量竞争中取代美国成为金牌得主。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早在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就令全世界震惊地彻底改变美国奉行了1/4世纪的政策，承认中国是一个他们应当与之交往的国家。那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削弱苏联，同时认定中国的国家利益会超越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

如今，美国采取类似策略，它同印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使印度能够抗衡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超级大国。中国人对此不会感到舒服，但只要他们自己的政策不是在亚洲占据不受限制的主导地位，这对他们就不构成威胁。

印度不仅对小布什来说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伙伴，而且对奥巴马或麦凯恩来说亦然，因为新德里实行民主政体并尊重法治。相比之下，中国逐渐成为威权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终有一天不得不调和自由企业制度与拒绝给予自由的政治体制。

虽然有其它国家证明了两者可以共存若干年，但理由断定，假如中国不推行现代资本主义理应具备的公民个人自由和决策权下放，那中国就永远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

中国在过去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世界强国，事实上在那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英国甚至罗马与之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因为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是个例外，那段日子国内混乱、政府无能、国际地位低下。现在这一切已成过去，尽管还面临一些问题，但中国现在取得了它应有的位置，而这是有益的。

美国是太平洋大国也是大西洋大国，多年来它一直在期望出现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平稳过渡对中美两国都有利。例如，中国明白，假如它施加压力使美国撤出该地区并且不再保障日本和韩国的安全，那结果也许会促使这两个国家设法拥有核武器来保护自己免遭中国袭击。

利害关系十分重大，但中国人是谨慎的，也是富有创见的。即使这条龙醒来，美国人以及我们其他人要提防但可以放松心情。

（《每日电讯报》2008年8月7日，何金娥译）

## 附文5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务做出反应和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

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们也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面临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验。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

因为中国的经济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极其高昂，而且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

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

国很难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

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

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种主要原因。

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

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

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巨大的距离。在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

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来对之加以改造。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加以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在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额的费用。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足够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的人数也远远



不够。

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再多一些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联合早报》2008年7月8日）

## 附文6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看自己

[美]裴敏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美]戴维·蓝普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差距不容忽视

正如皮尤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民对国家发展满意度为世界最高。裴敏欣指出：“中国人普遍认为：第一，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好；第二，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正面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

然而，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则“可能负面超过正面”。裴敏欣总结了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所常常针对的问题。除了人权与民主这些“经常性”的批评“项目”以外，“近两三年，以前在国际形象上能够为中国得分的经济发展，也成为西方媒体抨击的讨象。一般的西方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造成了西方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从而感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此外，许多西方媒体把能源价格猛涨也归罪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也承担了很大责任；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援助活动，也在国外被认为是所谓的新“经济殖民主义”。

面对这种国内外的差距，蓝普顿则提供了另外

一个视角。他认为，对本国的国际形象的看法在国内外的差距，不为中国所独有，也不为当代中国所特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在过去也存在过这个问题。蓝普顿举例说，他在1976年来中国的时候，曾看到宾馆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标语。“那时候中苏反目成仇，虽然中美关系在逐渐改善，但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朋友远没有今天的多，更不用说‘遍天下’了。”

蓝普顿认为，一方面，我们不应把一些“利益集团”的声音等同于国际社会的声音，因为毕竟不满意的人群往往是叫得最响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一想，人们通常害怕什么？人们害怕他们不懂的事物，害怕变化太快的事情，害怕庞大的事物。”“而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出现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也是自然的。”然而，蓝普顿也认为，与对中国的恐惧心理的增长相比，中国实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显著得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做的很好了。中国要在未来做得更好。”

差距缘何而来

裴敏欣总结了决定一国对他国看法的三个主要因素：事实、价值与利益。“首先，这里面有一个事实问题：中国到底做了什么？第二就是价值问

题。在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在哪里？第三，是利益问题，即中国所做的事情对他国的利益有什么影响。”裴敏欣举印度为例，虽然印度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是它“经济的竞争者、意识形态的竞争者和地缘政治的竞争者”。因此，印度自然会对中国有负面的感觉。

国外看中国与中国国内的自我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首先，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这种差距的产生。“问题是双方的，”裴敏欣说，“一般来讲，任何国家的媒体，包括中国自己的媒体，都是带着批评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的——自己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特别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的问题非常敏感。而中国国内媒体没有充分报道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或者报喜不报忧。”蓝普顿也认为，“中国国内媒体很少出现对立的观点。”“对于外国书籍，也只是翻译出版对华友好的书籍，或删减掉不友好的部分。”

其次，蓝普顿还指出，普通中国人把他们的善良本意当作必然，并很难想象他们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裴敏欣说：“中国的一般公众都认为：我们中国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侵略活动；我们跟其他国家做生意，天经地义；我们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你不能把世界市场竞争结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都怪罪到中国头上；再有就是像争夺能源和排放大量二氧化碳，西方人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所以，在西方认为的中国起了负面作用的这些领域当中，中国的一般公众认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过错，并认为西方在使用双重标准，甚至有妒忌中国的心态。”

再次，蓝普顿指出，西方庞大的国防系统与官僚体系，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的悲观估计。美国的国防支出占全世界总支出的一半。这一庞大支出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而这一官僚系统中的官员每天的工作，便是寻找潜在的问题——哪里可能出差错？日益强大的中国自然逃不过这种寻找问题的眼光。

### 重视潜在危害

裴敏欣说：“这种差距存在的害处是比较间接的。现在从中国政府到中国人民都比较关注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办奥运，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只要有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普遍存在，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就面临着一个结构性障碍。”

同时，“负面印象可能转化成实际利益的损害。负面印象对那些主张对华强硬路线的政治人物是一种政治支持。”

“目前来讲，虽然中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大大提高但毕竟中国有求于世界大于世界有求于中国。对中国印象最不好的都在西方，而西方国家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公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可以为强硬派的政策提供一定的民意基础。”此外，西方对华的负面印象也可能为中国的对外投资造成障碍。

### 消除差距建议

蓝普顿说，中国已经在努力倾听世界的看法，现在能做的就是政治与外交领域，以更开放的心理来咨询他国的意见。当然，世界也应该更好地了解中国。此次奥运会期间，美国国家电视台除了转播赛事以外，也播放了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特色的小节目。这些都为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窗口。

裴敏欣建议，双方的媒体都要有所调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应该少一点，正面报道应该多一点。同时，中国自己本身的报道，也要报忧多一点，报喜少一点，公正的分析更多一点。那种用‘阴谋论’来自我解释的内容要更少一点”。此外，裴敏欣还建议提高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活动的透明度。“因为现在许多国外的负面报道都没有事实根据，中国自己又不出来主动纠正或反击，这样就

使许多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变成人家经常引用的所谓信息来源”。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2008年8月号）

## 附文7 由“挑战者”走向“协调”合作的多 元化中国外交视角

[日]天儿慧（日本早稻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所教授）

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国，对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和我国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这也可以转变成“中国是否会构成威胁”这样的问题。我过去曾经编辑过一本同名的著作，其中提出应该将国家所具有的“能力”“意图”以及“形象”三大因素作为衡量威胁的标准。能力是指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资源等；意图可以从目标和战略来衡量；形象虽然是指他人的看法，但直接对其产生影响的却是所谓的软实力。

曾经主张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的渡边利夫近年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却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一构想是“错误的”“无法实现的”，甚至是“不应该实现的”。其理由可以归结为：中国是东亚共同体的主角，“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主要背景因素是中国地区霸权主义。”虽然我与渡边交情甚厚，但是对于这样的断定着实还是有些惊讶。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正在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坦率地说，提出“中国地区霸权主义”这样的“威胁论”，是过于静态地看待了中国的这种巨



大变化，是简单、片面地看待了中国的能力、意图和形象。

的确，中国的崛起令人瞩目，看似一种威胁。2000年以来，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6%，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一举突破了3万亿美元。200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日本的1/4，而今已达到3/4。中国2007年的贸易总额为2.17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了1.5万亿美元。实际上，2006年公布的数据就已经超过了日本。中国的军费开支也大幅度上升，2007年约为562亿美元，而日本仅有428亿美元。中国的实力已经有了飞速的增长。政治家和智囊团的专家们满口谈论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具有风度的大国”，其“意图的增大”已经显而易见。

对于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这样的问题，我近年来的解释是：“中国经过了猛烈奔跑并接连追过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之后，现在身体状况已达到极限，很多部位疼痛不已，甚至开始出血，情况越来越严峻。从外表来看，虽然气势还在，但实际上更像一个需要护理的马拉松选手。”贫富差距、空气和水质等环境污染、拜金主义的腐败行为、脆弱的社会基础设施等，已是广为人知。这些已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副作用”问题，而且正在变成国际性

的问题。

以黄尘和酸雨为代表的跨境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卫生问题、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的“西藏骚乱事件”等，都对“崛起的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5月12日还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四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本应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次盛会，然而，在此之前，“中国选手”却出现了腰痛和出血。在接近终点的时候，已必须稍作停顿或者降低速度接受护理。面对沿途伸出手来的国内和国际的援助，“中国选手”该作何打算呢？或许，将奥运会的定位从“展现中华民族的雄风和伟大”转变为“由大众参与、与国际社会合作，对受伤的中国进行鼓励和帮助，体现全民族的支援和世界友谊”的一次盛会，更能体现“泱泱大国——中国”的气度。带着这样的想法，下面我们将讨论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

### 面向新的国际秩序的战略

过去中国把自己界定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认为自己是“对世界产生影响的负责任的大国”。2003年11月，作为中国外交智囊成员的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提法。可以说，

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和平实现“权力交接”的信号。

虽然中国提出这种秩序构想，在主观上是极为慎重的，但却引起了亚洲及美国的警惕。例如，郑必坚提出的“和平崛起”论被国际上认为是中国希望积极推进国际秩序的变化，中国被视为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在国际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和警惕。中国政府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即在正式场合放弃使用“和平崛起”的提法。中国转而再次采用以前邓小平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提法。

2005年12月，东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这是历史上亚洲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聚会。虽然此次会议的议题是东亚共同体问题，但从会议一开始，中国和日本就在参加国的范围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中国提出应该由东盟10+日中韩组成，日本则主张在此基础上加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结果，虽然此后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同时举行东盟首脑扩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和东亚峰会一事被确定下来，但是中国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兴趣大减。一直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2007年秋季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与中国接壤的不仅

限于东亚，而且也包括中亚和南亚。我们要实现的不仅是东亚的合作，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各种各样的合作和发展战略。”

在社会方面更加依赖国际社会

近年来，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在国内实现“和谐社会”。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闭幕后不久，进入第二任期的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就对今后的形势做了不太乐观的预测。温总理说：“我脑子里在盘旋四件事情：第一，要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他坦率地承认在控制物价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老百姓对物价的实际感受更为强烈，并且越来越感到不满。一位就职于北京市内中小企业的妇女反映说：“超市猪肉的价格已经是去年的两倍。食品是非买不可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实在是艰苦。”她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大。

更为严峻的是空气、水质、土壤的污染以及水和能源的短缺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5年中国付出了很大的资源 and 环境代价，这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副作用。目前，各地出现了许多群众因此受害的事件。上海、厦门等发达城市的居民为了阻止政府实施的有可能破坏生

活环境的项目，甚至采取了示威游行等抗议行动。

然而，中国已无法停止经济的增长。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解决各项难题，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现在光叫喊口号已经沒有用，如果不尽快采取对策，就有可能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事实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3月14日曾公布过一项统计数据，其中提到1995年以来发生的要求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等劳动纠纷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07年达到了40.6万起。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外国的积极合作和援助。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胡锦涛主席5月8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坦率地提到了中国面临的难题，他要求国际社会与中国一道采取协调行动，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习日本的经验，相互开展合作。

此后的5月12日中国发生了四川大地震。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房屋、学校、道路、桥梁和大堤等都没有采取防震措施，由此可见中国的基础设施是极为脆弱的。中国的危机管理也较为落后，帐篷、毛毯、粮食、医疗等供应不能及时到位，与国际援助队的合作也出现了很多的差错。在地震报道中，广大内陆农村的贫困状况通过电视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展现的是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风貌，那么四川大地震则暴露出

了中国社会极为脆弱的一面。

我在1976年7月首次访问了中国沈阳，当时拥有80万人口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发生后，所有的信息都被封锁了，就连每天早晨在宾馆能够看到的《人民日报》也不见了。当然，人们对震源地的受灾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在几天后，当我前往沈阳机场准备前往上海时，才隐约感觉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震。机场内医疗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知唐山地震死亡人数为24万人，包括受伤者和财产损失在内，说唐山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不为过。然而，中国却没有接受国外的援助，通过封锁信息来维护国家的体制，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做法。

与那时相比，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不仅中国媒体到达了现场，而且世界各国的媒体也都进入现场详细报道了灾情。有关核设施的一些信息也暴露了出来。尽管中国在决策和军事等方面依然不公开，不过，与唐山大地震时以及遭遇了热带风暴灾害的缅甸相比，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了。中国积极地接受世界各国、国际机构和团体提供的大规模的合作和援助，甚至还认真地考虑过让日本自卫队也参加救援物资的运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方面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而

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也在日趋深化。国内的民众积极加入到了抗震救灾和重建的行列，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国家的活动。

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地区今后将不得不在社会复兴、福利、医疗等方面接受国内外的援助，这些都将会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当中。在经历了四川大地震之后，显示“伟大中国”和“泱泱大国”的北京奥运会也将不得不宣传与国际社会的联手合作。驻北京的国际媒体在报道体育赛事的同时，也会积极地报道中国国内的各种话题。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开放，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将会进一步加深。预计中国将会更加强调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会越来越减弱。

当然，市民和青年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性过激行为和言论也决不会减少。党内的保守派势力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可以想象，政府有时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采取非国际协调的做法。2005年春季爆发的大规模的反日行动和今年春季世界各地发生的留学生保护圣火行动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 重视软实力

与强调民族主义、对外强硬路线、现实外交、重视硬实力的传统做法相比，近年国际上开始流行软实力的做法，它强调的是国际主义、对外协调路

线和开明的外交。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中国外交奉行的是比较单纯的现实主义政策，体现为“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已不再基于这种单纯的想法。

胡锦涛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重申了“和平发展”和“和谐社会”的路线。很多人开始议论“和平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战略是与中国行使“软实力”是否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是否是中国的长期外交战略？2007年12月28日发表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今后我们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本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各地积极推进“孔子学院”的创立，这也是中国全面推进“软实力”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2007年12月11日，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说：“目前，已在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10所



孔子学院。此外，还有61个国家的200多个机构提出了开办申请。孔子学院已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今后，预计中国将在经济援助、历史文化、汉语普及、和平合作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行软实力战略。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开始轻视硬实力外交战略，这是一种误解。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依然坚持强硬的态度。西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对于分裂和独立的倾向，中国政府会坚决采取果断的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主权和面子问题上，中国是决不会做出让步的，积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可以看成是中国当局的外交姿态。

在这一点上，今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呼吁两岸实现“三通”和共同市场，共同掀开和平与繁荣的历史新的一页。对此，北京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不远的未来，两岸首脑会谈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当然，马英九在“总统”选举一开始就表明了两岸关系“不统、不独、不战”的“三不”政策，而且，台湾的新一代人已经形成了“新台湾人意识”，中台将不会轻易地实现统一。如何

应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使其产生微妙的效果，这要看今后形势的发展。

### 有关国际秩序的根本性问题

不管是使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崛起的中国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搞清楚何谓“国际秩序”。在这一点上，近年议论较多的是所谓传统的中华秩序论。它与今天西方的公民国家体制的秩序论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归纳起来，其特征有两点。一是结构上表现为圆锥形或同心圆形，是一种权威扩散型的等级秩序。创造出权威等级的是文化的修养程度。当然，最具修养的人物是天子(皇帝)，其次是中央的官僚、地方官僚、官僚预备役(读书人和地方名士等)、普通汉人(到此为止是“华”)，还有在周边没有享受到中华文化的野蛮的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这种多重文化结构称为“华夷秩序”。这里没有像西欧那样的国境概念，天子的统治范围被无限扩大到整个天下。

第二个特点是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非法制性和主体的多重性。有关建立秩序的儒教的名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家、国家(地方)、世界被看成是多重的，建立秩序不是依靠法律制度，而是修养和教化。天子

的理想统治不是采用武力统治的霸道，而是文化的教化和德仁统治，即王道政治。

这种中华秩序论的确不同于西欧的秩序论，其中一些内容值得研究。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其价值标准建立在儒教的价值观之上，而且带有浓厚的重视上下级关系的权威主义的思维。当然，“华”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曾出现过像元朝和清朝那样由蒙古族和满族掌权成为“华”的例子。日本史学家就此提出了“华夷变态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建立现代公民国家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但不久开始推行大东亚主义，力图建立东亚共同体。日本以己为盟主，视己为具有优秀文化的为政者(等同于“华”)，并基于“一视同仁”的儒教观来试图统治东亚，这是所谓的日本版“中华秩序论”。当然，目前正在形成的亚洲秩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所指出的那样：“东亚正在形成的地区合作或者地区共同体，既不是回归19世纪以前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所力争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圈’。”

问题在于中国人无意中表现出的骨子里的“华夷思想”。过去，我曾作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走访了中国各地，当我要求见地方领导时，

对方会指出：“像你这种身份的人通常是见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的。”权威等级的思想现在仍很有市场。如果把这种思想推广到国际社会，就会产生“强大的中国”俯视周边的盛气凌人的权威关系。不过，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主体也在不断地变化。

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条件

那么，崛起的中国怎样才能被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接受呢？

首先，中国本身，还有外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中国唯有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会更加密切。

其次，中国应该学会客观看待自己，应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大国化”与“国际协调”是处于表里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在今后的时代，即使中国变成了大国，那也不会是“综合性的超级大国”，未来的大国将表现为各有所长的趋势，有的大国在这个领域比较突出，而另外的大国则在别的领域具有优势。从这一点来说，大国之间是有可能进行相互间的合作并达到共振效果的。

第三，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关键，不是当局在问题、事件和矛盾爆发时采取“隐瞒”的做法，而是“公开”事实的真相，在解决问题时，即使耗费时间，也要做到让人能够接受。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和卫生食品等所有的问题上，都应该这么做。不管口头上如何高喊“以民为本”，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最终还是难以取信于民的。

第四，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等增进互信，共同拥有广泛意义上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实际上这当中包含着政治的民主。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发出过“建设亚洲共同的家园”的呼声。这意味着要在人和民族尊严的基础上，在亚洲创造新的认同感。当我们从深层次来展望时代的大潮时，这无疑是一项极其困难、需要耐力的工作，不过，即便如此，我对此仍充满信心。

（《论座》月刊2008年8月号，张海波译）

###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 塑伟大之目标

德高望重的先贤看到美国人地毯式轰炸别国，流露出的怅然若失：怎么不给中国也来这么一下啊？这种心态，不能不说恐怖！

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

#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王小东

媒体精英为什么这样卑贱

我们时代的病相很多，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精英腐朽对于我们国家凝聚力的巨大损害；另一个问题是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知识分子精英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有时候达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一些大学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等，像发疯一样仇视我们自己的国家。当然他们是有一些理由的，历史的，现实的。但是有一些理由也不能就此认为发疯就是对的，发疯是病，病就是病。也许你的疯病有理由，是别人害的，比如说让人踹了一脚，或脑袋让人打了一闷棍了，脑子出毛病了，但是脑子出毛病，你别认定你没病，还照样出来祸害吧？这种“时代精神”的病理性表现，可以说有无数的例子，先举一个艾滋女的例子。

这个故事已是2004年夏天的事了。武汉某大学女学生朱力亚被她的巴哈马籍留学生男友马浪感染上了艾滋病。这个外国人在被检查出艾滋病而被遣送回国之前，仍旧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而跟她发生了性关系。当她得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时，那个外国人已离开中国，不知死活了。最后是他所在国的驻

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找到朱力亚告诉她实情的，从此朱力亚失去了一个正常女孩应有的正常生活。另外还要交待一句的是，这个外国人还和多名中国女孩发生过性关系，让多名中国女孩感染上了艾滋病。

故事如果仅仅到此，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个人的悲剧，我们可以很同情受害者朱力亚，问题是，后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大规模介入了。中央电视台王志的《面对面》节目花了两期来访谈朱力亚，《南方人物周刊》等主流媒体也做了大规模报道，一些专家学者也粉墨登场，热评此事。他们是怎样向观众和读者解读这件事的呢？照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的想法：首先，应该警告花季少女们注意防止艾滋病；其次，应该严厉谴责这个明知自己有艾滋病却故意传染给中国女孩的外国“杀人犯”；再次，应该问一问，我们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好像是有法律惩治明知自己有艾滋病而故意传染别人的罪犯的，为什么对于这个外国人只是遣送而已？像我这种“爱商”很低的人，怎么也看不出这个明知自己有艾滋病却连个套都不愿意戴，就和朱力亚发生性关系（我认为实在没法说这叫“做爱”）的外国人和她之间有什么“爱情”可言。当然了，也许朱力亚这边是有“爱情”的，但在知道了那个外国流氓如此残害她的生命之后，还



在那里“爱”得如此炫然，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是一种病态，一种人格扭曲。然而我们的媒体的大部分采访和炒作的内容却是关于朱力亚和马浪之间的“爱情”。司马平邦在自己的博客中非常准确地指出，这是“中国媒体的集体性诲淫诲盗”，他的这篇博文写得很精彩，我引用在此：

朱说，虽然马浪给她带来了艾滋病，让她即将过早地离开人世，但她仍然爱着这个巴哈巴帅小伙，而中国的媒体们，则抬着这个爱情至上的女孩的轿子，高声赞美着这个好不容易发现的“艾滋爱情”。间中，还有一些朱力亚对中国现状的抱怨，抱怨什么呢？社会因为她大胆公开了自己的艾滋女身份而不再那么自在地接受她，她不能入党了，还假设如果在美国，一定不会这样，美国多好啊！艾滋病患者可以享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也不知中国的媒体们怎么了。不，首先是中国的姑娘们怎么了？爱一个给自己带来艾滋病的外国人，而且这个外国人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没有在两人的性关系中采取保护措施，这种良知沦丧的无耻之徒居然得到了一位中国大学的女高才生（朱的外语水平很高，让她得以被马浪泡上）如此执著和不要命的爱，中国女孩的爱情居然这样廉价，我看到在马浪消失后，朱力亚还在念念

不忘地想着马浪的好，还在单相思一样地说只爱这个男人，没有一点儿恨，而我亦听说，就是这个巴哈马浪子已经给6个朱力亚这样的女孩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把对一个恶棍中了心魔一样的迷恋当成“爱”来粉饰，让我相信《色·戒》在中国人群里确实大有人缘，张爱玲说征服女人最好的办法通过阴道，我不知朱力亚是不是受到这样的蛊惑，而且似乎也不应以这样阴暗语句的形容来讲一个女人，但这个朱力亚确实让我想到了汤唯出演的王佳芝。我对王佳芝的概括只有一个字：贱。疯了一样爱一个恶棍，因而被生活抛弃，你不要再去找什么别的原因，你得到的一切可怕后果都是活该的。阿弥陀佛，但我佛慈悲亦惩恶啊！

其次，中国媒体们怎么了？无论是XXTV，还是《N方人物周刊》（又是南方系），把一个公共新闻媒体的社会良知降低到一个如此地步，把一个带着明显犯罪色彩的社会事件包装成另一个浪漫色彩的人性故事来讲述，这就是蒙骗大众，我耐心地看完网上的相关采访，既没看到记者对朱力亚经历的如此荒谬弱智爱情的质问，也没有对观众、读者的提醒，他们似乎真的被这样一个如美丽的大烟花一样美丽（其实如邪恶的海洛因一样邪恶）的故事所

征服了。滥情至此，让人恶心！媒体是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谁让朱力亚感染了艾滋病？马浪是否相当于杀人凶手？凶手是不是要缉拿归案以命抵命？这是不是一件杀人案？如果被害人说“我爱这个凶手”，法律部门就该放弃诉讼的权力？而新闻媒体就要不遗余力地去把这件杀人案描写成当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不知道中国法律对有意向别人传染艾滋病或者其他传染病有什么样的定罪法则，但我相信，这样的人肯定是在犯罪，而我更认为那些身受其害却不自觉，反而绘声绘色把这桩罪案包装，讲给别人的“受害者”也一样有罪，而让这样的罪犯再去误导不知情者的传播者（媒体）也一样有罪，罪同窝藏案犯。我对朱力亚顽强的生命力和固执的爱情观不得不表示佩服，但对她的糊涂（是糊涂吗？我也可以把她的这种炫耀式爱情当成变态的报复社会和协同杀人）更表示愤怒，同时，亦对卷入此事件报道中无病呻吟过的中国媒体表示极大的鄙视！你们知道这样的报道又会让多少无知女孩重走朱力亚之路吗？

再次，中国的法律怎么了？到现在，我还没发现相关法律部门介入此事（朱肯定是没有提起对巴哈马混蛋的诉讼，但作为公共部分存在的中国法律部门应有主张权力的机会）的记录。很遗憾！巴哈

马，一个弹丸小国的一个在中国领土上散播艾滋病毒王八蛋公民的所作所为与当年日本鬼子在哈尔滨平房区制造细菌武器有什么区别吗？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就可以放过这样一个罪犯？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到底还要享受多长时间这样的特权——泡中国女人？！这件事让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国家对外籍公民在中国领土上享受到的那些太多的优惠政策。中国人当中或者有一些命贱如斯的女人，难道中国法律的尊严也贱到这样，可以随意践踏？

我很难过地看到，当一个中国女演员因为出演一部为汉奸唱人性赞美诗的电影被封杀后，一群无聊的北京法律工作者矫情非常地跳出来想替之出头，却看不到一个向中国公民身上传染了艾滋病毒之后溜之大吉的小国恶棍，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会向他发出任何一声愤怒，倒是由我们的国家电视渠道向这个恶棍隔江唱起后庭花！我想，这个中文名叫马浪的艾滋病毒王八蛋最后也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必死无疑，但我很怀疑这个人临死之前是不是真的很痛苦，因为按一个纯粹恶棍的逻辑，他的几年中国之行真的很够本，不但玩了中国女人，也“强奸”了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并且被他“强奸”的对象们还不停地乞求着，再“强

奸”我们一次吧！这是我们经历最爽的、最人性的“强奸”了，这就是爱啊！

我几年前就看到了这个艾滋女生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痛感到一个“贱”字，太贱了！中国的女孩怎么会这么贱？中国的媒体怎么会这么贱？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这么贱？中国到底怎么了？我真正痛感，崇洋媚外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崇洋媚外可以杀人，崇洋媚外正在把更多无知的中国花季少女送上患上了艾滋病的外国流氓肮脏的床，崇洋媚外可以是血淋淋的！朱力亚，这个被媒体和无数网民追捧的不幸女人既是被害者，又在诱杀别的和她相仿的女孩子。司马平邦先生质疑得对：“是糊涂吗？我也可以把她的这种炫耀式爱情当成变态的报复社会和协同杀人。”这是一件不小的事，但我当时实在太忙了，有那么多事情做不过来，实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因此以前也只做过一个简短的发言，没有深入做下去。我跟司马平邦提到了这件事，希望他能够做一做，后来他做了。但2008年中国的事情太多了，2008年世界的事情也太多了，还是把这件事淹没了，然而这件事绝不应该被忽略过去。听说最近又有几位女大学生步了朱力亚的后尘，被外国人感染了艾滋病，年轻的生命就此葬送。我感到前几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

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再提出来说一说。

装蒜的逆向种族主义还要猖獗多久

另外还有一个外嫁女的例子。这个外嫁女网名叫“玉清心”，写了一篇题为《德国人“刻板”背后的诚信和善良》的帖子，我引用其中的一段：

德国人的刻板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刻板地恪守法律和秩序。干什么都十分认真，凡是有明文规定的，大都会自觉遵守；凡是明确禁止的，大概没人会去碰它。常说德国人的一个笑话：在德国的马路上，如果红绿灯失灵了，行人会在马路上一直等下去，等修好了再过马路。

从网上看到，美国人买软件，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就花钱买两个软件。我问周围的德国人，你们也是吗？他们回答：“是啊，你们不是吗？”几年前为适应宽带网络运行，家里更新了一台新电脑，同时花了100欧元买了软件（windows XP）。得知我买了正版的软件盘，周围的中国人都来借，借来借去最后借没了。后来自己的电脑被病毒袭垮，需要重新安装运行程序的时候，只得厚着脸皮向熟人借盘。中国人的圈子里，告诉我手里倒是有，还有普通和专业两种版本，但都是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10元人民币从小贩那买来的，肯定是盗版盘，所以保不齐有病毒或什么其他毛病。再花

上100欧元去买安装盘有点冤枉，又不敢向认识的德国人张口，知道十有八九会遭回绝。先生说，试试吧，跟孩子借借看。我听他在电话里讲我的“过失”，解释借东西的原因。撂下电话后，先生告诉我，不行！儿子说，一份软件就配一台电脑来的，这是消费原则。最后遇到一位电脑高手，帮我清除了病毒，恢复了运行，才算暂时免了软件盘的麻烦。当时我的这个难题在电话里说给了大陆的亲朋，后来居然成了笑柄，电话那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笑话这边的德国人的，认为德国佬刻板得有点儿不通人情了，算傻到家了。

这个帖子明显是胡编乱造。可以看得出，她对于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就敢胡说八道忽悠人，真叫人恶心。我只说两点。其一，一群德国交通信号专家在中德两国专家参加的会议上说过：德国行人等候红灯的时间不能超过47秒，否则一定抢行。他们认为中国的红灯时间太长了，谁都受不了，所以行人抢行很正常，实际上恰恰是中国的行人太老实了，才能等这么长时间。其二，买正版windows XP，只要有证书，盘丢失了是可以再去微软讨要的。再有，既然是正版windows XP，现在都需要激活，别人借去是用不了的，（可以算号破解，但也就相当于一个盗版盘了，盗版盘这么便宜，谁会

去借她的？)不像盗版盘，是破解了的，所以谁借去都可以用。文章作者连这个都不知道，应该是从未用过正版软件的（预装的另说，但绝不可能是花了什么100欧元买的，而且预装盘别人借去也没用），又缺乏知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德国店家卖给她的就是破解了的盗版盘，所以谁借去都可以用，而她被骗了。我没有资格评论德国人究竟是不是诚信和善良，但这篇文章我能看出来胡说八道的部分，使得我对于她所有的话都很难相信。这个女人在这里装什么蒜啊！编这种胡言乱语出来骗人，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可惜的是，网上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关于外国是“君子国”的所谓“纪实”观感，而很多中国人还真相信这些鬼话。我当然知道中国的不诚信现象很多，但我以为，这种丑恶的逆向种族主义忽悠绝不能帮我们改掉自己的毛病，恰恰相反，它让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既然是下贱的一群，就一直下贱下去好了。

我写了个帖子，讲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第三步兵师第一旅调回美国本土，这是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在本土部署作战部队。根据美国《陆军时报》的报道，这次军队调换的任务之一是防止国内老百姓发生骚乱，当然还得说点其他任务，如反恐之类。但是美国老百姓普遍认为这是镇压老百姓的，舆论



哗然。有人说拿起枪跟他们干，有人说我要跑到山洞里面，反正你们逮不到拉登，也逮不到我。其实我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我倒觉得美国老百姓挺可爱的，他们对国家强权保持这么高的警惕的确是一个优点。也许可能在国家要集中做一些事的时候，这种警惕可能有一点掣肘的妨碍，但对于这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我是挺尊敬的。我贴了这么一个帖子，一点没有嘲笑美国人的意思，可马上就有人蹿上来了，他贴了一个不相干的东西，讲英国伦敦奥运会比北京奥运会怎么好法，说伦敦奥运会把钱都花在大众健身上面了，说北京弄的都是虚假的。这个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跟我的主帖有关系吗？为什么上来贴这个帖子呢？他是觉得你说了美国坏话了，我一定给你找回来，人家就是好。美国做什么东西都是对的，美国就是太伟大了，不管怎样美国还是太伟大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某种程度讲，这些例子表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处于危险当中。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说老百姓跟这群知识分子不一样，80后跟他们不一样。我也看到了一方面老百姓跟他们不一样，80后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很容易受这些人左右的，受权威、老师左右的。

我曾经想写篇关于“洋奴和家奴都是奴”的文章，针砭一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奴性心态。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想当家奴了，他们认为家里的主子都是坏蛋，“文革”什么的伤透了他们的心。可是他们当惯了奴隶，非得另外找一个主子不行，于是又找到洋主子了。他们还真不像美国人，如前所述，美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洋奴家奴都不当，这点我很尊敬美国人民。但是中国这帮知识分子非得当奴不可，不当家奴就当洋奴，现在是选择了当洋奴，这对中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他们远比美国人民更忠于美国强权。美国强权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帮中国知识分子更忠于它的人群了。从国际格局的角度说，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是美国的长处。我们讲中美比较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在软力量上比中国强太多了。我非常羡慕美国能有这么多效忠它的中国精英。从根本上讲，这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心态，他们得要一个主子，对家里人，对中国主子失望以后，就非得找一个洋主子。为了自己心安理得，他们把美国洋主子理想化了。如果你说他们的洋主子一个“不”字，他就要跟你玩命。其实很多话不是我们说的，是美国人自己说的，我只不过是贴到了自己的博客里，那他都不干了，他要跟我玩命：谁让你贴的？看着他们对

美国洋主子忠心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是非常钦佩美国，时至21世纪了，美国竟然还能找到这样一帮奴才，这么死心塌地的一帮奴才。

##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宋强

小东、纪苏这些人，可以说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20多年，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题目定在“心理性悲剧”。从日常感受和媒体人的角度，从一个比较低端的落点，讲一讲堕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学是怎样在我们国土上扎根的。这些想法跟我的经历、见识也有关系。

“歹徒与大巴的故事” 别解

我觉着，一切对于时局、前途最高深的问题先不忙着复杂化。不妨用最寻常的成功学道理和励志小书的思维路径，从平衡损益的角度来剖析某种日常性情绪的弊病，这可能对改变我们“无着”的、空落的现状有一些实在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剧就是狂躁型的愤懑不合作主义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据说，还有人把“论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纳入学校课本里去，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扯淡。早几年我采访中国著名神童张炘炀的父亲，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心得是不要让孩子看那种“Q版语文”的时髦读物，什么大灰狼其实很有爱心，小白兔其实最不是东西。正说的知识他都没有理解透，你上来就给他灌输反着来的、对立的、粗犷的、“解构”的，你不是对孩子不负责吗？

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Q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

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

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

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

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

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

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

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性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本土愤懑热情也难免，但是像南方报业这样长期一以贯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帜鲜明，永远传承，也是难得的风骨。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现实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质问我的——（西方）羞辱了谁？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这种对撞，王小东就活生生领教过。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对“抵制家乐福”做了一个话题pk。一个海归艺术家跳起来大

骂：“你这是讨政府的好！你们就敢抵制家乐福，别的你们敢抵制吗？”他最为精彩的一句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国是强势，你爱国是站在强势一边，作为知识分子，你爱国是你的耻辱！”且不说谁讨了政府的好。这种表演就是简单粗暴，愚不可及的简单粗暴。

这种不求上进的简单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对答：

“为什么西藏人大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独人士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中国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爱国真是“强势”吗？至少在媒体的把持者那里，在“高等华人”的裁判下，是强势吗？王小东和那位海归艺术家的对决，后来两人都在博客上有说辞，然而，新浪博客的编排是扬抑分明的，指控王小东的文章摆放在显眼位置上，而王小东的反击文章被摁在角落里，到后来看到没有扭转海归的不利局面，干脆把王小东的文章从首页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对民族主义的海归一人在显眼位置。这种拙劣的“拉偏架”，宋晓军看不下去了，打了电话给新浪博客，告诫他们不要太过分，版面编辑这才不情愿地改正过来。

回到开始用的那个列车的比喻，黄纪苏讲到的一种感觉是非常对的，我们游走在一种惯性之中，还在像祥林嫂那样说“伤痕”，还在说“解放束缚”，是不是该说点别的？

这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记忆的悲剧导致历史观的自我矮化，这个“功德”，该归功于谁呢？

### 三、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宋强

谁在消解我们的“共识底线”

比起“脑残”的詈骂，比起某些网络编辑，大报在清算民族认同情绪方面自然要高明得多。可是在这里我想泼一瓢冷水：那些急于想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里占据一个牌位的先生们，能不能不那么性急，能不能少考虑一下“得分”，而多想一下“得道”。像贺卫方先生所点明的，少贩一些私货。功利心太盛容易露尾巴，排排坐，吃果果，你按照自己的口味遴选的“公共知识分子”，究竟能不能进入先贤祠，尚在未定之数。你不高兴的人，装着没看见；你高兴的人，慷慨上位，这就错了一着。你给未来中国预备的自由民主先贤的谱系，起码是有毛病的，打一派拉一派，算什么自由的精神呢？不妨反省一下，为什么某些好话，漂亮话，某些高调，从《南方周末》道出，会激起不忿，引发讪笑，可能受了一些委屈，可你不能总指责批评你的人都是在仗势欺人。你要试着去理解人家，因为人家心目中，你的品质是可疑的；你的游走路线是怪诞的；你在“得道”方面，是欠缺的。有了这些遭遇，至少说明你做得不够好。杨帆最近说：我的



批判态度，明摆了说就是“对事也对人”。这话确实挺实在。信息膨胀、花样翻出的时代，大家看腻了一些表演，不知为什么觉得不恳切，感觉空落，研究一下你的来路，剖析一下是否伪善，挺正常。对事对人，《儒林外史》就是这么搞的，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20多年前，吴亮、程德培到我们学校搞讲座，没有太多高深理论，讲了很多作家的个人细节，听众有些不能满足，觉得有点庸俗化，记得吴亮还当场做了一些解释，解释说我们熟悉这些作家，不是架秧子摆资历，而是一种分析。我觉得他们那种新批评其实不低级。当然，当年的他们是一团和气的“对事对人”，和今天我们主张的有区别。

现在看来，对某些利令智昏的自由知识分子，对事也对人，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真相。已经在民间听到这样的说法了：谁谁谁很牛逼，被美国人关注着，他太有名了，弄他，中国方面得掂量掂量。口气是很羡慕的，给人感觉，原来荣华富贵还有一个进身途径。这种感觉我并不陌生，朋友说过一些事，亲历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表出来，也没有作为批评谁的论据，就是考虑到要讲求辩论道德，不能把人家私下不希望众人知道的话拿来作为依据。但是有这种黑幕黑话，（现在也不是了，公开

说出来了，讴歌美国大兵的赞美诗，中国知识分子“联名”声援美国打伊拉克，不都是这一类货色吗？）有这种真实性情绪，要让大家知道，比如说这一类的吹牛：中国照着西方要求的路径改革，是逼出来的，不然要面临“外科式打击”的风险。还有德高望重的先贤看到美国人地毯式轰炸别国，流露出的怅然若失：怎么不给中国也来这么一下啊？

这种心态，不能不说恐怖！

对事对人，当然不是揭隐私。薪火传承，一码儿下来，你的观点都散播在公众记忆里，你的一贯情绪都在你的纸面上（不说什么“纸背”了吧）。美国经济出了大问题，当年国内忽悠得特别厉害的很多时髦人物在那里装聋作哑了。好像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批评他们的人做得挺厚道，没有人拿昨天的材料来折磨人。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笑话。三四年前，一家人物周刊来访谈，记者拿“说不”里的预言来揶揄我们：“看，这么些年，美国没有出大问题，你们有什么反思没有？”采访登出来，说是我说的，“至少美国在我心目中倒掉了”。哎呀，这话确实有点那个，又无赖又蛮横。好多人来问，我到处解释赔情。其实美国“出大问题”的具体分析也不是我做的，具体的时间表更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及，别人做了，也允许别人调整

吧？“美国何处去？”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回到正题，在国际政治这么险恶的当口，南方报业的“拉偏仗”表演，还不够好瞧的吗？西藏骚乱，圣火传递，法国作怪，还有地震与释迦牟尼，在这一系列话题面前，南方报业总是表现得这么阴阳怪气。这种阴阳怪气，有人还觉得费解，我说其实一点也不费解。老百姓说的：“就你最能！”“一撅腚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误读了他们吗？可能对具体的作者来说，不能太深纳，但对这个轮盘来说，要“点一面一点”的看。一个电视台的老总对我说：南方报业想干什么？你看，总有人帮他们圆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看他们就是那个意思！有意思的“意思”多了，再看不出来“意思”，实在是太辜负他们的一片丹心了！

所以，人们一旦看到《南方周末》居然也能批达赖，就感觉怪异。再一细品，哦，原来有另外一个腹稿，是在寒碜我们自己的事儿呢！大家都在失笑之余，叹这思路妙。《南方周末》历来乐于抒发对内政的愤懑，矢志不渝，可是，因为有人批了达赖，你就一定要从别的地方找回来，是不是有些太“搞”呢？

拷问《南方周末》：心术过盛的“事大主义”

前一时期，清华大学的周庆安，因为人家在“张丹红事件”上说了几句话，说西方媒体也有阴暗面。《南方周末》大义凛然，忘了是抓住个什么逻辑欠严密，批周博士“孤证走遍天下”。是，人家“孤证走遍天下”，就你最圣明！只要是寒碜中国人的，你拿来运斤的岂止是“孤证”，说得不好听，有的那就是无证乱点卯啊。什么历史不历史，“历史”在他们这帮精英这里就是一种情绪道具。事实真相服从于心理真相。早些年，“南周”一篇很轰动的文章《史学家的风骨》，搞了一个考证，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上海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根据意识形态需要编造出来的。“考证”一番后，用很克制很婉约的口吻来教训人，那口气分明是说——啊呀，我终于揭露了一个惊世大骗局，但我还是愿意饶让三分：编造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妖魔化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大不该啊。这篇东西抛出来了，大概很是得意洋洋，那个时代的言论时髦，就是一个孤证推翻一个时代遗产；可是殊不知有人偏偏不服，查了一些旧书，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方志敏，还有不少的洋人，都提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莫非，这些故人都预先知道新中国要搞这个虚假展览，无端编造别人侮辱你、损害你的历史，

穿过时间隧道来为假证凑趣？反驳的文章处境很寂寞，因为是一家小报，阵容也不豪华，由你自生自灭去，谁叫你掉书袋。《南方周末》也不曾做点补救。这也不奇怪，补救就糟了，就是不讲“风骨”了，太不符合“政治正确性”了。近亲繁殖，不知不觉形成奇异的想象，奇异的语系，论证万物，进入自说自话的“化境”，就是这个语系在作怪。他们的语系里，没有第五纵队，没有美莱屠杀，没有吴庭艳，没有三K党，没有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他们的语系里，有的是矮化的格瓦拉，有的是可悯的丁默村。他们很有品位，也很有改革性，然而他们的语系是事大主义的语系，是被势利心态毒化的“知性”。纵论世界，讲到柏林墙的倒掉，讨伐那个昂纳克，意味深长地补一句：昂纳克因为他的历史罪孽，无处容身，最后接纳他的国家，是“皮诺切特的智利”。——“皮诺切特的智利”向布尔什维克的昂纳克伸出橄榄枝！这不是惊人的无知吗？不管在你的情感判断里，昂纳克有多么可恶，你也不能想当然把他和反共的皮诺切特拉郎配啊。智利接纳昂纳克是因为在皮诺切特的反民主时代，昂纳克的民主德国庇护了很多智利的民主人士，在军政府下台后，智利民选政府出于报恩的厚意，接纳了前民主德国领导人。这完全是另外

一个意味的历史插曲，而这个史实在精英嘴里，按照他们脑海里的等式，按照他们的自以为是，完全颠倒了个儿来说！——还要继续解读下去吗？在他们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逻辑里，等号等式，不是天然定规好了的吗？哪怕胡诌八扯都要把他们的逻辑编圆了！早些年，皮诺切特终于遭到清算，我对一位西班牙媒体朋友说：“你们的法院够矫情的，千里迢迢给皮诺切特发传票。佛朗哥统治时代杀了那么多人，大规模侵犯人权，也没有看到你们追究谁。”做得对，告别仇恨，里外不同。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中国人是反着来的。同情南方报业集团的人，口口声声他们因为“还原一种常识”而付出代价，不幸被暴民围殴（他们也许忘了，这里所说的“暴民”，不久以前可能都是以同样的激情支持他们的公众）。如果说都是这样抖机灵的“常识”，未免太菲薄，也显得心术过盛。我自10年前，为什么在南方系的“读史”前驻步？就是这样的抖机灵，这样的冒牌货“学理”，令我“酒肉眼前过，苍蝇心中留”。所以谁也不要说，我有意在误读这家大报，还是前面那位老兄说的好：有意思的“意思”多了，再看不出来“意思”就太辜负他们了！

王小波的匹茨堡大学校友Yaomi谈过这样的感

受：

“南周”的特色，在于它喜欢报道两类事物，一类是国内的凄惨故事，以体现民生疾苦；二类是和ZF和自由主义有关的.....歌颂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这两类报道都有其价值，但“南周”在操作上暴露出极其严重的问题。

“凄惨故事饥渴症”所催生的忽悠.....例如，关于妓女苟丽被害的故事，关于妓女教师某某的故事。.....苟丽当妓女的缘起和她的具体生活情态，按照“南周”的描述，都非常怪。再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要新闻来源，就不奇怪了。这个故事的新闻来源是谁呢？苟丽的丈夫。大家可设想一下，一个靠妻子卖身生活的男人，现在妻子在妓院里被嫖客杀死了，记者来采访他，他会说些什么呢？.....只可惜了“南周”的记者，一向崇拜美国却不知道，像苟丽丈夫这样的人，在美国被称为“皮条客”，本身就是犯罪.....

屡次拿历史说事，而且作假作到了历史头上，混淆是非，不但解构中国人的政府认同，甚至解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南周”登载龙应台的文章，公然挑战中国人的底线。龙应台说丁默村是被冤枉的，因为丁曾经和“奸匪”（谁都清

楚龙说的奸匪是谁)作战，所以对民国是功臣而非汉奸。

.....

谈八国联军的文章。主要是谈八国联军在天津搞拆迁赔了拆迁户经济损失的故事。我本人觉得雪儿的这篇文章立论没什么意思，因为你要说八国联军的拆迁理性，比较的对象应该是清政府。我从未看到过清政府搞野蛮拆迁的历史记录，所以由此得出八国联军尊重私有产权很无聊。雪儿博客里有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第一张是八国联军抢劫来的银子堆成小山；第二张是天津的顺民拿着小旗子走在八国联军治下的大街上。我认为雪儿把两张照片并列做到了平衡报道的要求；而“南周”在登载雪儿文章的时候，很有意思地删除了第一张，只保留第二张顺民照片。我不能不说，“南周”其实比CNN要CNN得多。

南方报业“自我人格”的塑造，依附于绕舌、魔方和信息整合的“催眠术”来引得欢呼，这一套手段已经非常娴熟，已经是融入血液的“自觉”。为什么有这样的自负？因为确实有大情怀的依托呀，他们一边玩着“去”历史的把戏，拒绝一切友善；然而，对于那个彼岸，他们又是媚态十足的。

“开民智”表象下的摧毁



一句话，正如王小东所说的，亲美，逆向种族主义，就是他们的情感逻辑起点。

普遍的心理悲剧也是记忆的悲剧，这个例子我说了很多，对每一个凡人而言，首先是我们从历史悲情中走出来的心态，中俄都有教科书风波的反复，对于俄罗斯恢复国歌原版、恢复一些传统的国家仪典，重提历史自豪感的做法，中国愤懑秀明星会撇嘴，会用非常阴毒的语言去挖苦。可见帮美国人当鹦鹉，无耻到什么程度！连遮羞都不想要了！媚外派也不是逢外必“不反”，你看他们骂俄国，骂伊朗，骂查韦斯，寒碜哈马斯，那个慷慨激昂哟，唯恐西方人不知道：你是没被“洗过脑”的，唯恐洋大人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中的“绅士”。难道不能反躬自问你是不是太势利眼、太不地道了吗？你没有经过俄罗斯的深重灾难，你没有经过被国际资本大大地涮了一回的窝囊的昨天，你没有因国家失去尊严而绝望，你当然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气候不坏的中国骂俄罗斯人“愚昧”。独立与国家尊严，不再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焦虑，这个严肃的课题，在我们的心目中，等于不存在；它的历史遗产不足珍惜，为了活跃我们的思维，甚至可以唱很多反调，它的领袖人物、图符、象征，尽可以损毁，民族认同、家国认同，尽可以“去”。

这个悲剧，有人以控诉之名，以“开民智”之名预演。

大约十年前我曾这样讲过——

“这个心理现实在俄罗斯演化成一场全民的历史性悲剧。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苏联，不知道还存在过伟大的红军和伟大的宇航计划，曾经有过的大国式的荣耀已经从教科书和各种主流叙述中消失了。苏联的几十年在他们心目中还剩下什么呢？暗无天日，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万恶历史，像畜生般活着的人民。苏联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它的美感曾被记载在书本上和音乐作品之中，但是这些事物不存在了。

“记忆已经被修改，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一切有关荣耀的印记烟消云散，这难道不是一种全民族的历史悲剧吗？苏联的历史存在被描述成一个阴谋，一部充满了秽乱和血腥的宫廷秘闻录，这是猎奇文学的搞法，而不是正确对待人类文明历史的做法。

“我没有太多的义务为苏联的历史辩护。但是，至少从苏联的土崩瓦解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种统治性叙述取代另一种统治性叙述的神奇过程。封杀历史、篡改记忆、修正常识，统治性叙述的妙用就是这样的。不是此就是彼，历史哪有那样浅

薄？我谈一下个人观点，我就不相信。尼采说过的，国家本身是一种‘恶’，老百姓和官方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上的信仰冷战，这种信仰冷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然而，当西方的主流叙述取代传统的叙述方式时，我们何尝不是体会到了一种新的暴力呢？莫非苏联时代许多了不起的事物都是克格勃工厂一手导演出来的幻象？.....”

现在，大家爱引用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一段话：“谁能控制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谁能控制现实，谁就控制了历史。”并且顺势论证：“记忆的控制、删除、改造与编织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说得好！难道“不是此就是彼”的飞天跨越，才是有良心的历史观？我们老讲一个词“浮躁”，这是不是浮躁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这些五六七“零”出生的几代人都白活了，都是机器儿童了！只要对这种蓄意的篡改和构陷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依照一些现成的经验作出判断，或者对过去表达出一些理解和善意的态度，就不得了，就要打灭！这个话题很宽泛。我这两年做“记忆”工程，觉得很有价值。著名作家池莉讲了一个比较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她在指导女儿写作文的时候，发现女儿对“青青的瓦”根本不能理解。女儿疑惑地问：妈妈，什么是瓦？她这才恍然大悟。她由此感

叹说：现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到处高楼林立，青青的瓦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带着乡村气息的故事。——历史在发生着怎样的轮回，呈现着怎样的逆差？在封闭和匮乏的年代，我们赋予那些奢侈的、属于未来的事物一种美妙的色彩、一种可笑的设定。而物质和信息得到充分满足的今天，古旧的事物被自然遗弃，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带着乡村气息的故事。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30多年来中国的变化超出了过去变化的总和。一个简单的比方，在很多新词汇诞生、涌现的时候，很多词汇在消失，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但是，如果像“爱”“国家的尊严”“忠诚”“人生价值”“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些词汇也变成一种古旧的、可笑的概念的话。我们就需要回溯这一段历史，梳理我们的记忆，避免心理悲剧继续上演下去。

## 四、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刘仰

一位朋友说起中国的股市，不免痛心疾首，他在股市里损失了几十万。相信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老百姓不在少数，据说中国股民目前还有4000万，最高峰时总人数差不多有一个亿。这么多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为何就烟消云散了？这些财富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并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情，但是，看看是谁把中国老百姓拼命拉进股市，并以各种各样“先进观念”“国际惯例”向老百姓灌输股市赚钱的方式，也许能使人们看清一点真相。中国的股市、金融是最美国化的领域，是被来自美国的“海龟”们最高密度把持的领域，或者说，中国的股市、房市、金融领域是经由在中国的买办们，与美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

改革开放30年了，到了今天，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危害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模式，还是要变成美国的附庸？

当人们说中国的教育现状问题很大的时候，想一想，当初乃至今天，是谁把美国式的教育当成最好的教育模式，并向中国大力引进？当人们说中国的医疗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

谁大力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对中国的医疗制度实行改革？当人们对中国的房市怨声载道的时候，想一想，当初是谁把“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变成中国房地产的心理推动力？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凡是对美国模式顶礼膜拜、仰承鼻息的领域，改革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国老百姓遭殃。

独立自主的中国与依附美国的中国，差别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社会财富的转移和聚集方面。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

当人们说中国的污染极为严重的时候，是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加工厂，以至于中国制造得越多，污染越严重，美国越赚钱？当中国人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是谁又让中国人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一架美国飞机，却不愿对中国自己发展大飞机进行投资？

当中国积累了一些外汇储备，又是谁将这些外汇变成巨额美国国债，让中国穷人把血汗钱借给美国富人？还合演了人民币对美元单独升值的“无奈”？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让中国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

当中国人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满的时候，是谁在说中国人有“仇富心态”，并为富人们竭力辩护？有多少社会精英们领着美国各种基金会的课题费，做着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研究？有多少中国的官员、学者、媒体人士，由美国出钱，到大洋彼岸，一次次集体出美差？或者自己花着中国老百姓的钱，为美国经济作贡献？当中国人痛恨腐败的时候，是否还记得一些亲美人士曾经说过：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一位中国某著名高校的著名学者还大放厥词说：腐败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如今，当全中国人民对腐败痛恨不已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将腐败说成是体制僵化的结果。说实话，让那些“僵化的老土”们去搞金融腐败，我还真怀疑反对将中国美国化的“老土们”是否有这个知识和能力。同样是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被美国总统接见后激动不已，竟然说出“中国应该分裂，应该做美国的殖民地”这样的高论。还有著名学者公然宣

称，中国就该“给美国当孙子”。与阎崇年主张“中国各民族应该融和”相比，谁更像汉奸？

中国需要改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为第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存在着对马列理论教条化的现象，如今，中国某些精英们，对于美国的方方面面，也同样存在着严重教条化的倾向。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状况，硬生生地将中国绑到美国的战车上，其中一些人是靠出卖中国利益的得利者，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的附和者，以为他们所描述的美国天堂真的能在中国出现，却不愿想想，所谓美国天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今，当美国天堂开始轰然倒塌的时候，他们还寄希望于真有所谓上帝会独独钟爱美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应该的。在这样的学习、了解过程中，某些人产生亲美的思想也很正常，但是，将亲美变成依附美国，将美国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唯一出路，并且将亲美势力变成社会主流，将凡是反对盲目崇拜美国的意见和人士，都扣上“反对改革”“民族主义”“专制独裁”等危言耸听的帽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些极端亲美的精英，这些为了美国而大肆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



买办们，嘴里高喊着自由、民主，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洋奴。这些洋奴不光使中国的经济变成美国的附庸，在思想和人格上，也成为美国的附庸，在洋人面前，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五、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黄纪苏

近代以来，中华帝国体系的大厦颓然倒地，鼠奔狐窜，我记得头些时看一篇谈19世纪末泰国脱离中华体系、扎英国怀里的文章，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传统决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复得，西方什么样的瘪三都来大摇大摆地登门入室。弱国不单没有外交，也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甚至没有男人。20世纪末以来保守主义情绪潜滋暗长乃至起家树誉，无论哪种版本，的确都有可同情之处。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算水分很大），毕竟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敢定睛看看过去，才敢放开胆子想想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回首整个20世纪，我们大部分时间混得跟无照摊贩似的，东投西靠，哪儿有现在这条件？现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啸他们对西化发了点牢骚，其实也不算怎么过分，竟被仁人志士围殴痛歼。我怀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遗老遗少”这样的词汇，我想即便有，也没有现代汉语中那种活人穿寿衣的感觉。这是失败者的命运，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进奋发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宽袍大袖粉墨登场，无论是祭孔还是什么“汉服”运动，觉得好玩

之余，也未尝不感到一分欣慰，因为中国总算有了摆弄这些的国势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这100多年的现代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给我们的，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同时，也要承认，光靠传统我们走不出近代大危机，还要靠现代化。你喜欢柏油马路也好，不喜欢柏油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径是走不出去的。数理化谁爱学啊，但你得揣上它，这样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们也要承认，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符合人类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对舒适、清洁、快乐、富裕、健康、长寿、便捷这类古老而恒久的价值追求。坦率地说，没有西方扩张，我们或迟或早也要走上这条路。头些日子翻阅《厕所的历史》，非常有趣。按照当时西方游记的说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伦敦也好闻不了多少），抽水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统的普及，欧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确是得益于工业文明的欧风美雨，虽然鸦片炮舰也是那阵风雨送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因为了不起，他就唯我独尊，就多吃多占，就欺压其他民族和文化，这样就引起后者的反抗。这反抗包括了学术、文化上对“西方中心

主义”的批判。这批判的基本立场和大方向是对的：自由落体运动放之四海皆准，但你西方的社会人文经验包办不了全世界的事，还差得远呢，别太膨胀了！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因为批判“西方中心论”而不分青红皂白，把科学、理性也一网打尽，那你是走不了太远的。毛泽东早说过，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很多事情的确需要两头想，多想俩来回。

关于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技术跟中国传统知识中相关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处的所谓“民族科学”或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我曾跟友人讨论过中西医的例子。友人认为中医的思想方法属于整体论，应高于尚处在原子论的西医。我理解他的出发点，但觉得这样的说法失之偏颇轻率。其实各民族前现代阶段的知识，都有整体论的倾向。西方的医学知识走出这种整体论，应该说一种提高和进步。偶尔读到上世纪60年代出的《医学常识问答》。问：民间“十滴血一滴精”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答：没有，因为根据化验，精液的成分基本为水，余下为少量蛋白质之类，因此“纵欲伤身”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

那时的西医的确停留在原子论的初级阶段。但今天的西医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它找出了精液与

免疫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房事过度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这样的西医知识，便与瑞大叔、西门庆这路人活不长的民间经验握手言和，尽弃前嫌了，而且是在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认识层次上。

关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似是而非。这个现象今天与其说是医学认识上的事实，不如说是医疗体制上的事实。一个患者左手发麻，西医会让他查神经，查颈椎，查心脏，查脑血管，而不会攥着他的手不放——会攥着他的钱包不放。心脏虚弱，西医也会把原因找到两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于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识就从经验上的简单相关升级到复杂的因果联系。原子主义或许仍是今天西医的现状，但肯定不是它的趋势，它的趋势是从原子论走向更高的整体论。相比之下，中医的“整体论”因为没有经过一个非整体论的过程，基本还在《金匱要略》那儿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两千年了。“文化保守主义”老前辈陈寅恪说中医“有可验之功，无可通之理”，应是平允之论。物理学进步了，化学进步了，生物学进步了，但都没有深化中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它还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那一套。由于“理”停滞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对于西医的优势迟早也会丧失。总之，应该对中国与西方、

对传统与现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实事求是”命门，不要把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进步都思考没了。

## 六、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黄纪苏

邪里邪气的“文化”与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

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



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

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

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

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

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

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

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树立大抱负，舍弃小吟味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遥想当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百十来人上井冈山，靠的就是大目标、大抱负，没这东西，这小股人马在近代大漩涡里一圈就转没了，连个泡都不会冒。《张学良回忆录》里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

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



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宝贝》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

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

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呢，这才美得高级呢！社会的主流不能跟他们走，跟他们走中国就完了。中国还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脚——《采菲录》里记古人玩小脚，也玩出《美学》上下卷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既然进入了世界历史，你就得有大的作为，不然就得出局。

现在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个人来说，大都还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这么多年的世界观、人性观和美学观教导他们，凡有大目标、大抱负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调、小玩闹才货真价实。于是他们苦练“缩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缩没了，光剩下头那俩部位了。就说这“下流话”吧，老的跟少的学，男的向女的学，你追我赶，看谁先把嘴练成肛门。结果很快，他们真的变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疯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从事文艺，家长不急得飞檐走壁呀！

张文本有句话说得挺好：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

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

##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王小东

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国如果没有了大目标，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个大报的记者采访我，让谈谈宋祖德的问题。他们的切入点是所谓的“伪道德卫道士”和“侵犯名人隐私”。我说，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那你们和宋祖德也没有多大区别——究竟有几个人拿宋祖德当道德卫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开开心。现在的媒体一个劲向下三路看齐，正经事不谈，光扯淡，才使宋祖德这样的人应运而生。但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比如他报导陈云林见马英九，说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很重要，可他给我们的是什么细节？两个人的眼神！要说两个人的眼神确实非常特殊，这也算是新闻热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完全是没话找话，这难道不是扯淡吗？

中国在文化上的衰败不应该只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30年，衰败的过程比这个要早得多。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确实被人家在物质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后，大多数人丧失了所有自信，赶紧模

仿。而那些没丧失信心的，如遗老遗少，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有见识的东西来，不值得称赞。要学是对的，可那么着急地学，咱们可以想象，肯定学不太好，要接轨，很难接，是有一个过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没有衰败到这个样子。日本应该说变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没到我们这个地步，还有一些原创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以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还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头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东亚黄种人文化的源头。

卡拉OK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欧美是跟日本学的。日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创的。比如绘画，东山魁夷，人家学了西方画又保持了东方精神，咱们拿得出这样的画家吗？真的拿不出来！从物质文化角度去解释，日本受的打击比中国轻，站起来比中国快，比较快就恢复了自信，比较快就比中国有钱，文化要来自于物质的相对充裕，当时日本也不阔但是比中国有钱。

中国有原创性的东西，坦率地说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钱，但因为隔绝了，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创性来了。中国歌曲日本人会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几乎没有。我听到过日本人很豪迈地唱“文革”歌曲，什么《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东风吹，战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会，但是这些歌他们能用中文唱出来，字正腔圆。我决不是说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讲一个文化现象，文化传播有自己的规律。

日本人会唱“文革”歌曲，当然跟日本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文革”歌曲未必优雅，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个种类。当时也还有一些音乐是比较优雅的，比如说《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并不坏，而且后来这些音乐被电影大量反复引用，就说明这些音乐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说中国人在精神上垮了。这种“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进了国外物质文化的缘故。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当中精神上已经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问题，所以精神上已经垮掉了。这个过程，严格讲是精神上先垮，物质文化在后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质文化上跟进来。

还有，所谓的高雅文化，比如《图兰朵》那些东西，让那些所谓的高等中国人去附庸风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虑东亚文化的特点。东亚文化还是有她的纯真性的。中国流行文化主要源头在日本，不喜欢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大目标对于文化的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大目标，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大目标没有以后，精神上颓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站得住脚的文化产品的。

我再重复讲一遍，就是百年奥运这事。“奥运会是中国百年梦想”这个口号提得相当糟糕！奥运会是件好事，办得也不错，中国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奥运会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就不是事实了。中国百年一开始的梦想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成功之后有一段的梦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类。

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梦想，那么到了现在，中国还得有大的梦想才可以，要比奥运会这个梦想大一万倍。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前”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吗？要是昨天到今天这么说也对，可你甚至不要说八九十年，就算说个50年，好像也不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几十年中比奥运会大一万倍的有的是。记得当时中国申奥成功之后不久，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我，用非常蔑视的口气说：这次你们申办成功



了，你们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当时一拍桌子说：“你懂个什么？中国作为屹立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超级大国，办过多少比奥运会大的事！不讲几千年，就讲最近几十年，中国办过的事比奥运会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联合国军打不比奥运会大吗？”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

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

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关于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现场的志愿者，他们说教师当中像范跑跑这样甩了学生先跑的，他们只听到这么一例。这帮知识分子给范跑跑找理由，说人到那个时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像范跑跑这样的教师绝无仅有，而像谭千秋这样的教师却有许许多多。

范跑跑后来发了帖子，刘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他承认，发这个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亲妈也不救”那段话加上去更是故意的，过去根本没有这么想，写的时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谓的虚伪的道德神经，他就是这目的。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在思想层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们的误导，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机压力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很优秀的，素质相当高，远远高于欧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高素质，已经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听你说中国老百姓素质比欧美民族高，又要跳起来了，他们马上会提出随地吐痰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我去英国，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满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烟头、烟盒等等，实在是挺脏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单纯的痰迹难刷掉，据说英国政府每年要花好几千万英镑来刷这个痕迹。讲素质对比，我们可以把泰晤士河边跟上海黄浦江边比较一下。我们不能讲黄浦江边上比泰晤士河边上干净，其实这两个地方差不多。但是黄浦江边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边的高得多，那么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游客人均造成的肮脏和污染，肯定比英国少多了。你说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高？

我把这个见闻贴到网上，又有一些人蹿出来，说我去的肯定是伦敦穷人区。我告诉他们，从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只要20分钟，如果你说女王也是穷人，女王住的是穷人区，那我也

没话说了。

随地吐痰是坏事，不管外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你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中国国民性比外国人低劣的证据？汶川地震中，中国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你们为什么就熟视无睹？

##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黄纪苏

其实我们的用意根本不在个人，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看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不妨把这几十年文人的谱系简要地捋一捋。

先说钱钟书。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父亲去欧洲参加那里的汉学家会议，带回来不少资料，其中有一本俄文书，说是翻译中国一个作家的小说，叫“围城”，译者托父亲把书转给作者，作者叫钱钟书，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父亲把书寄给他，他回了封信，信不长，好像净是打趣的话，忘了怎么说的，大约是“为国争光”什么的吧。我略感诧异，因为我爸并不认识他。后来不久他就成为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了，这比电视剧《围城》让蹬平板车的都知道他可早了小十年。

他的蹿红在中国社会的山河巨变中有深刻的根据。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

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忽然背着手走来一位同胞，说了一段英文，接着又说了一段法文，接着又是德文，大家能不傻么？于是他再接再厉——意大利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把“蓝眼”都听得溜圆，大家能不疯么？这是钱钟书暴得大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转为改革开放，文化思想上虽然不少人扔掉老主义投奔了新主义，但一般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对“义理”有些瞧不上了，具体的知识相对升值，这跟清初朴学的兴起是差不多的道理。梁晓声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自己写的另一篇几百字

的文章用了三四十个希腊典故，想想也没什么劲，无非是想说明本人也是读过点书的。王蒙当时也向文学家发出了“文学学问化”的呼吁。当时的小说报告文学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则《辞海》条目，就跟给孩子取名查《现代汉语词典》一样。大家后来提高了点水平，散文杂文又都以《世说新语》打当头炮了。在这种普遍的文化氛围里，钱钟书能不是巨匠么？那一代读书人急于拥有却还没拥有的古今中外各种小摆设，都快把四卷本的《管锥篇》挤爆了。

黄裳先生对钱的定位客观而中肯，说他是位学人兼才人。钱的确不比这高，但也不比这低。钱夫人杨绛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园初识钱钟书的情景，钱当时就表明了胸无大志、唯愿终生向学的心迹。对此杨很认同，两人遂结百年之好。钱的学问平心而论是颇有可观的，首先像他这样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的，当世还真找不出几个，当然有了孤狗、搜狗这样的助手之后寻常人也有可能达到那个境界，但这两样利器在他生前都还没普及。当然了，不少人批评他没有建立大的理论体系，但就文史的既有传统而言，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把材料找出来，功劳真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基础性的工作，投入了生命岁月——用他的话说，属于“冷



淡生涯”。他的劳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钱的文学创作，的确没夏志清捧得那样高。他只是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子，练的娶青妃白、烹文煮字的手艺，津津乐道于小世界的鸡飞狗跳，气象不能算大——他给胡乔木改诗词，自己也颇慨叹“仁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历来文艺作品的评价，作家的境界怀抱都是要算在内的。其实这境界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举个例子，鲁迅说：“婚礼不过是同居的广告。”何等的简括有力！钱钟书的连类比喻一般是没完没了，一直连到读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罢休，这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鲁迅的比喻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说明问题，而钱则是在表演才艺。一繁一简，反映出境界的高低。其实钱先生的现代汉语写作相当匠气，多少于此有关。倒是看他的古文比较舒服，古文比较程式化，谁写都跟小老头似的，个性相对容易掩藏。

钱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文人都算是不错的，而且也没听说他坑过谁害过谁、干过什么缺德事。只是把他当作“泰斗”，却多少说明那些年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在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钱这样的人很容易领袖学林，就像清代的阮元。不过平心说，由他坐第一把交椅，真够对得起当代文化史

了。在这个周老虎、三聚氰胺的年代，哪天韩寒做了文坛祭酒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或者上面愣派个人事处长来当文联主席，不也得接着么？钱先生到晚年颇悔少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轻薄亢躁的当代文坛偏就拜倒在他的“少作”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黄纪苏

前文提到钱钟书，再看看王朔。我头些日子写的《市场社会的样板人》提到了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如潮如涌，已显出了拥有未来的气势。不同于还要拜卢梭为师的刘晓庆，王朔以小说《顽主》为即将上场的市场社会缝制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会旗。旗下的嘎杂子琉璃球一个个灵气十足，精神百倍，读书的当官的都不放在话下，而是踩在脚下。这样的场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还先于现实。在现实中，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从牛仔裤西瓜堆里钻出来的第一拨商人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还有一段差距，此时一脚高一脚低，看着跟一头沉似的。

王朔的出现同样跟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有着不解之缘。别看他在小说里老寒碜正统，其实他出身于最正统的那个阶层——“革军”（除了“文革”中几年，可以与“革干”合并同类项，合称“革干革军”），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交代得一清二楚。军功阶级是前30年的领导阶级，更是“文革”十年的特权阶级。但这个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没混好，被一帮知识分子拐跑了，革干革军的绝对落差虽不大，相对落差却不小。这相对落差足以让

王朔在感情上“重上井冈山”，也就是回到中国革命的起点，但这回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开公司倒买卖——开那种“三T公司”跟造反差不多。他笔下的“顽主”可以说是农会积极分子的转世灵童。王朔的作品代表了没落特权在市场社会重新崛起的愿望，是有正当性的。头两年流行的《忏悔无门》，书中主角李春平也出身军功阶级，跌得也不轻，混到在单位做保安还蹲了大狱，末了竟然跟大他近40岁的好莱坞老太太“闯关东”“走西口”去了，成为这30年社会变迁中最离奇、最惨烈的个人故事。在一个起伏升沉不定的社会里，破落地主、破落贵族跟贫下中农或城市贫民之间的距离，常常也就是一步半步的事。“顽主”这个社会形象很快就独立于具体创作者的社会存在，而成为一个新兴商业阶级挑战官、学既得利益的集体符号了。商业阶级那时刚从西瓜堆、仔裤堆里崭露头角，有个半外号半小名的“倒爷”，“老总”或“民营企业家”是它做大之后才赢得的尊称。

文学上，王朔的确独树一帜。他的语言生动活泼，充满了街头巷尾气息。对于“倒爷”群体很有限的历史积累和社会视野来说，这样一种“没膝大衩式”的表达形式，既本色又大方，既夸张又从

容，穿着它出入既得利益的派对或舞会特别有冲击力，富于行为艺术所追求的“颠覆性”。中国是一个社会流动极快的国家，底层在不断地混入上层，边缘会持续地挤进中心，王朔语言也许能长期为这更广大的群体提供一种“去你们妈蛋”的表达工具和世界观呢。其实，这些年盛行的那种小玩闹的网络文风里便可以看得到王朔的影响。那些流里流气的80后文学不好说都是王朔一人下的蛋，但他的DNA不用亲子鉴定也看得出来。王朔的这种“文化价值”若能兑换成文学价值，我不知道能不能折合一个半个老舍。但仅就文学语言来说，他确实比众多在老舍这棵大槐树下一坐坐一辈子的“京味小说”“京味戏剧”高出一头不止。那些人模仿的，是还只有百万人口的旧北京，而王朔要表达的，是一个经历要丰富得多的新北京。

放在大一些的视野中，像王朔这类文章，其夺目的偏狭、冒烟的歪才，实在是一个民族舍弃大目标、收缩大情怀后进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症状。他笔下的世界不是“伪君子”便是“真小人”，除了“丫的”还是“丫的”。没有“真君子”的世界也许是真实世界某一片段的写真，不可能是它恒久的本相——那样人类社会早散架了。他的作品缺少历史与未来的纵深感，他只在当下翻跟斗，因此他

只是一个过渡人物。头一段网上报道他批评一个叫郭什么的80后作家搞抄袭。当年他鼓吹“我是流氓我怕谁”下的蛋，如今孵出“真流氓”来了，对比之下，原来自己也只是“伪小人”或“打折流氓”。“伪小人”或“打折流氓”是80年代文化的特产。那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规划的未来社会是个小人社会，于是有些“真君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挽起袖子，放开喉咙，就像当年讴歌道德理想国那样讴歌化粪池下水道。这导致了他们日后人格的极度分裂。还有一些“真君子”看了未来世界的蓝图，发现自己到了那时候只能住收容所和精神病院，想还是快快改“邪”归“正”，规规矩矩做个“真小人”得了。但学好难，学坏也不容易。于是由电影、小说、诗歌、先锋戏剧、报告文学开办的“真小人”补习班、速成班、自修班、强化班应运而生——主校区当然还是社会。学坏要靠努力，也要靠天分，尤其要靠童子功。这些半路出家的“真小人”冤枉花了好些学费，到头来净是半成品。

当过“右派”又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谈《青春万岁》。他感叹道：我们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处，如果理想主义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我当时读了真挺难过的，

也很尊敬他，我理解那一辈人的无奈和失落。后来他可能想通了，越混越有意思，一会儿“轰动效应”，一会儿“躲避崇高”，快马加鞭地跟堕落的时趋沆瀣一气。看着他一把年纪，跟着王朔那些人屁股后面贫嘴呱舌，特别像公园里笨手笨脚的老太太学探戈狐步，又何苦呢？其实他打打太极拳就挺好的。

文人普遍的失魂落魄，其直接后果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品相太差，净是些鸡零狗碎、根本不入赏鉴的东西。他们还说什么“放逐”不“放逐”的，自己就没高看过自己。这当然有大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小文化想必也起了作用，就说王蒙吧，他的遣词派句，真比老成点的初中生还幼稚，但他居然觉得好得不成，亦一怪事。恐怕得向小文化找原因了，他们是不是有个互助组定期相濡以沫，把彼此吹晕，就不得而知了。记得他当文化部长后报纸采访他，他说，自己小女儿曾说：爸，就您，还当文化部长？！——这样的火眼金睛，应该选拔去做质检局局长，甚至是他写的组织部中新来的年轻女部长才对呀。

##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黄纪苏

王小波的小说我真没读过什么，读的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登在《南方周末》或《读书》上的文章。应该说，他的文字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聪明，我年轻时很爱看罗素的文章，王显然受过他的影响。另外，他能把身段放低，自己不过是人生道边的一名看客，坐着观望，蹲着指点，比那帮老在高音区下不来的精英要可爱不少。其实还不仅仅风格，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有所同情。比如他讽刺海外左翼留学生，说他们放暑假回国探亲，顺路主张一通“社会主义”，然后打飞机回美国继续“资本主义”。读了令人莞尔一笑，这样说固然不全面，但也没瞎说。海外的左翼学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在这儿，他们所持立场、所提主张便往往透着一些轻巧和便宜，而且那洋腔洋调本身，坦率地说，也够“右翼”的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台湾来的歌手叫侯德健的，记者请他说台湾（其实就是声讨台湾），他回答说，我要批评台湾就回去批评，既然在大陆就批评大陆，当然没必要那么拘泥，但这股敢豁的劲儿挺让人佩服。王小波对中国的现实不满，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来没错，读书人就应该



不满，有不满才可能有社会的改进。但王的不满又真的有点病态了——跟爱之深责之切还不是一码事。对病态的东西，我能理解甚至谅解，但我不会喜欢。他笔下的中国从古到今好像一无是处。他既然以理性自居，怎么就不能理性地想想，中国真差成那样，能混到今天么？读他字里行间的情绪，感觉就像贫苦家庭的子弟，由于扒富人家窗户见过了世面，便成天摔门摔碗，骂骂咧咧，怨他爹多此一举，伙同他妈把自己绑架到这么个破地方。他有句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把中国这块天地当回事了，纯粹是破罐破摔，在祖国的语言文字上随意小便。当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小波的未亡人李银河女士就觉得这句诗美不胜收，想必有她特别的理由。记得还看过他的一篇文章《百姓·洋人·官》，以小时候都玩的游戏“石头·剪子·布”做比——说的是“政府”“百姓”“西方”之间一物降一物的罗圈关系，写得挺漂亮，但对同胞百姓的那种刻毒令人反感。中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弱者，对西方发点不满的声音，怎么就招来他们这样的挖苦呢？

没过多久他就病逝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小波活着的时候他的名字一年也听不到两次，等他死

了之后，一天到晚老听人说起他。臧克家那两句诗稍微改改，放他身上倒挺合适：活着的时候约等于死了，死之后超过了活着。我对王小波多了些了解也是近两年的事，因为认识了一位朋友，她从前是王小波迷，现在是王小波专家。据她的调查，小波在美国陪读，过得相当狼狈，好像在大学的汉语部混了个学位文凭。这位朋友对王有深入的了解、激烈的批评。她觉得小波十分可憎，惨成那样还美化美国、忽悠中国。我倒觉得小波挺可怜，不妨多些同情。我是这么想，在中国这样的性文化里，一个男的娶了个李银河那样冒尖的老婆，就相当于娶了一把尺子和一根鞭子，合一块就是一位“女版马俊仁”——日夜提醒自己的不足，日夜驱赶自己马不停蹄。有一天那尺子、鞭子——也就是女千里马——一个大跃进跃到了美国，你说小波跟进还是不跟进呢？不跟进吧，“留守男士”的苦果不好下咽；跟进吧，那可就是进高压锅——他们夫妇是社会、家庭、两性方面的专家，对此应该比谁都清楚。别看王小波外表五大黑粗，里边想必也是“玻璃易碎”的传统文人心性——据说插队云南边陲的日子里曾在月光下、镜子上用蓝钢笔打过不少诗稿。80年代中国还没崛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可远不如他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但男女还有

很大的差别，美国的性别文化跟中国差别不大，基本上也是男的往下娶，女的往上嫁——我也用数学形式表达一回： $M \geq F$ ； $F \leq M$ 。这种性别文化，对于处在北美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影响，虽没到家家着火、对对冒烟的地步，但变化是切肤的，痛苦是铭心的。女的，只要确实是女的，没听说有嫁不出去的；稍有点模样的，嫁不到中产白人总可以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男的则往下再没女人了，有也净是橡胶的。他们只能靠死啃硬拼数理化，一点一点改变命运了。陪读的小波，他的压力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小波那些年从这家中餐馆到那家中餐馆，终日在厨房里与鸡腿鸡翅、菜板菜刀为伍，这样的生涯对于他这样家庭出身精英、本人成分精英、不但读书还打算写书的人，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不知他开瓜切菜的时候想没想过，如果想过，但愿他没有切着自己的手指。

我过去读过以色列小说家写的一部移民史诗，讲一群知识分子上个世纪初从俄罗斯来到以色列，船到码头，这些灵魂工程师像碎石子一样被倾卸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白天“曳尾于涂”，为牛为马，夜晚爬上沙丘，靠着棕榈树，把自己如歌的心事一件件摊在星月下晾晒。其实今天躺在工棚里、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农民工，其中也有这样情感丰富的乡

村知识分子，我多少年前就碰着过，有个在家具店蹬板车的给我送书柜，他喜好文学，正学英语，我最后送他一本英汉词典。心与境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紧张，从来都是文艺写作的原动力。不是说志得意满的人干不了文艺，但他们干起来确实没精打采，干出来的东西缺少活色生香，就像莎翁笔下的那个私生子把自己与嫡出兄弟做的比较：播种我的时候，我爹心突突乱跳；播种他的时候，老头都快睡着了——收获能一样嘛！小波不缺生活的刺激，他的文学创作我不了解，但猜想是属于不写就疯的那类。

他死时刚40来岁，正当盛年。一个人在这个年岁上虽然内心世界已大体布置就绪，但也还可能吸收、整合新的社会人生经验，这对于一个剧变社会的记录者、思考者和表达者来说尤其重要。你要是跟不上时代和生活的变化，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会被甩在后面。坦率地说，文化思想界很多人认识上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原地踏步，踩出的坑够把自己活埋的了。中国社会已经走了那么远，但很多作家依然没走出“文革”的阴影，依然祥林嫂似的没完没了说“伤痕”，依然在唱80年代的“人性解放”之歌。如今十四五岁的小丫头一个个早都“解放”得跟风流寡妇似的了，文化人应该睁开

眼睛、面对现实、唱点别的了吧？90年代中期之前大势如此，小波也只能在那个框框里载歌载舞。我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这十年会不会给他的精神世界带去新的视野，给他的创作带去新的机会。我总觉得他人生最后一二十年的经历，应该能营造出比伤痕文学更广大、更丰富的世界。小波已矣，我们不必过多要求他什么了，批评也可适可而止，因为时间已经对他够苛刻的了。倒是王小波众多的“门下走狗”还来日方长，真希望他们拣王小波的长处学学，长进长进，别老冲自己的民族反咬一口了。

#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王小东

王小波的神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破除这个神话乃是功德无量之事。哪怕一时半会说服不了所有的人，但对于一个神话，只要能够把怀疑的种子播撒下去，只要这些种子确实是事实，这个神话离破灭也就不远了。我当然也曾有心于此，只是苦于抽不出时间来，也苦于我就是读不进王小波的那些我认为是垃圾的文章。然而，我有幸认识一些曾经是王小波的粉丝，或者与他距离不远、却认清了这个神话的本质的朋友，他们来做这项工作比我更合适。

当我转贴了一篇很明显是影射王小波夫妇的文章后，激起了一些纠纷。网友Alex对我说了一番比较中肯的话：“看来王先生对小波的意见很大……我认为小波不是弱智。他的见解确实很一般，但不知道王先生读过他的小说没有，那才是他的成就所在。相比欧洲，小波对美国的赞扬其实有限（或者说很隐蔽），他文章中排出的座次是：欧洲 - 美国 - 中国。据我所知，他去欧洲只是度假，接触到的东西很少，这也有利于他后来对欧洲的‘建构’。小波对中国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可惜不知出于

什么样的考虑，他硬是把这种批评和对欧美的赞扬结合起来了，产生了很糟糕的效应，这一点被许多人利用。朱某某把小波对西方文化的推崇简化成‘欧美理性’，就是一例。小波本性善良，这是如今许多‘自由主义者’不具备的。虽然他死之前说中国要有自由主义就从他开始，但我想这十年来发生的事情，身居地府的小波若是知道的话，也许会向中国的立场靠拢的。”

坦率地说，王小波的小说和散文我读不下去，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他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也谈不上“意见很大”。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在美国被人欺负惨了，却不知道愤而进取，回国来只会破口大骂中国人，并且给中国人描绘一个虚假的欧美，这是骗子行为，这一点被我看到了，我很鄙视他。

王小波写的东西我读过的只有他的几封书信，还有一两篇骂中国人的文章，主要是从他与我的一些朋友之间的对骂得知的。但正如柯南道尔所说的，“要知道一个鸡蛋是臭的，你不用把它完全吃下去”。无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写得如何，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臭鸡蛋，因为他的臭味我闻到了。而且他的臭味把我熏得吃不下去，所以，我对于他的臭味也提不出太多意见来，我只能发别人辨析他臭味

的文章。

网友Alexi说：“是的，这一点确实很可惜。小波的个人经历，在留美学生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来他策略性地避开了这一点，大谈民族劣根性，这是他的一个污点。但是我对小波的了解比较多，所以对他更加同情。小波毕竟没有吃洋人的剩饭，还是远远强于现在的什么民主斗士、自由战士之类的人物。当务之急就是要给这些美国培养出来的‘自由人’排排毒，让老百姓看看中国人在那边的真实遭遇。自己不知自强，一万年都是给别人打工的料。中国的洋奴太多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承认自己是洋奴。”

王小波的亲弟弟都被美国人杀害了，弃尸街头——据美国警方估计他死前挣扎了很长很长时间，十分痛苦，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没有一个路过的美国人救他。这件事发生在王小波死后，但他弟弟在美国的凄惨生活则是他生前就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本来，王小波具有最真实的个人经历，据你们说也具有很好的文笔，来告诉中国老百姓中国人在那边的真实遭遇，可他又干了一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怎么能让我不鄙视他？

在王小波这种人的影响下，今天，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在美国的中国人还是活得这副德行。我一



个朋友的朋友，前些日子去美国，在旧金山，四个早就在美国定居的朋友和他一起去吃饭，碰到一个白人，毫无缘由打了他们当中一个人一拳。这哥们见状要上去用拳头或语言理论，被那四个定居的死神拉住。回来，五个人沉默不语。最后刚去的这哥们说了一句：原来你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啊？那四位脸色铁青，最后迸发出来，不是大骂美国人，而是大骂中国人劣根性，中国人不文明。这些人都是“王小波”，我永远鄙视他们。

##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 为妙

刘仰

很多年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时，被小朋友称为“刘闹闹”。因此，“范跑跑”“郭跳跳”这两个2008年使用频率很高的媒体用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习惯用语、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对于范跑跑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只能对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说点看法。范跑跑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问题，也肯定要涉及自由问题。批评范跑跑的人总离不开道德标准，维护范跑跑的人也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件小事放大了说说。

范跑跑的行为及其理论依据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有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批评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仿佛范跑跑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在说——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最终又变成抽象概念的思维操练。其实，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产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

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

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现在不会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为的时候，

像欧洲中世纪一样，不能脱光衣服了。因此，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老式自由经过变化，现在与新式道德产生了一种平衡。在曲线上说，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个互相的让步。范跑跑的第一个失误在于，没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经不时髦了。

第二，职业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过几百年老式自由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个人自由还不够，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场合有用，在很多非公众的职业场合，个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实，职业道德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职业道德。然而，由于中世纪宗教所规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强大，因此，在那个年代，职业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没有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比古代要多，职业道德的规定和约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况下，地位越来越高。范跑跑的第二个失误就在于他忽视了祖师爷们已经提升了职业道德的新动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

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

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

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黄纪苏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

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

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

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干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

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

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

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王小东

50年后人们再回头来看，中国今天学术思想的贫乏，包括文学，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最多耍一点小聪明！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他居然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

跟哈贝马斯握一个手又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三哈”——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把“三哈”敬成这样的一个知识阶层，怎么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呢？

过几十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后代会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贫乏感觉丢脸和耻辱：什么都没有！钱钟书写了《围城》《管锥篇》《谈艺录》，那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般罢了，就被捧成这样。韩寒更不灵了，无非就是卖了一个80后的偏门。

关于制度对于思想原创性的影响，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学术”。因为我跟香港人接触，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学术”，95%是引用外国说法，外国甲怎么说，外国乙怎么说，外国丙怎么说，天干地支他们全用完了，还不够。然后自己的5%说一件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事。可我们中国大陆还跟着学，还以为西方学术标准就是这样。咱们凭良心说，西方学术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还不至于到香港这个程度，包括像拉美国家我也接触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毕竟还是一说就直接说问题，一说就说到关键。

为什么叫管家学术呢？我们知道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高工资，比美国教授工资高多了。我认为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英国深谙殖民之道，他们大概非常清楚，中国人非常敬重读书人，连写字的纸老百姓都会给你收起来，送到文庙去烧掉，所以把知识分子高薪养着，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条，你是奴仆，你有自己独立思想是不行的，我养着你，让你穿光鲜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国人自己来，这个主子干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诉你，你翻译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可实际上他们连翻译都没做好，中国人听不懂。我碰到一个官员从英国培训回

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把英国人挺明白的话都翻译成听不懂的。我说这就是叫故弄玄虚，其实他自己连很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所以就故意云山雾罩地翻译出来，让你看不透他。

大陆跟着香港的路子走，有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国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国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英国殖民者跟你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中国官员们跟我们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实在不应该把大陆学术也搞成“管家学术”了。

香港“管家学术”本来是最糟糕的一种学术，现在大陆都学了。高校老师写的论文，99%全都是废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生造了一堆不沾边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这么摆那么摆，绕来绕去，排列组合，就算是“论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画评家，辛辛苦苦品头论足，写完最后一字以后，回头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国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也会出现这种离奇的现象，写完以后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啥也没想说，就是扯淡，骗钱！中国现在学术界掺假比三鹿厉害得多。网上说笑话，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掺奶粉，其实当今中国的学术就是在三聚氰胺里面掺奶粉，到最后基本上没掺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

直接拿三聚氰胺当奶粉卖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应该出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变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个大舞台。所有大的戏剧，其实都在中国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记得那次我骂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很差劲，但是有一条，人家是实战打出来的，你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打过实战吗？你说别人不合格，你没有资格。”那次我跟杨帆在博客中国说：“骂也得我们骂，你没有骂的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主子之间的事。主子可以骂主子，你一个管家骂主子，你懂什么啊？”

中国人在这100多年里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戏剧，西方、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但就是这帮所谓的“主流精英”，把我们对于本土的认识，都说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连余英时（虽然他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都看不过去了，他说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在西方能有点出息的，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说中国的话。

西方学术也有很差劲的，当然比“管家学术”强一点。我们还记得1996年有个“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攒了一篇完全胡说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伪论文，寄给

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想检验一下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编辑还真给登了。登出来以后，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哈哈大笑，说我玩你们呢，我这文章都是胡说八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假的，你们说你们的学问是真的吗？你们有鉴别能力吗？知道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大目标要干大事，你会发现，这种扯淡的事我没工夫扯。我们要干实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学术腐败也会立即穿帮。比如2006年引起极大震动的汉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目标，做汉芯我不是为了报喜，而是按照目标一步步上，要量产，那一下就穿帮了。量产你总不可能拿美国的芯片来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标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当真的设定一个大目标，这种扯淡，这种假冒伪劣，立马穿帮。

##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黄纪苏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英文“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几个数字，观者都说像“1 - 9 - 2 - 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艳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的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

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圇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的房。解决这

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 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干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是题外的慨叹了。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



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了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地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

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

象。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问过，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20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荡荡的普世追求。但它不到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吧。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

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这样的情况只能越来越普遍。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

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的意义。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思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瑞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作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

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发表过一篇《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读起来感觉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这篇文章不长，警句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

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分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的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 附文1 中国前途之辩

前言

(孔哲文《中国安全》季刊主编)

在本期中，我们继续就有关中国前途问题的展望进行讨论。我们曾用同样的浓墨重彩在这幅巨大的画布上作画：中国的宏大战略、其综合国力的构成、中国与世界保持接触，以及中国在获得大国地位的时候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或价值观体系。

我们现在把重点从中国国情的大局转移到有关这个国家动力源泉的细节问题上：中国软实力的演变、其经济前景、该国的民族主义趋势、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也许还有世界如何看待所有这一切。

由于奥运圣火的光芒照耀着中国，所以世界都看到了什么？中国肯定已经竭尽全力办好这届奥运会，花费了巨资，并对其批评者们做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在新的建筑物和社会动员的惊人展示的表面背后，中国继续展开了使主观看法与现实情况实现和谐的努力。在中国信心不断增强的表面背后，存在着民族主义可能的过激行为。中国的影响力和国力的增强使邻国感到不安；中国不断拓展的全球利益带来了更加积极地实施对外政策方面的必要性。

在本期中，各位作者探讨中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这些文章并非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结论性分析。它们的成功是在于加深了这种讨论，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最重要的也许还有，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以便于我们考虑完成了解中国及其命运这一复杂的任务。

### 软实力与中国的对策

（李明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

在国际政治领域学者专家的思想交流方面，“软实力”一词已经风靡世界。重点尤其在于中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惊人的崛起及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有关这一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评估结果各异，从认为北京的软实力很薄弱和毫无希望，到认为中国正在演变成在世界范围对美国软实力构成主要挑战的国家都有。有关采取对策的建议也跨越很大范围。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持谨慎欢迎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则坚决主张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采取对抗措施。各种观点的鲜明对比部分地来源于有关软实力现有构思方面的漏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软实力方针的误解。本文努力阐明这些问题。

何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其

理论上的欠缺“臭名昭著”。这种欠缺导致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框架。尽管如此，许多分析人士还是采用了。很少有人对界定软实力的基本准则或标准持有异议：就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高压手段或者掏钱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仍然不清楚和存在严重争议的是，什么因素产生了吸引力？

在这一对策影响下，分析人士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实力的某些来源——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上面，以此作为分析一国软实力的起点。然而，这一对策的缺点是明显的。人们何以把文化和价值观与对外政策相提并论，就好像前两者并不是一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点并不清楚。此外，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还有，实力的这些来源并不是高压性的。

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此外，采取这一对策的人们往往把思维能力方面的因素同物质因素相分离，而这样做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不考虑社会背景，那毫不夸张地讲，讨论软实力就是毫无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没有任何实力来源是软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和价值观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用于采取高压手段。相应地，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可以用来产生吸引力。

文化并非总是具有吸引力。必须承认，任何文化都包含对他人来说完全无法接受的成分。只有在一个社会显示出自身文化的良好部分，同时对可能会使外界人士感到厌恶的方面加以轻描淡写，文化才变得具有吸引力。此外，如果一国企图把本国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文化就变成了硬实力。历史上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或侵略性的文化对外政策的例子很多。

另一方面，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成为令人羡慕和吸引力的来源。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实力实质上是硬实力的一个来源。只需想象一下，当包括美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前来实施救援的时候，遭到2004年海啸袭击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如果军事实力从本质上讲是硬实力，就很难想象，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允许美军驻扎在日本领土上。包括约瑟夫·奈自己在内的许多批评者断言，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大大削弱。假如军事实力仅仅是硬实力的一个来源，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批评所包含的因果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实力来源都不具有软实力或者硬实力的内在属性，其之所以变成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实力，仅仅取决于一国（或者其他行为主体）如何发挥自己的实力。文化和

价值观之所以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原理或者规范——实质上就是一个行为主体如何发挥自己的实力。文化和价值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在国际政坛上发挥作用的时候，往往与物质因素相结合。

把实力的来源区分为软和硬流行做法无法解释中国行为方面最近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的角色顶多也是边缘性的。首先，必须承认，并非中华文化的所有要素在国际上都具有吸引力。例如，国际上对中国崛起感到的不安，涉及到许多人担心可能影响着北京的世界观的中华文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注重。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多年来中国的国际文化贸易一直出现巨额逆差。然而，正如许多人——甚至中国的怀疑论者——所指出，一个半世纪以来对文化传统的破除已经把中华传统文化搞得一塌糊涂。虽然人们能够辨别出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某些社会规范，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西化。

中国文化当中对外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是名胜古迹和文化上的象征。但话说回来，就连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也羡慕长城，并欣赏其他中国的象征或者表演。

西方正在出现的一种担忧是，中国崛起将对西

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担忧毫无根据.....正如许多人所指出，就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政策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方针实际上包含着华盛顿共识的许多要素。

此外，由于中国方针的不足之处，例如污染、腐败和收入差距显示出来，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指望中国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指导是有疑问的。研究中国政治的人应当意识到，过去30年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起源于中国的历史和具体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国情。一种幼稚的做法是断言，其他国家能够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如此。实际上没有任何静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与5年前截然不同。10年或20年以后的中国肯定也会与今天的中国迥然不同。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所激发的，也许是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有关如何把西方的处方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的思考，以寻求保障自由、同时确保卓有成效的治理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中国在世界上的软的影响力之所以增强，实质上是由于北京几十年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实力的软运用。从一些角度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中国有意识

地做出了努力，以融入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方面保持了一种非对抗的做法，通过行动和言论使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和平崛起感到放心，解决了与多数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并努力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环境。此外，北京还积极地参与了多边活动，把暂时无法解决的争端搁置起来，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谋求共赢。当然，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中国敢作敢为。但总体而言，一种看法是公平的，这就是中国以一种谨慎和考虑周全的方式发挥了自己的威力。这是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中国软实力的最重要成就是北京能够防止形成在战略上遏制其崛起的任何国际联盟。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它谨慎小心地运用了自己的威力。要评估中国软实力的未来命运，我们需要考察各种因素，而不是研究中国所拥有的某些国力来源的性质。这些因素会促使或者阻止中国的决策者以软的方式发挥威力。

软实力像硬实力一样，是一个关系概念。一句很风趣的话抓住了要领：“是中国打赢了伊拉克战争。”当一个大国在国际政坛上失败的时候，世人自然会指望另外一个大国提供智慧或者解决办法，以使世界改观。这令人回想起中国文化中对“和

平”和“和谐”的注重，以帮助构筑光明的未来。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这种憧憬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国际社会构成最为突出的挑战。

软实力，艰难的选择

(戴维·蓝普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问题全都归结为硬实力，即在国家间关系的丛林中采取高压手段的能力。然而，苏联的崩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教训，向其证实了他们10多年来已经采取的一项战略的正确性。在他们的发展战略中，获取经济和思想实力(总称为“软实力”)是构筑大国地位的基石。高压性实力会被忽略，但在国力——威力、资金和智囊——的均衡组合中，它会扮演一种相称的角色。

高压性军事实力的过度获取具有在所有有心人看来都显而易见的双重危险——中国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苏联的遗骸。首先，把人才和投资转而用于获取军事实力使得苏联的国内经济严重缺乏满足人民经济需求的能力，从而侵蚀了政权的合法地位。苏联解体时，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起事件而死亡，尽管解体后的经济暴跌使现在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缩短。其次，建设这样一个穷兵黩武体制的



行为所形成的反对莫斯科的国际联盟使之自食其果，从而促使该政权更为失衡，并使国内虚弱的合法地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北京实际上毫无选择，只得奉行一项不以高压手段为基础的战略。13年后苏联的解体使邓小平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坚信，这一选择总的来说是明智的，尽管局势并没有保持静态。不过海湾战争、军事革命、科索沃战争、对台独的担忧，以及“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策中的一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北京进一步认识到高压式实力的重要性，尽管它也谋求保持自身实力工具组合中总的平衡。

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包括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取得惊人的成功，所以中国精英阶层断定，他们需要让外部世界对其意图进一步感到放心，以防止对抗性的联盟形成。由此我们就谈到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和战略。认识中国“软实力”最卓有成效的途径是什么？中国获取它的涵义又是什么？为了表明我的做法，我们需要对软实力下一个宽泛的定义。此外，软实力对美国来说具有一定的硬涵义，尤其是在保持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和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上。

看待软实力的一条途径是把它当作经济上的诱

因和思想力量的结合。后者即知识、文化、精神、领导能力、创新和合法地位等资源所形成的实力形式。这些资源使一国高效地界定和实现自己国家目标的能力得到增强。至于中国不断增强的软实力的经济方面，这一实力主要由于中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获取国，它拥有世界其他国家所竞相争取、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对外投资者，中国还拥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包括持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

然而，正是在软实力的思想意识层面，人们发现了中国实力尚未获得充分评估的地方。中国具有一个可以培养大批富有才华的领导人的范围广泛的体系。才华横溢的领导人不仅出现在党政机关中，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企业和私营部门之中——公司的招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范围，而不仅仅是全国范围的过程。在中国的发展方略中，首先实现的是稳定和发财致富，而政治自由化则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时期实现。与许多美国人愿意承认的相比，这一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一些而不是所有方面)很可能被低估。此外，中国的文化吸引力是毛泽东几乎完全忽略、但中国当今的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项资源。正如其不断增加的世界范围的卫星和光缆通信以及

中国文化产品日益受欢迎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这些成就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步，中国通过自己的传播渠道与世界其他国家沟通的能力不断增强。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全球人口当中不断增多的一部分对中国国力及其增强在各方面产生的效应感到某种不安——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问题到赞比亚工人的流离失所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尽管如此，肯定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30年来实现了全球影响力的巨大增强，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不安情绪的加剧程度则较小。与中国很弱小的时候相比，它现在拥有较强的实力，因此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大大增多。

由此我们就谈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软实力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必须增加自身软实力的存量，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思想方面。我所了解的每项比较性全球民调都显示，8年来在世界各地，美国的规范性实力减弱了，但我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健全的政策来克服。美国经济现在所传播的是全球性减速，而不是全球性增长。要实现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指望中国，尽管中国经济也并非没有严重问题。

华盛顿，更为宽泛而言还有美国公民，都需要

重建经济和思想竞争力的结构。例如，中国正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倡导有关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并在外语方面培训大批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够在各国民众自己的语言势力范围内展开竞争。我们需要实行的学校教育是能够培养下一代，使之与中国(和印度)40%精明的、注重教育、投资率很高的人们竞争。20世纪，这两个国家在大多数方面曾经基本上处于全球体系之外，而现在它们却培养了大批高技能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迅速增加研发开支，建设了牢固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在我们使用每况愈下的公路、桥梁、过时的空中交通管制和内陆导航系统的时候，中国却正在修建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要多的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系统。虽然中国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用于医疗保健，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开支接近17%，但是美国却遇到竞争力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美国需要提高国民的储蓄率，以便进行这些急需的巨额投资。

总之，中国的软实力使美国必须做出一些艰难选择。中国的变革使美国必须实施变革。正如汉斯·摩根索几十年前所说：一国的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不仅一国的失误能够削弱其国力，而且如果占据主宰地位的强国躺在功劳簿上，以为自己的实力和别国的弱点都是永恒的，那

别国的成功也能造成这种结果。

多样化

(麦艾文 [Evan Medeiros]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

评估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活动可能是一项令人困惑，实际上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商人和外交官如今似乎遍布全球，从非洲的边远地区到中东和平进程谈判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种“新型外交”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全球大国目前和今后意图的日益关注。许多国际决策者都在提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自己不断增强的国力和影响力？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困难。

有一个简单但却有用的框架可以用来了解中国在全球积极活动的目标和涵义：这就是“多样化”概念。中国正处于实现其繁荣、安全和地位来源多样化的过程中。这部分地是由于别有用心，但部分地也是为了填补空缺。这一方针正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与中国以及相反方向上的关系。重要的是，这也对中美关系的前途产生举足轻重的后果。

首先，中国正在实现其经济繁荣来源的多样化。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外部来源主

要是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少数工业发达的经济大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最近10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保持较高水平经济增长(从而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加积极地到国外寻求新的市场、投资、技术和资源。中国对能源供应和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藏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一趋势中起着带头作用。

有关这种经济多样化的指标很多。中国在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10年来一直超过与任何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目前，这一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最大份额。中国已经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东亚大多数经济大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出口10年来增长到原先的10倍以上，而这种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也增加了1倍以上。

其次，通过与各种实力中心和国际机构发展新的关系和拓展现有的关系，中国正在实现其安全来源的多样化。不仅通过与发达国家，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以及重要的地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中国正在改善其双边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地区都对多边机构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在一些情况下，它还在从前并不存在这种机构的地方创建这种机构。

中国利用这些机制使各国对其意图感到放心，展示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好处，最终还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涉及获得打入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事实上，中国在多边外交博弈中已经变得娴熟得多，而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鼓励中国积极接受的事物。

这种安全方面多样化的结果是，在安全方面，中国减轻了对与美国等少数大国之间稳定和积极关系的依赖。中国现在产生影响力，避免自己的行为受到制约，并获得了机动能力，以便在各种来源当中进行选择。

第三，中国还正在拓展其国际与合法地位的来源。对于一个具有普遍受害者心态(中国遭受日本和西方列强剥削的历史仍是其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并迫切希望获得承认、被视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动力源泉的国家来说，在国际社会获得相应地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核心目标。

中国在几十年里都依靠粗略的衡量方法作为这种尊重和地位的基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传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理事国地位，以及拥有核武器等。

现在，中国转而突出其25年来的经济成就，并表示愿与别国分享这些成果。中国领导人还正在缓

慢地改变自己的外部形象：他们正在放弃把国际事务看作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斗争”的观点，而是采取一种较为和解的看法，即强调“和平、发展与合作”，以及创建“和谐世界”。中国还仍是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最有影响的国家。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地位的一项核心标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几乎是中国作为得到认可的世界大国“俱乐部成员”而复兴的终极成就。

中国的多样化过程对美中关系，尤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后果。在中国改革时期的前25年间，美国的政策在鼓励(有时是胁迫)中国接受与贸易和投资、武器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地区安全事务相关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美国的政策当然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国际化过程中的唯一因素，但通过展开内部辩论，它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通过赋予中国国内的变革倡导者以权力，它使现有的辩论更为激烈。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几十年里，华盛顿实际上利用了北京要求与美国建立稳定和积极关系的愿望，以争取改变中国在各种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的决策者们过去常常说，中美关系是“关键的关键”——这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核心目标，最终对其恢复



大国地位，都具有核心重要性。

但所有这一切都在改变。由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安全和地位的来源变得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急剧衰落)，中国领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关注美国的看法。北京不再那么愿意迎合美国的偏好，而是更能抵制华盛顿的压力，甚至产生抗衡力量。因此，美国的传统做法，即主要依靠双边外交来影响国际行为，面临着新的局限性。

美国需要更新其策略。要从制订一项在内容和实施上都具有更为强烈的多边性质色彩的政策做起。美国的政策必须反映一种现实情况，即通过一个范围广泛的国家联盟，通过利用各种机构与制度、规范和规则，尤其是中国人认为合法、有效和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对中国的影响就会十分有效。在与这些行为主体合作的情况下，通过各类渠道，美国影响中国外交的机会就会大得多。

采取这一方略并非易事，但从潜在回报看，做出额外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用一项传递给中国的合理信息把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行为主体联合起来，是一项复杂的挑战。许多国家在对华关系方面都具有不断扩展的种种权益。因此，一些国家不愿对中国提出挑战。鉴于中国在多边机构中越来越有效的

斡旋，所以这件事的难度会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范围的积极活动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施加影响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可以左右中国的国际行为。

“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籍党员、著名的美国友人)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先知或水晶球才能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我既不是前者，也不拥有后者。但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生活过35年，还有28年作为顾问经常来到中国，所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我感到自己能够就中国的前途问题做出一些猜测。

如果我们看一看两千年来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就会有两项特征凸显出来：一项就是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国的统一。在相反方向上产生不断的拉力的是中国暂时的分裂，沦为不同的王国，陷入叛乱、反叛、农民起义和革命。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强调中国的这种凝聚力，以便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来指导国家为实现经济繁荣与民主已经阐明的目标。普遍的思维定式可以用一句格言来描述：“小心老实人发火。”老实人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能吃苦耐劳，而且必须

这样做，在国家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能够容忍严重的不公正。但有一个强度的极限。达到这一极限，结果就可能是从前的秩序遭到彻底毁灭。

这意味着要应付激起人民怒火的具体的挑战。官员的贪污受贿、暴戾的地方官员非法抢占土地、肆无忌惮的企业家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警察镇压采取和平方式的批评者、日益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实施真正的民族自治。这些仅仅是其中的少数实例。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对存在这些邪恶感到吃惊，尤其因为这些丑恶现象甚至也存在于许多发达国家。但是，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竭尽全力来纠正这种错误。因此，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首要挑战是向人民表明，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他们也十分关心底层社会的需要和需求。

这不仅涉及结果，而且涉及过程。就后者而言，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的工作是成功的。其例证不仅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在不带隔离检疫面具的情况下看望非典病人的电视报道，还有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今年新年除夕，冬季暴风雪来临时，被困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站的人们当中，以及他们赶赴四川地震灾区亲自参加营救和救灾工作。这些行动对中国

年轻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领导人产生了质的变化。无怪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是公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满意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

30年来的务实改革和政治改革反映出现任领导集体的本质及其应付摆在自己面前的挑战的对策。他们不再是出身于游击队战士或者学生当中的激进分子。今天占压倒多数的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他们是建设者，而不是意识形态专家。此外，他们的核心口号也不再是：“年轻人，为国家、党和社会主义牺牲你们的个人目标吧！”这是毛泽东领导时期所体现的精神。现在最重要的座右铭要求领导人关心民众疾苦，考虑到领导集体所做的每件事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一个切题的事例是，胡温领导集体上台后不久就显示出国家战略的明显改变：虽然很高的GDP增长率仍是重要的，但GDP必须使公共福利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引进“绿色GDP”观念作为地方领导人晋升的一项依据)并稳步提高，也不应当忽略“精神价值观”。

其结果是，当今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人民更多地购买而不是储蓄的政府。当代中国在几千年顽固的闭关锁国之后已经加入了世界的行

列。虽然中国仍处于自己形式的政治民主演变过程中，但中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他们享有选择就业、就学和住所的自由，想到哪里旅游、经商、参加宗教活动(尽管是在规定的限度内)都可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批评和表示不满(只要他们不发表重要的反对派观点，或者组织起来直接反对党的政策)。

因此，在宣布实施多党民主或者新闻自由方面，现在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中国领导人？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文化革命浩劫之后的创伤综合症。但也有另外一些原因。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受教育的水平也低，民主方面也缺乏经验，还有千百万城市失业人口和超过1.5亿的农民工。所以与仓促行事，冒着像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所发生的那种社会崩溃的风险相比，更为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渐进性和白下而上的变革。十分可能的情况是，假如中国的其他政党明天“合法化”，其中最炙手可热的就会是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排外、排斥商界和反腐败的。这样的政党一旦上台，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全新水平上的腐败。

中国真正的积极变化正在实现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改革最佳前景的产生是通过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博弈，其中包括许多曲折，甚至还有反

复。我亲身体验了大规模的迅速变革给中国带来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灾难。

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变革的发生不会是通过批评奥运会的举办权是北京的最大成就，象征着中国加入了世界的行列。奥运会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一个普遍来源，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老少。在中国人举办的奥运会中搅局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怒火和仇外情绪，并使误解和摩擦加重。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是公平的做法，但是请勿打扰这项世界体育盛会，否则就会冒着使中国反对改革的强硬派地位得到加强的风险。

最后，我认为，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本质上是善良的、勤勤恳恳的。但他们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也不能产生魔术般的奇迹。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任劳任怨。他们明白，摆在21世纪人类面前的任何重大问题，在没有所有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的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解决。这种认识处于中国目前对外政策的核心。

（《中国安全》季刊2008年夏季号 尹宏毅译）

## 附文2 中国的崛起

[美]唐纳德·斯特拉斯海姆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  
访问学者)

鉴于今天的中国与25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要预测中国25年后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愚蠢的。但是目前正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一些重要力量似乎会长期存在下去。

有三点可能是有目共睹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会继续，大城市的规模会继续扩大，还会有大批人口流向这些城市，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农村地区人口还会继续减少。第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汹汹，中国人变老的势头比目前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要快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性别比例会发生变化，年轻女性的人数远远少于年轻男性。第三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完全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在表面现象之下，可能存在着种种压力，其中包括：建设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国政府的现代化与职业化以及它与人民的关系；改革中国的能源政策；应对环境退化构成的已经达到危机水平的挑战。关于后者，一个未知的因素是，政

府能否做出转变：北京能发挥必要的领导才能，让老百姓做出改变，从而避免让国家陷入环境灾难吗？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当前可以断定，中国的生存本能会决定答案是肯定的。

### 人民推动的改革

要从指令经济彻底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远非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经济，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领导人设法完成了这一过程并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29年里保持着9.7%的增长率，为此他们应该赢得赞誉。西方人没有想象到中国会创造这样的成绩：让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群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最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的成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上升，因此他们认定“富裕增长”要比“贫困停滞”更让人满意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财富的不断增长与改革举措及市场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一样，把继续掌权作为重中之重。他们认识到，如果经济停止增长，他们就会受到指责。因此，政府会想尽办法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事实上，任何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势头的变革都对北京领导层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想要的无非是



工作、赚钱和消费，此外还要成功参与全球经济。但是随着新近拥有的财富的不断增长，他们现在也想享受并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尽管他们享受的自由还不够完善。此外，他们希望政府办事得力、关心民众疾苦并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放在主要地位的仍是“让我们赚钱”，而不是“我希望能够投票”。

在广东改革的开始时期(1978—1990年)，中国推行的是一心发展经济的策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勤勉、报酬低下的劳动力，这些人已经对中国经济灰心丧气了几十年。中国的目标是，利用人为操控的、汇率低下的货币来降低中国的劳动力和制造成本，削弱全球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从而占领全球制造业市场，首先是低科技含量的制造业市场。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并让农村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制造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寻找就业机会。

农村地区就业的不充分和机会的匮乏促使相对来说灵活机动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同时并没有造成农业总产值的下降。这样说来，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100%的增值，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并增加了需求。然后在城市

中获得的收入寄回了农村，提高了农村的可支配收入。有利的汇率和国内巨大市场提供的商机与国内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吸引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人才以及高新技术。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让中国和中国的银行在全球经济中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力，并让中国的国有行业和一些特定的公司得到巨额补贴，从而妨碍外国公司参与中国的经济活动并发挥影响力。

在中国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大约有1%是劳动力的增长，9%是生产力的增长。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移动，从而从没有就业的零生产力状态转变为拥有高产值和高生产力的工作。但是这一切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吗？

### 大规模移民与百万人口大城市

1983年，大约有两成中国人口住在城里，另外八成住在农村。到今天，这一比例基本上是45%住城里，55%住乡下。到2033年，城乡比例将达到67%对33%左右——更接近西欧和美国的城乡人口状况。在过去15年里，每年平均有1700万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在目前的人口与经济状况下，这一移民速度很可能继续保持20年左右，然后逐步放慢。中国已有大约10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

这些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于是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重庆、深圳、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与加尔各答、达卡、拉各斯等许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城市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你在这里看不到大多数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情景。在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里，会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只能勉强糊口。但在中国，大约同样比例的城市人口不仅有工作，而且收入也在稳步增长。中国的大城市在发展中国家里独树一帜，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延续到2033年。

在中国，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主要是青壮年，他们把年迈的父母留在了农村。迁移的人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也最有可能后来赚大钱。迁移的结果是使收入差距更大更明显——城里人比农村人更有钱。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并不惊讶地看到，新搬进城里的年轻人按时把增加的一部分收入寄给种田的父母，结果双方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这就是公众对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满并没有在中国成为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要原因。

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即使是那些既没有工作、也缺乏生存技能的进城务工人员，也会发现原来有蓬勃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迎接他们的到来。到今天为止，北京领导层依然会不时提到基

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施这一城乡大战略的方法虽然有所改进，但其总体框架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2033年，这个大战略可能依然在成功实施中，只是有了少许改动。在未来25年里，中国必须改变对贸易的严重依赖，贸易应让位于国内需求和目前尚未成熟的服务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将放慢，但虽然达不到过去25年近10%的平均增速，中国似乎还是可以继续维持6%至7%的水平。中国已经积蓄了可自行支配的大量资源，积累了管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的经验，建立了具有长远价值的全球关系网。

我们还应当牢记，中国农村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枯竭。但到2033年，中国的劳动力人数将停止增长，人口老龄化将日趋明显，此后的发展前景将更类似于工业化国家，而不像我们近几十年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经济体所看到的那样。

### 全球化对抗控制权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控制权向来都很重要。但现在出现了两难的局面。

中国想要成为全球经济圈的正式成员，想被当

成“大人物”来看待。但这就意味着要遵循大人物的规则办事，而不能遵循北京所偏爱的地方规则来办事。政府官员坐在会议桌边决定这决定那的模式依然深得北京喜爱；但全球化意味着要放弃控制权，把许多事情的决策权——定价、生产、投资、产品种类——交给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这种事情不讨人喜欢，但却是参与世界经济将要付出的代价。

考虑到中国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思想的偏爱与钟情，中国显然会做出让经济规划凌驾于混乱的全球(或本地)市场的决策。在美国，集体利益常常让位于个人自由。在中国，两者的重要性排名几乎永远都是相反的。笔者并非要进行评判，只是想指出两国的不同。这些特征(政府控制权、国有经济相对于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集体利益)一直是过去25年的主旋律，而且未来的25年很可能会依然如此。在这里，变化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小范围内逐步展开，而不会以急转直下的方式出现。

我们常常听到批评中国的人警告说，另一场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可能即将爆发，导致中国经济被再次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人民将再次陷入经济停滞的泥沼。这种设想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虽然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不满，但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大利益集团都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两败俱

伤。稳定与“和谐社会”(北京现在的时髦用语)比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实质性退步要重要得多。如果发展与希望继续存在的话,双方可能在未来许多年里都会坚持目前这种规避风险的立场。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就告知全世界,维护控制权与稳定是第一要务,中国人希望在不爆发动荡与混乱的情况下顺利举办奥运会。没有发生任何具有影响力的示威活动,甚至连赛场看台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对某位运动员或参赛国表示支持的横幅。奥运会开幕后不久,北京就宣布允许人们在市內三处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只要抗议者进行登记、拿出抗议计划等等。所有出席奥运会的人肯定都认为奥运会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得出的经验就是:控制是管用的。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更加坚定地以自己的想法进行社会与经济建设——以国家为中心,以控制权为实施特色。

中国正努力建设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架构,培养一批有能力、有素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务员。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公务员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界线一如既往地模糊。中国似乎无意改变这一现状,党政交叉的现象很可能延续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让中国人有兴趣断绝过去,朝着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北京挑选领导班子的

体制基本上遵循精英管理主义，至少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这完全是一个领导集权体制，如果想爬到顶层就必须依靠关系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必须有效利用游戏规则，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必须开创并宣传自己的思想，必须影响到更高一层的领导。来自外围的思想，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一般都会很快消亡。鉴于中国在全球地位和经济实力上的成就，鉴于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坚持原来的做法。

### 维护市场

中国正努力创建一系列现代化经济管理手段，支持其在全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目前，金融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更应该被称为货币“决议”。只要北京坚持掌控银行系统，不愿把资源配置的工作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员，那么中国创建经济管理手段的梦想就几乎无法实现。在未来几年里，全球化的要求将奋力推动中国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来看，中国的资产配置状况远非市场规则能控制得了的。这表明迄今为止发生了太多效率低下的事情。假如资产配置通畅顺利，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水平该是多么惊人啊！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透明度、报表要求、诚信度

和规则执行度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股市在最近几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很难想象中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就时，可以不用改进股票市场。一个透明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很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过，公众希望现在的管理部门内部是些素质高、能力强、训练有素、反应敏捷、清正廉洁、认真负责的官员。这样的体制正处于建设当中，而且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越高，管理体制就会变得越发重要。毫无疑问，到2033年，中国将在这一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西方游客来到中国，常常看到的是喧嚣都市里的繁忙工地与消费人群，看到的是车水马龙不断、行人通勤匆忙的景象，就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全面开花了。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有了发展，但被局限在北京精心拟定的框架中——而且并不一定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国家根据那些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规定，借国有企业之手，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大块领域。笼统地讲，中国认为这些行业具有“战略重要性”——军火、电力、汽车、电信、煤炭、航运、石油与石化产品、钢铁等等。在所有这些行业里，针对外国企业的基本规则就是“不要主动找我，我有事会找你”——如果我们需要你们



参与的话。北京正努力寻找外国朋友，帮助自己进一步走向世界，进一步把这些国有企业提升至世界水平。但是在这一单向思维的引导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掌握世界领先技术，能够打入世界领先行业。只有当赤裸裸的现实证明中国的计划行不通时，中国才可能改变这种打造一流国有企业的想法。

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先“国有”、后“企业”。企业高级管理层与负责人(无一例外都是共产党员)由党来任命。进行战略和运营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增加群众就业与收入，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长期竞争力和独立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进步，为公共预算增加税收收入。国家可以——而且确实给予这些企业税收优惠和补贴，对非国有竞争者给予处罚。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家海外跨国企业都不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竞争者，除非中国相信此类竞争是有好处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要北京不愿意让外国公司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其他国家就不准备让中国企业有所作为。因此，虽然与过去相比，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国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受到威胁。

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外交政策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使全球贸易形势完全失衡，其严重程度是多年来或许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造成如此大贸易顺差的原因是，中国的低成本、充足的劳动力、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以及由北京操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币值。

后果之一是，外汇储备激增，其中部分转投入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在中国近18500亿的外汇储备中，约有2000亿拨给了CIC，投向海外。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可能会有多达一半将用于这个目的。中国未来几年中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对全球会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笔财富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它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将影响力拓展到全世界的任何国家，使在全球公司和不动产中拥有的所有权股本不断增加，并获得技术和人才，而这些如在国内开发培养的话，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未来数年如何使用这一财政实力仍然有待观察，但无疑中国认为这笔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它在全球经济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种它不会轻易放弃的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占主宰地位的经济体，它还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看来设想任何其他的结果是没道理的。在经济领

域，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其他许多多国机构的成员，并在行为方式上开始表现出所有全球性大国的特点——“礼貌倾听，但我行我素”。北京完全认识到，自己与日俱增的经济重要性在继续强化着它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因此虽然使中国更全面加入全球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未来数年中这种一体化未必会使中国变得更加顺从。

这一长远战略的部分内容是与全世界国家建立关系。在非洲，中国觊觎那里丰富的、尚未开发的原材料，这些资源对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几年中，中国在非洲已投资约150亿美元，并且承诺还要追加200多亿美元，用于援助、基础设施和贸易金融。中国问题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密切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远计划的重要环节。有些人担心，从中国坚持不懈关注非洲市场与资源中，可以嗅出新时代殖民主义的气息。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看到更多的是共同点而并非冲突。鉴于非洲的经济困境令人绝望，而中国有现成的财富，很难想象它们的关系从现在起的25年中不会比目前的更紧密。

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之间历史性的敌对关系近几年来有所改善，似乎未来甚至会进一步改善。

当然，以往的摩擦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的伤痕、日本帝国主义和二战侵华留下的创伤渐渐被淡忘，而随着新一代领导人打牢根基，当前的考虑不可避免会占据主导地位。就日中关系而言，现代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战胜了以往地缘政治上的分歧。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视是众所周知的，它源于历史。但是在2008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经济领域看到的共同点要远远高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看到的分歧。

说到台湾，今天涉及的依然是“台独”与“台湾省”的针锋相对。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点的关键。但是时间将治愈所有创伤，此刻共同的经济利益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将会逐步调和。在中国加强经济关系的同时，应该记住，这些交往和帮助通常都包含着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实体的附带条件，以进一步阻止任何台湾脱离大陆的可能性或独立的倾向。

或许借用一个不敬的比喻，台湾对大陆而言就相当于长岛对邻近的纽约市——一个经济上的后续体。台湾经济的未来越来越与大陆密不可分，然而它很小，完全可以被纳入整体而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台湾岛享有的自由或许对大陆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但并不切合实际。

中国与美国、欧洲、拉美、澳大利亚和中东的关系现在以及未来都将受一些严重受市场驱动的综合因素的左右。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最近或不久的将来都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为经济利益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在每种情况下，各国或地区的相对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继续发生变化，它们抑或视彼此为市场，抑或视彼此为资本、技术、人才、原材料或制成品的来源地。

### 中国人口老龄化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认为，要想在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方面真正取得进展，就需要限制出生率。其结果，今天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国家。1975年，走在大街，迎面走来的行人的年龄很可能是20岁，而今很可能是32岁，而到2033年，很可能是42岁。

排除外来移民，中国人口目前的自然增长率是每年0.6%，美国是0.9%，日本是0.1%。假设目前的趋势继续的话(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到2033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将为零。或者可从人口中少年受抚养人口(0~14岁)与老年受抚养人口(65岁以上)的比率变化着手进行考虑。25年前，中国少年受抚养人口比老年的多4倍。现在这一比率大约2.5:1。到2033年，中国少年和老年受抚养人口的数量基本

持平。到那时，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是少年和老年非劳动人口合起来的两倍，由于中国可能缺乏现成的储备财富以供那时所需，那么肯定会对实际工作的人加大征税力量，以负担这些不工作的人。对这个问题，中国强有力的计划体系似乎完全有能力解决，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又不使一代人与一代人间的不友好情绪激化到影响稳定的程度，将需要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技巧。

比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惊人的是以下这一事实：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受政府强制性减少出生率计划的推动，并且取得了其他贫穷国家无法比拟的成功。即便中国大幅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口仍可能在生活水平或发展水平上大大低于欧美国家的情况下开始走向老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是，性别结构发生了变化，男孩数量大大超出女孩的数量。这证实了那种希望头胎(现在是唯一的子女)是男性的习俗偏好。许多报告表明有几个省的男孩女孩之比是130:110。

现在还很难说到2033年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会是什么样的，但目前看来不平衡性的确会比现代史上或许任何大型社会都要大，其后果尚不明朗。

能源和商品安全

由于中国约一半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因此中国对能源自给自足的渴望并不奇怪。不过，尽管拥有开发再生能源的重要计划，在提高能效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直到2033年甚至更远，中国在能源方面仍将严重依赖于进口。

中国不断变化的能源政策表明了今后25年这一领域将是什么样子。目前，石油占中国能源来源的不到25%，北京在设法限制石油用于运输以及作为石化产品材料。这看起来非常可行，但是即便如此，中国还是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石油。煤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占能源消耗的约70%。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但是，环境目标要求大规模使用清洁煤技术，或者减少煤的使用。

中国发起了全球最大的核电站计划，打算新建40个1000兆瓦的核电站，并在2015年前投入运行。日前，中国拥有11个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其所提供的电量仅占中国能源总量的1%。核电肯定是中国未来能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国家，然而，该国还有很多的水力资源尚未得到开发。不过，由于非常担心环境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庞大的三峡工程所引发的——水力发电仅占中国能源总量的5%，而且今后似乎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现在成了北京官员的关注重点。这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有机燃料。如果到2033年前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各地能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肯定不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然而，撇开这一点，今后25年中国能源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获得可靠的外国燃料资源。这一政策包括字面意义上的燃料(石油、煤、天然气)和工业燃料(铁矿石、铜、矾土)。中国过去10年的出口和工业化政策显然是奏效的，但是，它使得中国需要从海外获得大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燃料和原材料，而且是年复一年。对这些资源流入的任何破坏都将立刻使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

北京正在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设法获得并建立合资企业，或者与全球各国拉近关系，以解决其长期依赖性。例如，中国正设法在伊拉克和尼日利亚获得石油，在巴西和澳大利亚获得铁矿石和矾土。这些提议通常都会得到很好地回应。由于有政府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在财政上是有保障的，并且会答应(当然只是含蓄地)其外国合作伙伴可以较为容易地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其次，中国的国有资金变得更加着眼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社会



保障基金都将目光投向了海外采购和投资期较长的合资企业。对于全球许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而言，与中国建立关系可能会给它们带来巨额的收入、大量的新技术和人才，以及高收入的就业岗位。

中东和非洲是中国最为关注的两个地区。但是，中国成为新的殖民大国的可能性似乎还很遥远。北京在这场资源竞赛中的首要目标只是使老百姓的饭桌上有东西可吃。目前，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到了2033年，中国将会在全球进出口关系网络中称雄，但是融入全球经济也带来了某些挑战。

一个简短的历史脚注：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油价长了3倍，沙特阿拉伯坐拥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财富。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却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沼，经济发展停滞，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政局混乱，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35年后的2008年，情况却发生了大逆转。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迅猛。中国人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衣食无忧，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向感到满意，对于未来非常乐观。而沙特现在的经济状况则是完全让人看不到希望，仍单纯坐拥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些黑黄金生生被浪费掉

了，没有为其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利润。失业仍非常普遍，制造业几乎不存在。

### 中国面临的极大挑战

中国的环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恶化，而且所有人——全球其他国家、中国各级政府、企业精英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知道。只需看看北京奥运会前媒体以及中国全国上下对于北京污染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可见一斑。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污染问题最为清楚，他们是日益严重的污染的最前沿的受害者。除非污染问题特别是地下水污染问题立即得以解决，否则灾难即将到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高昂的成本，这会削弱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但是，生存的本能意味着，环境保护和治理将成为2033年前北京的工作重点。

不过，最近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50年来对环境的忽视使得中国成为地球上最脏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获得适于饮用的水。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是中国的。中国一半以上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了。再循环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很陌生。

环境的恶化成为社会不满最常见的催化剂。因此，北京开始认真对待环境保护和治理问题，现在

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

不幸的是，国内没有哪家公司有能力处理环境问题，那是因为直到最近，环保问题才被提上日程。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外国公司来帮助它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应该被认为是无罪的。由于对环境的忽视使得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危险，面对防止今后的进一步破坏以及纠正过去的错误行为的双重挑战，中国正在勇敢地面对。我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成功地使政府更加关注环境问题。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使得这一良好意图变得复杂起来：北京可能颁布了很多环境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很快就会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必须要杜绝。北京承认，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不仅仅是在环境治理方面，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这个问题也变得越发尖锐。如果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这一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今后25年的重大障碍。

政策是关键

展望25年后的中国，最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数据，而是政策方向。不断更新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让人一目了然。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直非常成功，且似乎仍将在政府的掌

控之中，私有经济在其中则扮演着辅助而非主要的角色。除非出现重大失误，否则中国在全球事务、经济和战略领域发挥的作用要比现在重要得多。然而，可能阻挠这一进程的会是什么呢？

在可见的未来，那些最密切关注中国的人需要注意两种可能性。首先，中国的改革是不是由内部开始的，源于新的利益、目标、评价或问题，并预示政府将走向不同的方向？还是与之相反，中国改革是由于国际社会考虑到这一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发展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对其施加压力或反对中国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中央政府的规划非常重要，在这种制度下，分析人士应该可以按照规律发现线索，为改革进程提供预警和指明机会。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正全速前进，人民和政府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经济成就远比人们的其它愿望、领导层的其它目标重要。我的估计是，中国在未来25年的变化将比美国、日本、欧洲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大。之前提到的收入增长、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及人口老龄化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北京将努力保证进程的顺利推进。当然，这是它的如意算盘。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行，人们的希望和对政府的

期望也会水涨船高。政府在向人民提供服务时需要更加热心、更加负责和称职。我认为这点可以实现。意外和干扰在所难免，但北京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老练。

我认为，中国在25年后会成为领先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这将标志着世界强弱秩序的鲜明变化。10年前，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让哪一国跻身“二国集团”还需一番斟酌。而到2033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能开始思考这种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并思考应对的方式。然而，美国日益严重的党派之争以及美国政府显然欠缺的应对能力(除了在出现危机时)并不令人鼓舞。华盛顿长期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在中国，问题会浮出水面，不管有效与否，至少能得到解决。

中国可能会继续强调“更广泛的利益”，而不是“个人自由”，这与美国自1776年以来主张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而且，随着中国占据世界领导者的位置，它很可能会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它地区成功输出“更广泛的利益”这一主导思想。你尽可以想象这对民主体制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将听到更多的“北京方案”，而不是“华盛顿共识”。然而对我们而言，关于如何引导、刺激和维持经济发展的不同理念相互较量，会更多地带来希望，而不是恐慌。

（《世界政策杂志》季刊2008年秋季号，李凤芹 郭明芳 许燕红 舒静译）